

南开大学

硕士学位论文

留学生与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1912-1949）

姓名：张薇

申请学位级别：硕士

专业：中国近现代史

指导教师：元青

20050501

内容提要

民国时期，留学生在中外文化交流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们不但将外来文化引进中国，同时，也积极向外国人介绍中国的文化成果，这些成果既包括中国古代的文化成果，也包括近代文化成果。留学生们的活动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尤其是在以下方面：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国画，京剧，中国音乐和中国的饮食方面等等。通过他们的介绍，使外国人对中国文化有了初步的了解，促进了中国文化在海外的传播，也有利于中外文化交流。

中外文化交流自古以来就十分频繁，但是，在近代，由于中国科学技术停滞，西方人对中国近代以来的文化成果也缺乏正确的认识。但是，留学生们利用自己在国外留学的时机，把中国的古典文学作品、戏剧、艺术、音乐等文化成果介绍到西方。留学生们为传播中国文化做出了他们的贡献。此外，还有一些留学生，如王光祈、赵元任、任光等人，不仅向外国人介绍中国的音乐理论，同时，还亲自表演中国的音乐作品，更直接地向外国人展示了中国文化。很多留学生将中国的饮食文化、风俗习惯传播到国外，从不同的角度向外国人展示了中华文化。

总之，本文运用系统的研究方法和比较学的方法，阐述留学生在传播中国文化方面的贡献。

关键词：留学生 中国文化 文化交流

ABSTRACT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Public of China,the students abroad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history of the cultural communication between China and foreign countries.They not only introduced the occidental culture to Chinese, but also introduced Chinese culture to the occidental These results to foreigner included the China ancient times culture, as well as the modern age culture.These activities brought the profound influence upon both China's and occidental culture .Especially in the following these aspects :Chinese classic literature works ,trational Chinese paintings,Beijing opera, Chinese music and Chinese food etc.By their introduction, the foreigners began to understand the Chinese culture,and promoted the Chinese culture in the spreading of overseas, and also benefit the Chinese and Foreign culture exchanges.

Although the cultural communications were very multifarious from the ancient, in modern age,the west world were lack of realization of the Chinese culture for the science factor.The students abroad contributed to.introduce Chinese culture to occidental.They introduced Chinese classic literature works, Beijing opera,traditional Chinese painting,Chinese music, Chinese food etc,to the occidental.They translated and published many Chinese literature works,exhibit traditional Chinese Paintings overseas.In addition,some students abroad , such as Wang Guangqi,Chao Yuanren,Ren Guang etc,not only introduced Chinese musical theory,but also showed Chinese music by theirselves.A lot of students abroad spreaded Chinese food and customs abroad, displayed Chinese culture to the foreigner from the different angle.

In a word,this thesis make use of the systemic method,discuss how the students abroad spread Chinese culture.

Key word: Student abroad

Chinese culture

Cultural communication

南开大学学位论文版权使用授权书

本人完全了解南开大学关于收集、保存、使用学位论文的规定，同意如下各项内容：按照学校要求提交学位论文的印刷本和电子版；学校有权保留学位论文的印刷本和电子版，并采用影印、缩印、扫描、数字化或其它手段保存论文；学校有权提供目录检索以及提供本学位论文全文或者部分的阅览服务；学校有权按有关规定向国家有关部门或者机构送交论文的复印件和电子版；在不以赢利为目的的前提下，学校可以适当复制论文的部分或全部内容用于学术活动。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张薇
2005 年 5 月 27 日

经指导教师同意，本学位论文属于保密，在 年解密后适用本授权书。

指导教师签名：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	
解 密 时 间：	年 月 日		

各密级的最长保密年限及书写格式规定如下：

- 内部 5 年（最长 5 年，可少于 5 年）
- 秘密★10 年（最长 10 年，可少于 10 年）
- 机密★20 年（最长 20 年，可少于 20 年）

南开大学学位论文原创性声明

本人郑重声明：所呈交的学位论文，是本人在导师指导下，进行研究工作所取得的成果。除文中已经注明引用的内容外，本学位论文的研究成果不包含任何他人创作的、已公开发表或者没有公开发表的作品的内容。对本论文所涉及的研究工作做出贡献的其他个人和集体，均已在文中以明确方式标明。本学位论文原创性声明的法律责任由本人承担。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张 薇

2005 年 5 月 27 日

引言

（一）选题意义

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文化的传播都是双向的。自古以来，中国文化辉煌的成果不仅蜚声海外，而且由此形成了一个中华文化圈。然而，这种优越的文化状况却在近代发生了逆转。近代以来，中国科技停滞不前，西方文化在枪炮的护航下大量涌入，一时之间，国人对外来文化既充满了好奇，同时也对自身文化产生了质疑。在文化阵线里，一批学者甚至完全否定中国文化，试图通过“全盘西化”来实现中国文化近代化这一构想。在这种情况下，留学生将中国文化传播出去，其意义显得尤为突出。

民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极为不平静的时期，中国社会处于内忧外患，动荡不安的状态下。面对西方文化的咄咄逼人之势，中国文化向何处去，如何弘扬和光大中国文化，成为摆在当时学者面前的迫切问题。在当时，引进西方文化成为文化交流的主流，而介绍传播中国文化显然不属于主流文化发展的趋势。由于中国社会动荡，外国人很难通过官方的渠道更多了解中国的文化，因此，留学生们或是运用在国外留学的机会，在国外出版著作，向西方人介绍中国的文化；或是在国外举办各种形式的展览，宣传中国文化。有时候，他们还会采取更为直接的方式，向外国人介绍中国的文化，如亲自表演中国音乐，请外国人欣赏中国的音乐，品尝中国饮食，表演中国武术，这些献身说法，更有利于传播中国文化。

留学生将中国文化传播到海外，在近代中外文化交流史上具有重要意义。改变了近代以来片面强调引进吸收外来文化，而忽视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局面，不仅有利于将中国近代优秀的文化介绍到国外，让世界各国人民共享人类优秀的文化成果，也有利于中外文化交流。

（二）研究状况

关于文化交流的资料浩如烟海，但是，关于民国时期留学生与中国文化对外传播这个课题方面，却缺乏系统的研究，虽然宋柏年著的《中国古典文学在海外》^①对中国文学在海外的传播做了系统介绍，但是，这本书的着眼点在从一个较长时段考察中国文学在海外传播的情况，而传播中国文学的主体既有留学生，也有其他中国人，甚至还包括外国学者等人，该书无论是从结构上还是资料上，都对本文研究有着重要的启发。王丽娜的《中国古典小说戏曲名著在国外》^②一书，也是考察中国古典小说戏剧在海外传播的情况。而李喜所教授著的《近代留学生

^① 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1994 年版。

^② 学林出版社 1988 年版。

与中外文化》^①一书,在个别章节里面,对留学生传播中国文化的状况有所介绍,在李喜所教授主编的《五千年中外文化交流史》一书,在留学生传播中国文化方面也有一些介绍,这些著作都对本文的研究大有裨益。

在论文方面,多数学者倾向于研究留学生个体在文化交流方面的贡献,如胡荣彬对蒋彝在文化交流史上的贡献做了系统的梳理。^②郑达也对蒋彝在传播中国文化方面做了详细的阐述。^③宋媛从比较的视野下分析了辜鸿铭和林语堂在传播中国文化方面的差异。^④陈家洋分析了林语堂对外传播中国文化的特质。^⑤沈玲和鲍前程也对林语堂在文化交流方面的作用做了探讨。^⑥宫宏宇对王光祈在传播中国音乐方面的作用也有论述。^⑦罗天全论述了王光祈在中国音乐史上的成就。^⑧刘炎生对林语堂的《吾国吾民》一书在文化交流史上的贡献做了评价。^⑨陆耀东介绍了徐志摩在文化交流方面的贡献。^⑩而在2004年召开的留学史会议上,对留学生传播中国文化的状况,侯杰、高冬琴对宣传中国儒家文化的留学生陈焕章做了研究。¹¹杜玲对林语堂在文化交流方面的作用也有论述。¹²

综上所述,对民国时期留学生传播中国文化状况的研究上,仍然处于个体研究的状况,对传播中国文化的留学生的整体的研究还很薄弱,也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以上成果为本文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和有益的帮助。

(三) 论文结构

由于资料的琐碎和不系统,本文力图在整合大量资料的同时,综合前人的一些研究成果,将留学生与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关系加以梳理,采取叙议结合,以叙述为主的方法,尽力勾画出留学生为中国文化传播所作的贡献。本文结合大量的史实,分七个部分进行论述。

第一部分 论述传播中国文化的留学生群体的构成情况。

第二部分 介绍民国时期中国留学生传播中国儒家经典以及儒家价值观的情况。

第三部分 介绍中国留学生传播中国文学的情况,按照古典文学和现代文学

^① 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② 胡荣彬:《蒋彝的人生志向及其对中外文化交流的贡献》,《九江师专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2期。

^③ 郑达:《中华文化的国际使者——记旅美华裔游记作家、画家、诗人蒋彝》,《美国研究》,2003年第1期。

^④ 宋媛:《游子归乡与文人传教——辜鸿铭林语堂对外文化介绍的同与异》,《山西教育学院学报》,1999年6月版。

^⑤ 陈家洋:《林语堂“对外讲中”的透析》,《华文文学》,2004年4月版。

^⑥ 沈玲,鲍前程:《林语堂与中西文化交流》,《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9月版。

^⑦ 宫宏宇:《王光祈初到德国》,《黄钟》(武汉音乐学院学报),2002年第3期。

^⑧ 罗天全:《论王光祈在中国音乐史上的主要成就》,《音乐探索》,2003年第1期。

^⑨ 刘炎生:《向西方宣传中国文化的一部重要著作——评林语堂的〈吾国吾民〉》,《华南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6期。

^⑩ 陆耀东:《在中外文化交流桥上的徐志摩》,《外国文学研究》,1999年3月版。

¹¹ 侯杰、高冬琴:《弘扬儒家文化的留美学生陈焕章评析》,留学史会议提交论文。

¹² 杜玲:《林语堂与中外文化交流》,留学史会议提交论文。

的传播情况加以分类。在具体的内容上,古典文学按照文学样式分类,再按照国别进行论述;近代文学方面,按照翻译作品和原创作品的加以分类叙述。

第四部分 介绍中国留学生传播中国戏剧的情况。一方面是留学生介绍帮助中国剧团在国外演出的情况,其中有昆曲剧团和梅剧团;一方面是留学生在国外自己演出京剧的情况。

第五部分 介绍中国留学生传播中国绘画的情况。传播中国绘画以举办画展为主要的途径,包括国家出面举办的大规模画展和个人画展。演讲和出版书籍也是传播中国绘画的途径之一。

第六部分 介绍中国留学生传播中国音乐的情况。传播中国音乐包括介绍中国乐理知识和表演音乐两个方面。

第七部分 介绍中国留学生传播其他中国文化的情况。这一部分包括中国文化的很多方面,如饮食文化、中国武术、风俗习惯和书法艺术等等。

最后,通过对现有资料进行分析概括,运用系统的研究方法,阐述民国时期留学生传播中国文化的作用和意义,充分肯定了留学生在传播中国文化方面所作的贡献。

一、传播中国文化的留学生群体

民国时期的留学生在努力学习引进先进西方文化的同时,在向国外介绍和传播中国文化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成为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桥梁。

近代以来,受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影响,留学生的来源具有明显的不平衡性。来自南方各省的留学生较多,尤其是东南沿海的江浙一带。这主要是由于南方各省与外界接触的时间要早于其他内陆省份,风气比较开化,很多省份的沿海城市后来成为近代最早的通商口岸,这就为近代教育的发展创造了条件。此外,一些传教士为了扩大传教队伍,采取各种方式吸收教徒,并在中国举办各种文化事业,吸引中国人入会,在培养了中国教会人员的同时,也使中国的教徒们开阔了视野,很重视对子女的教育。在留学被世人认为可怕的年代里,他们成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将自己的子女送往国外接受西方教育,如颜惠庆、宋庆龄的父亲就是这样的典型。而另一方面,教士们开设的学堂,采取免费教育的方式,使一些家庭贫困的儿童也能够接受教育,甚至出国留学,由此产生了中国早期的留学生。正是由于南方各省开了近代留学风气的先河,才有更多的学子们走出国门,开阔了视野,从而为传播中国文化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

从留学生的家世背景看,大多数人都接受过中国的传统教育,因此大都具备较为深厚的国学根底,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比较熟悉。如梁宗岱幼时就在其父的指导下,攻读《四书》、《五经》及唐宋八大家的文章,还阅读了中国的古典文学名著,如《三国演义》、《水浒传》等,这为他后来在文学方面取得成就和传播中国文化打下坚实的基础。集作家、诗人、翻译家、语言学家、汉学家于一身的著名学者盛成,出身于江苏仪征的一个汉学世家,早期的启蒙教育为他后来评价中外文化产生重要影响。现代著名诗人兼学者的闻一多,出身于湖北的一个“世家望族,书香门第”,家庭的熏陶自然会对他的成长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

通过在国外学习,留学生们也深谙西方的近代文化,所以,他们在传播中国文化的时候,能够将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优秀成果结合起来,既保持中国文化的特色,又能够适应西方人的欣赏习惯,这一点在文艺方面体现得尤为明显。著名戏剧家齐如山能够对京剧如此痴迷,和他家乡盛行昆腔有着密切的关系,尤其是齐家几代人都会唱昆腔。耳濡目染的影响,使得齐如山幼年时虽然不会唱,却喜欢看武戏,这为他以后辅助梅兰芳改良中国京剧,随同梅兰芳访美演出都起到关键作用。中国著名戏剧家洪深生于官宦世家,不仅接受过私塾教育,还在清华留美预备学校接受严格的理科教育,培养了他的逻辑思维能力和抽象思维能力。留学美国后,对戏剧的爱好使洪深放弃了实业救国的梦想,投考哈佛的戏剧

专业。系统的专业训练，使他的戏剧造诣突飞猛进。这使得他能充分运用所学戏剧知识，将中国京剧作品搬上美国的舞台，为后来梅兰芳在美国演出的成功演出做了铺垫。对中国绘画方面，留学生们的看法并不一致，一部分人完全走上了西方绘画的道路，一生以创作西画为主；更多的留学生们，对中国传统绘画有着深厚的感情，他们在国外的学习，是为了运用西方的绘画技巧改进中国绘画，著名画家徐悲鸿就是这样一个人。徐悲鸿生于一个没落的农民家庭，父亲是一位业余的农民画家，在父亲的影响下，徐悲鸿从小喜欢画画，并打下了良好的绘画基础。而画家蒋彝的父亲也是一位业余画家，在父亲的熏陶下，蒋彝也对绘画产生了兴趣，父亲成为他的启蒙教师。上学以后，他的四叔祖延请江州著名画家孙墨千入府教自己的儿子绘画，蒋彝通过旁听、观摩、练习，打下了坚实的国画基础。而张善子和张大千兄弟二人，幼承家学，早年受到擅长绘画的母亲的影响，在绘画方面进步很大，尤其是张大千又从名师曾农髯、李梅庵学诗文、书法和绘画，为他实现诗书画一体的境界打下了基础，后来兄弟二人又双双留学日本，接受了西方绘画的训练，运用西方绘画技巧，表现中国画的内容，并自成一家，奠定了他们在中国近代绘画史上的地位。

在文化的其它领域也是如此。如蔡元培不仅是晚清的进士，接受过中国经典文献的学习，在国学方面的根基比较深厚，后来他又留学国外，开阔了视野，对中外文化才会提出“兼容并包”的主张，不仅为北大营造了良好的学术风气，也为中国文化发展提供了有价值的思路。

总之，这批留学生早期都接受过不同程度的传统文化的教育，这些教育使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比较了解，所以才能在后来国外的学习生活中，正确地看待两种文化的差异，既不会刻意抬高外国文化，也不会过分贬低中国传统文化。这种经历既有利于他们树立正确的民族文化观，又有利于他们积极学习外来文化，将传播中国文化的内容提上文化交流的日程，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中国文化在对外传播中的不利情况，扩大了中国近代文化在外国的影响力。他们当中的一些人，随着阅历的增长，自身文化修养的不断提高，对中国文化的看法也开始越来越理性化，由原来的崇尚西方文化开始向传统文化回归。在留学生们的努力下，中外文化交流的逆差局面有所改变，改善了外国人对中国文化一知半解的现象。

传播中国文化的留学生群体，以留欧生或留美生居多，也有少数留日生。由于留学日本的中国学生更多地倾向于政治活动，相对于留学欧美的留学生而言，有目的地传播中国文化的行为还是相对较少的。而且，自古以来，中日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就很频繁，近代以来也是如此，文字上的相似性使得中日文化交流比较顺畅，但是，中西文化的交流却并非如此，由于文化背景的差异，西方人对中国文化的理解难免存在误解，即使是一些西方汉学家们翻译的中国作品也存在着

这种问题。西方人对中国文化的几乎完全陌生的态度，使得留学生们更倾向于向欧美介绍中国文化。许多留学欧美的学生，出于学习的需要，曾经翻译过大量的文学作品，创作出具有中国风格的艺术品，在国外公开出版或者展览，表现了传播中国文化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还有一些留学生，当他们学有所成，堪称为“大家”的时候，通过出国访问或者讲学的方式来传播中国文化，所获得的影响力也就更为显著。如胡适、林语堂、老舍、张彭春、赵元任、萧乾、蒋彝、萧三等人，他们对中国文化十分熟悉，能够直接用外语进行创作，这首先克服了语言上的障碍，其次，利用他们在国外的影响力，在传播中国文化的时候，能够有目的地选择传播的内容，这对于外国人正确认识中国文化有着积极的意义。

自从容闳开创了近代留学的先河以后，出国留学的人渐渐多了起来，留学不仅成为获得新知的重要途径，也是国人趁机传播中国文化的最佳时机。留学生们在学习西方先进文化的同时，也迫切希望将中国文化的成果介绍到外国，既是出于交流文化的目的，同时也是想向西方人证明一个事实：中国的文化也是优秀的，不仅拥有辉煌灿烂的古代文明，同时，中国的现代文化也有足以傲人之处。在向西方传播中国文化的时候，留学生们需要面对的问题就是如何超越不同文化背景和民族之间的偏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交流。有感于近代以来西方文化大量涌入中国的情况，如何让中国文化走向世界成为近代学人普遍关注的一个话题。留学生通过在国外的生活，亲身感受到中外文化的差异，因而在传播中国文化的时候，就能够有针对性地做一些事情，让外国人真正认识中国文化。

二、翻译中国典籍，介绍中国精神

1. 翻译中国典籍

在儒家经典“西渐”的过程中，影响最大的，首推辜鸿铭。辜鸿铭生于马来西亚的华侨家庭，13岁时随父远渡重洋，留学欧洲，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腊、马来亚等9种语言。早在留学欧洲的时候，他就有了翻译儒家典籍的想法。他不满意西方汉学家们所翻译的儒家经典中误解、曲解的现象，即使像理雅各这样著名的汉学家，他翻译的“十三经”中的十部经文被统称为《中国经典》，在西方享有很高的声誉，一度被西方人视作标准译本，但在辜鸿铭看来，这些译作仍然存在死译硬译、断章取义的现象，“并不都令我们满意”^①，而且，这些汉学家们歪曲儒家经典的原义，导致了西方人对中国和中国文明产生了种种偏见。于是，他决定亲自动手翻译儒家经典。1898年，辜鸿铭在上海出版了他的第一本译著《论语》，1906年，又推出了第二本译著《中庸》，后来他还曾翻译了《大学》，但是没有正式出版。在《论语》的译序中，他声称自己并非想要对中国文化发表什么看法，“只是借此表达这样一个愿望：即有教养有头脑的英国人，但愿在耐心地读过我们这本译书后，能引起对中国固有成见的反思，不仅使其修正谬见，而且改变其对中国无论是个人还是国际交往的态度”^②。辜鸿铭的翻译并非十全十美，甚至有时候会出现矫枉过正的现象。然而，他翻译的儒家经典却成为近代西方汉学家和学者论述东方文明的重要参考书和征引对象。对于辜鸿铭翻译的儒家经典，我们既要看到他的缺点和不足，同时也要把它放在具体的时代背景下分析。正是因为有了辜鸿铭的这个译本，才打破了长期以来中国儒家经典的翻译被西方传教士和汉学家垄断的局面，在儒经西译的历史上有着积极意义。在文化交流史上，他的成绩无疑也是值得肯定的，毕竟这是中国人第一次独立翻译儒家经典的尝试，几十年后，曾有人这样评价他翻译儒家经典的价值：“近百年来……国内治学与国外留学，士子之多，其能皓首译经、将中国学术要籍有系统译为英文者，唯辜鸿铭一人而已！”^③这种评价还是比较公允、客观的。

此外，还有一些留学生也翻译了诸子的著作。如陈荣捷，1924年留学美国哈佛大学，1929年出版了《庄子哲学》一书。1931年，我国著名的哲学家冯友兰，留美归国后，应约为一个美国人的讲习班讲授《庄子》，后来将讲义整理出

^① 辜鸿铭著，黄兴涛、宋小庆译：《中国人的精神》，海南出版社1996年版，第138页。

^② 黄兴涛著：《文化怪杰辜鸿铭》，第76页。

^③ 翟立恒：《辜鸿铭》，《中国文化综合研究》，转引自黄兴涛著：《文化怪杰辜鸿铭》，中华书局1997版，第106页。

版，名为《庄子》，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初大告，1934年留学英国剑桥大学，1937年，他翻译的老子的《道德经》一书，由伦敦的爱伦和爱文出版社出版，以后又再版六次之多。他在英国攻读英国语言文学期间，就开始将中国古典诗词、哲学及其他文学作品翻译成英文，连续出版了3部译作。留学俄国的中国学者杨兴顺，曾以《〈道德经〉的哲学学说》为题，写作他的博士论文。蔡廷干是第二批留美幼童中的一员，是北洋海军的一名军官，晚年时弃政从文，醉心于中国文化典籍的翻译。他不仅拥有深厚的中国古典文学根底，而且精通英文，他翻译的作品，最终成书出版的有《老解老》（英语译注老子道德经）及《唐诗英韵》。1932年，《唐诗英韵》一书由美国的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书名为《用英文韵脚翻译的中国诗》。在“圣路易博览会”上，他的这两本书获得了国际文学界的好评。《老解老》一书在美国影响较大。其他没有成书的翻译作品还有英译《阅微草堂笔记》、《红楼梦选篇》等。

后来享誉国际文坛的留美学生林语堂，也曾翻译过中国的儒家经典。1938年，他的《孔子的智慧》一书，由美国蓝登书屋出版，这是林语堂首次向西方读者系统地介绍儒家思想。该书取材于《论语》、《礼记》和《孟子》，在这本书中，林语堂还第一次把《史记·孔子世家》全文译成英文。林语堂的《孔子的智慧》一书，并非从“学而时习之”开始，逐字逐句翻译，而是将其分门别类，重新编目，小题目有：孔子的感情生活；孔子的谈话风格；孔子论君子和小人；孔子论政治、教育等等。他不仅是一般的翻译，而且还编列评述，成为一本合乎逻辑、可读性强的书，也使西方读者了解了几千年来儒家学说是怎样深入中国人心的。林语堂在介绍中国文化方面的另一本重要译作是《老子的智慧》，即英译《道德经》，1949年由蓝登书屋出版。《老子的智慧》取材于《道德经》上下篇八十一章，他还从《庄子》内外杂篇三十三章中摄取“精选”，分别配附在《道德经》各章之后。虽然自19世纪开始，《道德经》已经被译成多种语言，但是，林语堂运用自由诗体所译的版本，仍然十分成功。而且，比之前者，无论在内容、气势与风格上，都更为忠实，文字表达上也凝练准确，是一本全面阐释道家学说的译著，该书对西方人了解中国的文化心态大有裨益，比通过来中国旅游而获得的感官印象更深刻。

2. 介绍中国精神

辜鸿铭算得上是传播中国文化最早的留学生之一，这个号称“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的人，运用他娴熟的外语，发表了很多言辞犀利文章批评西方的制度，宣扬中华文明。1910年，辜鸿铭用英文写成的《中国

牛津运动的故事》一书，是他平时发表的部分文章汇总而成。该书出版后，十分畅销，出版社不得不再版。德国汉学家卫礼贤将该书的主要内容译成德文，收入《中国对于欧洲思想的抵抗：批判论文》一书中，1911年在德国出版。该书在德国思想界反响很大，各大报纸，如《法兰克福报》、《民族报》等多家报纸，均发表评论。辜鸿铭如此受到关注，除了他的个人才能外，还在于他的思想对德国一些精英人物产生的影响力。1915年，辜鸿铭的《中国人的精神》（又名《春秋大义》或《原华》），由北京的每日新闻出版社出版，1922年，北京的商务印书馆再版。《中国人的精神》是辜鸿铭最有影响的作品之一，该书是由作者1914年发表在英文报纸《中国评论》上的、以“中国人的精神”为核心的一系列论文结集而成。辜鸿铭在《中国人的精神》的开场序言中明确提出，估价文明的价值“不在于是否修建了和能够修建巨大的城市，宏伟壮丽的建筑和宽广平坦的马路，也不在于它是否制造了和能够造出漂亮舒适的家俱，精致实用的工具、器具和仪器，甚至不在于学院的建立、艺术的创造和科学的发明”^①。在他看来，文明的价值在于这种“文明所产生的男人和女人——人的类型，正好显示出该文明的本质和个性，也即显示出该文明的灵魂。”^②辜鸿铭的这本《中国人的精神》的目的就在于“揭示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宣扬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鼓吹儒家文明救西论。”^③将中国人的精神展示给西方人，以改变西方列强对中华民族的欺凌和对中国文化的歧视的态度，也是为了拯救陷入“迷雾”中的欧洲，给困惑中的人们以启迪，表现了辜鸿铭的人文关怀。此书出版后，立即受到西方媒体的广泛关注，尤其是在战后的德国，亲历战争苦难的人民，对西方文明的价值产生怀疑甚至至于绝望，并迅速被翻译成德文，法文，日文等文字，成为当之无愧的世界名著。其中可以独立成篇的内容，还曾为西方报刊节录摘译，不仅中国版本供不应求，就连德文本也在1924年重印，由此可见，西方人对于辜鸿铭的思想是认可和接受的。1920年，德国莱比锡出版了由奈尔逊教授翻译的辜鸿铭的论文集《呐喊》，又名《哀诉之音》。这是辜鸿铭在一战期间用英文写成的评论文集，书中各篇文章原来发表在报纸上，有《基督教派与战争》，《现代教育与战争》，《民主与战争》，《现代报纸与战争》，《日本的辩解》，《孔教研究》及《美国人的心态》等文章，因此，很多内容都是在讨论战争与社会的关系，很受西方人的关注。辜鸿铭在日本讲演的论文由日本大东文化协会集结成《辜鸿铭讲演集》于1925年在日本刊行。1941年，日本人萨摩雄次在日本编译出版了《辜鸿铭论集》，主要篇目是从《辜鸿铭讲演集》和《中国人的精神》中选译出来的。辜鸿铭的大名和他的著作名扬海外，他的观点更是给陷入战争阴影下的欧洲带来一股清新之风。

^① 辜鸿铭著，黄兴涛，宋小庆译：《中国人的精神》，海南出版社1996年版，第3页。

^② 辜鸿铭著：《中国人的精神》，第3页。

^③ 辜鸿铭著：《中国人的精神》，第5页。

林语堂也是介绍和宣传中国精神和中国观念很有成绩的留学生。他在赛珍珠的支持下，写了一本介绍“什么是真正的中国人”的书，即《中国人》。这是一本用英文写作的书，是向外国人介绍中国的书，书中讲了中国人的性格、心灵、人生理想、生活等方面。（这期间包含妇女生活、社会生活与政治生活、文学生活、艺术生活及人生的艺术等）。1935年，这本《中国人》在美国出版后，引起的轰动效应比预想的要大得多，“仅仅在9月至12月的四个月时间里就印行了7版之多”^①，许多评论家纷纷著文赞扬这一著作。《星期六文学评论》周刊的书评家伯发认为这本书是“以中国为题材的最佳之作，对中国有真实、灵敏的理解”。赛珍珠更是以理性而又深情的笔触写下这样的评价：“它实事求是，不为真实而羞愧。它写得骄傲，写得幽默，写得美妙，既严肃又欢快，对古今中国都能给予正确的理解和评价。我认为这是迄今为止最真实、最深刻、最完备、最重要的一部关于中国的著作。更值得称道的是，它是由一位中国人写的，一位现代的中国人，他的根基深深地扎在过去，他丰硕的果实却结在今天。”^②这是中国人开始真正向美国人介绍中国文化的良好开端。从此，林语堂一发不可收拾。1937年，他的《生活的艺术》一书由约翰·戴伊公司出版。在书中，林语堂向外国读者传达了中国人的一种生活观念：旷达乐观，陶情遣兴的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以及浪漫高雅的东方情调。将这种“生活最高典型”的模式向西方人娓娓道来，以至于有的书评家（Peter Precott）称：“读完这书后，我真想跑到唐人街，一遇见中国人，便向他行个鞠躬礼。”《生活的艺术》是林语堂继《中国人》之后，再获成功的一部英文作品，翌年更是高居美国畅销书排行榜榜首达52周，接连再版40余次，被翻译成法、意、荷等十余种文字，成为欧美各阶层的“枕上书”。在美国迅速掀起了“林语堂热”。以这两本书为代表，拉开了林语堂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的序幕。1943年，他的政论集《啼笑皆非》由约翰·戴伊公司出版。1947年出版了《苏东坡传》。林语堂为改变西方人对中国的印象做出过巨大贡献。但是林语堂向西方人介绍的中国形象是他自己所理解的中国，实际上是中国传统士大夫对中国的认识。

^① 《林语堂与赛珍珠是怎么变为仇人的？》，见中华文化网，
http://culture.china.com/zh_cn/book/famous/306/20020222/10212585.html

^② 《赛珍珠序》，见林语堂著《中国人》，学林出版社1994年版，第8页。

三、留学生与中国文学的传播

1. 留学生与古典文学作品在国外的传播

中国古典文学在海外的传播并非始于近代。明清之际,大批耶稣会传教士东来,不仅带来了“上帝的福音”,同时,他们也凭借自己的汉学功底,将中国的古典文学翻译成西方的各种文字,使西方人开始接触到东方的精神文明。这些文学作品上至《诗经》,下至元曲、明清小说,几乎将中国的古典文学样式网罗殆尽。但是,由于这些传教士们还担负着传教的使命,所以,他们在对儒家经典的翻译上,难免会带上宗教的色彩,披上宗教的外衣。之后,随着“礼仪之争”的出现,大批传教士被驱逐,西方传教事业被迫中断,“东学西渐”的历程也戛然而止了。

但是,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门户大开,一批伴随着不平等条约而来的西方的传教士们,再一次掀起了翻译中国古典文学的热潮。然而,客观上,我们又不得不承认,由于中西方在语言、文化和习惯上的差异,使得这些传教士在译介中国文学作品的时候,难以达到原著所要表达的境界,反而会产生僵化、生硬的感觉,造成对中国文化的误读。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由于缺少懂外语的翻译人才,这种状况没有多大改善。直到近代留学生群体的出现,情况才发生显著变化,在留学生当中,不乏既具有良好的国学功底,同时又兼通外语的知识精英们,这就为中国文化在近代得以再次传向西方创造了必要条件。

(1) 古典诗歌的翻译

古典诗歌是中国文学之苑中的一朵奇葩,不仅历史悠久,而且体裁多样。从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开始,诗歌这一文学样式进一步发展,在唐朝时达到顶峰。中国一度被称为“诗的国度”,将这一优秀的文化成果传播到国外,留学生们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

在中国古典诗歌的翻译上,情况各不相同,有些人只是零星的发表译作或是在其写作的文学作品中翻译一些古诗,如辜鸿铭《中国人的精神》一书中,就有他翻译的唐代诗人朱庆余的《近试上水部》、陈陶的《陇西行》、杜甫的《赠卫八处士》和《诗经·关雎》的片段。其中,《诗经·关雎》这一片段还曾在1913年的《北京每日新闻》上发表过。另外,林语堂《中国人》一书中,也翻译了20多首中国古典诗歌,其中有《诗经·褰裳》、《诗经·斯干》的片段,《千家诗》中的一首,陶渊明的《责子》,南北朝乐府民歌《琅邪王歌》、《敕勒川》、《折杨

柳歌辞》、《子夜四时歌》中的《冬歌》中的一句诗，描写爱情的《读曲歌》的第六首诗，《松下问童子》，唐代诗人王建的《新嫁娘词三首》中的一首，李白的《送友人入蜀》、《月下独酌》，杜甫的《漫兴》、《石壕吏》，王维的《送梓州李使君》，刘禹锡的《秋日题窦员外崇德里新居》，韦庄的《金陵图》，宋代诗人叶李的《暮春即事》等。这些诗篇，根据文章内容的需要，或是节译，或是全译，并对诗的意境和作者表达的思想感情做了分析和介绍，林语堂通过这本《中国人》，除了让外国人看到一个真正的“中国人”以外，还使外国人欣赏到中国的古典诗歌，可谓一举两得。在他另一本重要的著作《生活的艺术》一书中，为了描述中国人的生活，他也翻译了一些诗歌，如李密庵的《半半歌》、陶渊明的《归去来辞》。在他所写的《苏东坡传》一书中，还引用了许多首苏东坡的诗作，这可能是最早将苏东坡的诗翻译成外文的作品。著名的平民教育家陶行知（1914年赴美留学，也是一位独树一帜的大众诗人），也曾将中国的古典诗歌翻译成英文，在文化交流史上做出了贡献。他选的诗，不拘一格，以反映中华民族精神的内容居多，如《木兰辞》、黄巢的《菊花诗》、郑板桥的《岩竹诗》等等。

五四前后，利用法国庚子赔款创办的里昂中法大学，更是为中国人留学法国创造了有利条件，使得这一时期中国人留学法国的人数剧增。在20世纪20年代的这一时期里，中国留学生的很多译作在法国大量发表，尤其以翻译中国古典诗歌居多，为推进唐诗在法国进一步流传，促进中法文学交流做出了贡献，也给略显寂静的法国翻译界带来了生机。

1922年，留法学生曾仲鸣编译的《中国诗文选》，由里昂的德维涅公司出版。法国著名诗人克洛代尔编写的法文诗集《根据中文改写的短诗》和《其他根据中文改写的短诗》，其中一部分中国诗歌的翻译就是根据曾仲鸣的中诗法译改写而成的，可见，曾仲鸣的法译诗还是质量较高的。留学法国的中国诗人梁宗岱，曾将王维的诗翻译成法文，在法国的《欧洲》杂志上发表。1929年，梁宗岱将自己翻译的陶渊明的诗歌《饮酒》、《归田园居》、《咏贫士》和散文《归去来辞》、《桃花源记》、《五柳先生传》等译作，寄给罗曼·罗兰，当罗曼·罗兰看到这些诗后，回信称：“你翻译的陶潜的诗使我神往，不独由于你的稀有的法文知识，并且由于这些诗歌单纯、动人的美。”^①而法国名诗人保尔·瓦雷里对梁宗岱翻译的诗也很感兴趣，鼓励梁宗岱将这些译作印成单行本出版，并答应为之作序。1930年，这些译作结成《陶潜诗选》，由巴黎的勒马日出版社出版。在序言中，瓦雷里对陶渊明的诗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称之为“在极端的精巧”之后达到了“极端的朴素”，把陶渊明甚至比作了“中国的维吉尔和拉封丹”^②。诗集出版后，陶诗在法国读者中的影响进一步扩大。

^① 宋柏年著：《中国古典文学在海外》，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4年版，第110页。

^② 维吉尔诗古罗马的诗人，拉封丹是法国17世纪的著名作家。

徐仲年，江苏无锡人，1921年留学法国，他的法文译作较多。如在法国《水星》杂志上发表了《中国诗人杜甫》，在《交流》上发表了《李白诗》、《杜甫诗》，在《里昂大学杂志》上发表了《白居易研究》、《子夜歌选》等。1930年，徐仲年以《李太白的时代、生平 and 著作》为题，获得了文学博士学位。他翻译的15首《子夜歌》，一度风靡巴黎文坛。1933年，他编译的《中国诗文选》一书，由巴黎的德拉格拉夫书店出版。回国以后，徐仲年继续在中外文化交流的园地上辛勤耕耘，曾在《上海月报》、《北京新闻报》上发表郭沫若的《暮春》、《子夜新歌》、《唐人小说》、《徐文长》、《杜甫的师承》等法文译作及论文。

1933年，罗大冈以公费留学法国，在欧洲留学期间，他曾用法文先后在巴黎的《欧洲》月刊及日内瓦的《Lettres》等刊物上发表诗和散文诗。1946年，罗大冈的法译著作《唐人绝句百首》和《古镜诗》，由瑞士Baconniere出版社出版。同年，他还出版了他的译著《先是人，然后才是诗人》，这一译著主要译介了中国古代诗坛上的七名大家，即屈原、陶潜、李白、杜甫、白居易、李贺和李清照。这本书成为法国圣·德尼侯爵《唐诗选译》的重要补充，“第一次在法国读者面前再现了我国七位伟大诗人的形象，字里行间充满着民族自豪感”^①，对西方人了解中国文化具有积极意义。1937年，初大告（1934年留学英国剑桥大学）翻译的《中国抒情诗选》，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

另外，还有一些诗歌，或是由中国留学生与外国人合作翻译而成，或是得到了中国留学生的帮助，从而使译著更接近于原著。英国汉学家亚瑟·韦利，与曾多次向徐志摩请教关于唐诗的问题，这对他以后准确翻译唐诗，很有益处。日本著名翻译家小畑熏良翻译的《李白诗集》，也曾得到了中国留学生的帮助。留学美国的江亢虎与美国人宾纳合作翻译的《群玉山头：唐诗三百首》（依据清代蘅塘退士所编《玉山》为蓝本），1922年由纽约的诺夫书局出版，1931年再版。“此集原本平易近人，家弦户诵，兼之中西合作，译笔准确，用语雅驯，甚得读者喜爱，1964年再次刊印”。^②该书采用散体译法，使得诗文既不失生动活泼，又较好地表达了原诗的情意，在西方学术界颇得好评。但是，我国著名语言学家吕叔湘对此却评价不高，他认为“译诗无直译意译之分，未有平实与工巧之别。散文体诸译家中，洛维尔、韦利、小畑皆以平实取胜，而除洛维尔外，亦未尝无工巧，至于宾纳，则颇呈工巧，而未尝无平实”^③。可见，诗是很难翻译的，虽然出于文化交流的目的，翻译是必要的，但是由于语言和文化的差异，翻译的结果都会和原著有一定的距离，即使能达到所谓的神似，和原著仍然会有一定的距离。原诗的意境和感情在很大程度上是与原来的文字深深地嵌合在一起，他们是一体

^① 钱林森编：《牧女与蚕娘》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362页。

^② 江原：《中国古典诗论在西方》，http://www.cass.net.cn/chinese/s15_wxs/hanxue/03.htm。

^③ 马祖毅，任荣珍著：《汉籍外译史》，湖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353页。

的,由文字而成诗,由诗而发现文字的美,语言的形式变了,诗的韵律和节奏自然也会改变。但是,不可否认,将中国的古代诗歌介绍到海外这一行为,还是值得积极提倡的,文化只有在互相交流中才能获得进步。

将中国的古典诗歌传播到国外,留学生们做出了他们的贡献。他们利用自己娴熟的外语,将中国的古典诗歌翻译成各种西方文字,译介到海外,充当了中国诗歌外译的使者。这就扩大了中国古典文化在海外传播的范围和影响,让世界人民共同享有这一文化成果,是对世界文学的重大贡献。

(2) 古典小说的翻译

中国古典小说最早可以上溯到魏晋南北朝的志怪小说和唐代的传奇;宋、元时期进一步发展,出现了话本小说和文言小说;明、清两朝,小说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并成为那个时代文学的中心样式。尤其是明末清初之际,四大古典名著的出现,使中国古典小说的艺术成就达到了最高峰,因而在向外国介绍中国古典小说方面,留学生们将侧重点很大程度放在了明清小说上。

徐仲年编译的《中国诗文选》中,摘译了《西游记》的两段译文。一段题为《孙猴的变化》,即《西游记》第六十一回“孙行者三调芭蕉扇”的摘译。两段译文的前面编有译者所写的《吴承恩与〈西游记〉》及尤侗《西游记序》的译文。1933年,巴黎的韦加出版社出版了由留法学生吴益泰编写的《中国小说概略论》。该书在介绍中国神魔小说的时候,摘译了《西游记》第六回的文字,并附有一幅《西游记》的插图。另外,该书还收有《金瓶梅》的片断译文。1944年,陈智诚与陈智发出版了《西游记》英文节译本——《魔猴》。在1946年出版的《中国智慧与幽默》一书中,收有王际真翻译的《西游记》前七回的英译文,虽然仅是节译本,但是毕竟迈出了将中国的四大古典名著推向世界的步伐。

《红楼梦》是曹雪芹精心构撰的天才之作,“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在艺术上,它达到了中国小说前所未有的成就,其深厚的文化底蕴以及复杂的情节,仅靠一人之力短时间是难以翻译出来。为了将这一古典文学名著介绍到国外,许多留学生多采取节译的办法翻译此书。因此,《红楼梦》的节译本比较多。在美国,最早出版的两个节译本《红楼梦》都是由中国的留学生翻译的。其中之一即是由王良志翻译,1927年在纽约出版的节译本《红楼梦》,全书共95章,约60万字,以贾宝玉和林黛玉之间的爱情故事为主。另一个版本是由王际真翻译,1929年由纽约的道布尔戴·多兰公司和英国伦敦劳特莱基出版公司共同出版的《红楼梦》,全书三十章,阿瑟·韦利为之作序。在书中人物名字的翻译上,译者采取男名译音,女名译意的办法,这一版本多次被重印,在英语读者中很有影响。后来,译者又进一步修订补译,增加到六十章,1958年再版。“经过30年的时间,他的剪裁技巧是高明的……译文是精当的,能够表达原书的精

神。”^①虽然均是节译本，但是却满足了外国人欣赏中国名著的需要，“使通晓英语的读者得到满足”^②。1928年，丁文渊（著名地质学家丁文江之弟，留学德国，曾担任德国法兰克福中国学院的副院长。）翻译的德文本《红楼梦》，摘译了第21、22回的部分情节，刊于《中国学》杂志第4期上。1933年，徐仲年翻译的法文本《梦在红楼》一书，由巴黎的德拉格拉夫图书公司出版，书中摘译了《红楼梦》的第17、27、28、31、32回。1943年，鲍文蔚（1928年赴法国留学）翻译的法译本《红楼梦》第57回，刊于《法文研究》第4期上，并附有中文对照。

除了四大名著之中的《红楼梦》和《西游记》被译介绍到西方以外，中国的其他古典小说也被留学生介绍到了国外。1921年，《中国》的第一卷刊载了吴益泰翻译的《今古奇观》中的一篇《转运汉巧遇洞庭红》，并且附有中文原著及汉字译音。1923年，贺敬瞻的《中国短篇小说集》，由巴黎尚皮翁书局出版，书中译有《聊斋志异》中的19篇故事。1937年由伦敦基根·保·特伦特·特鲁布纳出版的《中国故事集》中，收入了初大告翻译的《聊斋志异》的单篇《种梨》、

《三生》和《偷桃》。虽然聊斋中所讲的故事多为鬼神的故事，但是在《法国大百科全书》中，称《聊斋志异》为“中国古典散文的高峰”，它代表着中华文化的精华，是“中国人心里和梦幻的反映”，成为认识中国文化不可忽视的一个方面。蒲松龄向世人展示了“一个令人大为称叹的民族的深奥的梦幻”。另外，吴益泰编译的《中国小说史略》一书中，收有《儒林外史》的片断译文。徐仲年的《中国诗文选》中，译有“范进中举”的内容。1946年，高克毅编译的《中国智慧与幽默》一书中收有王际真翻译的《儒林外史》的片断译文，题目为《两学士中举》，是原著中的第二、三两个回目的内容，即《范进中举》，译文引人入胜，反响不错。《中国智慧与幽默》一书广泛搜集中国古代与现代的趣闻逸事，其中王际真与埃塞尔·安德鲁斯合译了李汝珍的《镜花缘》一书，题为《游历奇异之帮》（摘译），还有《水浒传》、《儒林外史》、《红楼梦》等等。译者对于所选译的小说、戏曲的内容做了必要的介绍，来指导西方读者的阅读。1936年，林语堂将《老残游记》的二集六回，译成英文，题名为《泰山的尼姑》，书中收有《庄子修鼓盆成大道》，《赫大卿遗恨鸳鸯缘》，《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等三篇故事，由商务印书馆发行，在西方亦颇为流传。1951年，林译本又由美国约翰·戴出版社出版了修订本，改名为《寡妇·尼姑·名妓》，这本书还收入了《三言二拍》里的一些故事。1971年，由西点格林伍德出版社再版。1939年，林疑今（1936年留学美国，林语堂的侄子）、葛德顺二人合作，将《老残游记》翻译成英文，题名为《行医见闻》（Tramp Doctor's Travelogue），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47

^① 马祖毅，任荣珍著：《汉籍外译史》，湖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384页。

^② 马祖毅，任荣珍著：《汉籍外译史》，湖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384页。

年,杨宪益(1934年留学英国牛津大学)、戴乃迭夫妇翻译的《老残游记》英译本,由南京独立出版公司出版。1948年,这个译本又由伦敦的阿兰及岸温有限公司出版。1939年,伦敦的G·娄特里奇出版社出版了英国人艾支顿翻译的英文全译本《金莲》,共四卷。这本书的翻译得到了老舍先生的指导,所以译文比较准确。这是一本全译本的《金瓶梅》,只是将书中猥亵的文字改译成拉丁文。并在书中特意强调,“如果没有他的不屈不挠的慷慨的帮助,我跟本没有勇气接受这件翻译任务”^①。在老舍的帮助下,这部16世纪中国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品得以展现在西方读者面前。这本书出版后,获得了研究者的好评,并一版再版。1944年,王际真编写的《中国传记故事集》,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其中包括《醒世恒言》里的四篇译文,即《错斩崔宁》、《爱花人与花仙》、《三兄弟》和《卖油郎独占花魁》。1944年,林语堂编译的《中国与印度之智慧》一书中,林语堂选译的中国作品共有九种,收有《搜神记》中的两则故事,还选译了《浮生六记》,该书介绍了中国和印度的部分文学名著。

总的来看,将中国的古典作品介绍到国外,留学生们表现得十分积极,无论是在作品的种类上,还是样式上,都是可圈可点的,他们选择的文学作品,代表了中国古典文学的精华。对中国古典作品的翻译,采取多种形式,或是独立完成;或是合作翻译;或是中国人翻译,由外国学人进行润色;或是中国人进行口译,外国的学者将之笔译出来;还有一种是以外国学者的翻译为主,中国的留学生进行协助翻译,作必要的解释。这些多样的翻译形式,保证了中国古典作品在外译的过程中,能够尽量符合中国原著的精神,保留原著的风格。中外学者的合作,共同推动了中国文化在世界的传播,成为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话,让全世界共同分享中国文学的优秀成果。

2. 现代小说的翻译和创作

在翻译中国近代文学作品方面,留学生们也十分积极。有些留学生主动将自己的作品翻译成外文发表;有些留学生自己的作品,并非由本人翻译,但作者会不同程度的参与翻译;还有些是留学生直接用外语写作,在国外出版。无论那种方式,都有利于中国现代文学的传播。但是,从中国现代文学在海外产生的影响看,留学生用外语独立创作的文学作品,由于适应外国人的接受心理,更吸引外国读者,在国外的影响更大,更有利于促进外国对中国文化的了解。

^① 舒乙:《老舍》,甘海岚编:《老舍年谱》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17页。

(1) 留学生翻译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品

由留学生介绍到国外去的中国现代小说，以鲁迅的作品居多，扩大了鲁迅在国外的知名度和影响力。许多中国留学生在翻译鲁迅作品的时候，或多或少地得到了鲁迅本人的热心帮助，因而使译作能够最大程度地接近原著。留学生翻译的鲁迅作品不仅版本众多，而且形式多样，既有节译本，也有全集。

①英译本。192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美籍华人梁社乾翻译的《阿Q正传》，这是鲁迅小说最早的英文版本，该书译完初稿后，梁社乾将译稿寄给鲁迅（早年留学日本）审阅，鲁迅不仅认真审阅书稿，并更正了一些错误之处。1929年，留法学生敬隐渔编译的《中国当代短篇小说家作品选》在巴黎出版，其中有鲁迅的《阿Q正传》、《孔乙己》和《故乡》。1930年，他的这本小说集被英国人米尔斯译成英文，改名为《阿Q的悲剧及其他当代中国短篇小说》，在英国出版，1931年又在美国出版。1935年，王际真翻译的《阿Q正传》在美国的《今日中国》杂志上发表。而在美国的《远东杂志》上，每年都有一期发表鲁迅的作品，王际真翻译的有《风波》、《祝福》等篇。1936年，英国伦敦的乔治·C·哈拉普公司出版了斯诺编选的中国近代小说集《活的中国》，这部小说在编选之初得到了以鲁迅为首的一批留学生的帮助。该书从推荐文章到选稿，润色，翻译等事宜，都倾注了鲁迅等人的大量心血。茅盾，林语堂，郑振铎，萧乾，顾颉刚，姚克，杨刚（大公报女记者）等人，以不同的方式，帮助斯诺编译这部小说，或是提供文章，或是协助翻译。其中鲁迅的小说有《药》、《一件小事》、《孔乙己》、《祝福》、《风筝》、《论“他妈的！”》、《离婚》等八篇，几乎占全书的三分之一，这是英国出现的最早介绍鲁迅小说的作品。另一位美国记者伊罗生编选的小说集《草鞋脚》，也是在鲁迅的帮助下完成的。鲁迅和茅盾应约为其编选的小说集提供书目，撰写介绍材料，在这部集子中，收有鲁迅的《狂人日记》、《药》、《伤逝》、《孔乙己》和《风波》等小说。1941年，王际真将选译的鲁迅短篇小说，题名为《阿Q正传及其他》，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书中除收有《阿Q正传》外，还有《故乡》、《离婚》、《祝福》、《伤逝》、《在酒楼上》、《头发的故事》、《狂人日记》、《风波》、《孤独者》和《肥皂》等11篇小说，可以说，这是在美国出版的第一本鲁迅的小说。1943年，王际真编译的《中国现代小说选》一书中，还收有鲁迅的《端午节》和《示众》两篇小说。

②俄译本。“中国大革命前，苏联的所谓汉学家，几乎也都沉浸在中国旧文化里，尤其是热衷于《四书》、《五经》和唐宋八大家，至多也不过介绍一点像《聊斋》之类而已。至于现代中国文学，都几乎无人过问”^①。20世纪20年代，曾留学苏联的曹靖华在开封的国民革命军军事顾问团担任顾问期间，与同在顾问团

^① 高莽：《革命的盗火者 友谊的架桥人》，转引自张德美，冷柯编：《曹靖华纪念文集》，1992年10月版，第331页。该书见超星数字图书馆。

任职的苏联汉学家王希礼相识，他将鲁迅的《阿Q正传》推荐给了这位汉学家。读过《阿Q正传》之后，王希礼对鲁迅的这一作品拍案叫绝，在曹靖华的帮助下，开始着手翻译《阿Q正传》。由于不懂绍兴地方赌博的土话，翻译遇到困难。于是，曹靖华把所有疑难问题开列出来，并写了一封信给鲁迅，信内还附了王希礼的一页信。信中除请鲁迅先生解答疑难之外，还请他为俄译本写一篇序、一篇自传，并附寄近照一张。^①鲁迅完全满足了王希礼的要求，对他的问题给予了详细的解答，尤其是关于赌博的内容，专门画出解说图，以便于理解。这些情况，鲁迅在日记中都留下了记录。该译本1929年由列宁格勒的“激浪”出版社出版，此外，书中还收有鲁迅的《孔乙己》、《风波》、《故乡》等七篇小说。这部小说集“好像第一只春燕，衔着友谊的花蕾，在风雪交加中，冲破了封建军阀的天罗地网，横越浩瀚的蒙古沙漠，飞到苏联”^②。王希礼翻译的这本《阿Q正传》的出版，如同一声春雷，唤醒了沉溺于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中的苏联汉学家，从此以后，中国的现代文学在苏联也开始有人问津了。正是在曹靖华的影响下，王希礼不仅接触到了一些新式知识分子，而且了解到了“五四”以后中国的新文学，成为向苏联读者介绍中国新文学的第一人，从而扩大了中国现代文学作品在苏联的传播范围和影响。

著名的革命家兼诗人的萧三，也是一位积极宣传鲁迅的留学生。他早年赴法勤工俭学，后转往苏联学习，他是最早在苏联向全世界宣传鲁迅和介绍中国左翼文学的人，曾代表鲁迅出席苏联作家第一次代表大会。他写了一篇关于鲁迅的小散文，发表在《真理报》上，后来又写了许多介绍鲁迅生平事迹和纪念鲁迅的文章。在《国际文学》任编辑的时候，萧三用俄、德、英、法等文字介绍过鲁迅的作品，同时，他还参加了苏联出版的《鲁迅全集》的编辑，担任总校订一职。对鲁迅的崇敬，萧三终生不渝。在鲁迅逝世一周年的时候，他又写了十几篇文章来纪念鲁迅，扩大了鲁迅在苏联的影响，可以说，鲁迅之所以为苏联的广大民众了解和接受，与萧三的积极性努力分不开。

③法译本。留学法国的敬隐渔，成为第一个将鲁迅的小说介绍到西方去的中国人，也是第一个将《阿Q正传》译成法文的中国人。敬隐渔，四川遂宁人，因翻译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而与这位法国文豪结缘。1925年，在罗曼·罗兰的帮助下，赴法留学。敬隐渔在里昂中法大学读书期间，多次与罗曼·罗兰通信，并在罗曼·罗兰的支持下，开始将中国一些现代作家的作品译成法文。为了翻译好鲁迅的作品，敬隐渔专门致函鲁迅，鲁迅得知他要翻译自己的作品的事情后，很快回了信，并将自己参与编辑的四本《莽原》杂志寄给敬隐渔，以资借鉴。不久，敬隐渔翻译的《阿Q正传》在罗曼·罗兰主编的《欧洲》月刊第四

^① 曹靖华编：《曹靖华抒情散文选》，作家出版社1988年版，第128页。

^② 曹靖华：《好似春燕第一只》，《曹靖华文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47页。

十一、四十二期上发表(即1926年5月号 and 6月号)。虽然原著的《序》被删去,其余各章也均有节略,但这却是《阿Q正传》最早的法文版本。罗曼·罗兰对鲁迅笔下的阿Q形象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称赞“阿Q传是高超的艺术作品。其证据是在读第二次比第一次更觉得好。这可怜的阿Q的惨象遂留在记忆里了”^①。《阿Q正传》译文发表后,敬隐渔立即将刊有该译文的《欧洲》杂志寄给鲁迅。鲁迅收到刊物后,对于敬隐渔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学作品的行为,极为支持,“认为敬隐渔能够为中国文艺作品宣传到国外做点工作”^②,于是,他按照敬隐渔来信的请求,到书店花了15块大洋,选购了33种国内作家的小说,给他寄去。后来,敬隐渔又翻译了鲁迅的小说《故乡》、《孔乙己》,还翻译了其他一些中国现代小说家的作品,和《阿Q正传》一起,收入了1929年由巴黎德埃台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当代短篇小说家作品选》中。这部作品选中的作品,大多来自鲁迅先生邮寄的这33种书中。继敬隐渔之后,同是中法大学学生的徐仲年,1931年在巴黎的《新法兰西》杂志上开辟了“中国文学”专栏,将鲁迅的《呐喊》介绍到法国,成为第一个把鲁迅的小说集《呐喊》译成法文的留学生。1933年,徐仲年的《中国诗文选》一书中,就曾收有鲁迅的小说《孔乙己》。1934年,他在法文《上海日报》星期日增刊上,开辟了“今日之中国文学”专栏,介绍鲁迅的小说《肥皂》。

④日译本。鲁迅作品的日译本多是在鲁迅的协助下,由日本人翻译的居多。如井上红梅翻译的日译本《阿Q正传》,有鲁迅亲自画的“赌博的解说图”,这张图后来还被印在“改造社”出版的《鲁迅全集》的卷首。1931年10月,日本人山上正义(即林守仁)的日译本《阿Q正传》,由四六书院出版。鲁迅不仅给予指导,参与翻译,并且作过“严密的校阅”,写下了85条之多的校释,译文的字意和关于中国日常生活、风俗习惯、尤其是辛亥革命的情况和五四前后的文言文和白话之争,鲁迅都做了详细地校释,以便于日本读者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另一位日本人增田涉热衷于翻译鲁迅的作品,是在翻译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时结下的缘分。通过内山完造的介绍,增田涉在上海认识了鲁迅。为了帮助他翻译好这本小说,鲁迅“从三月中旬到七月中旬,每天下午抽出三小时左右,用日语向他讲解。……鲁迅逐字逐句仔细讲解,他边听边做笔记”^③。在和增田涉的通信中,鲁迅对他提出的各种疑问,给予清晰、缜密的解答,“一人一事的来历,一字一句的含义,都讲的很清楚”,许多典故的出处,一些词语的译法,都做了详尽的解释和清楚的说明,对一些误译的地方,也认真改正。^④1935年,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的日译本,以《支那小说史》为名,由汽笛社出版。这一作品在日

^① 杨建民:《罗曼·罗兰与敬隐渔》,转引自《中华读书报》,2004年8月2日。

^② 杨建民:《罗曼·罗兰与敬隐渔》,转引自《中华读书报》,2004年8月2日。

^③ 林治广,刘献彪编:《鲁迅与中日文化交流》,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2页。

^④ 林治广,刘献彪编:《鲁迅与中日文化交流》,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3页。

本流传颇为广泛，各个大学的中文系将它作为教材，一些研究中国文学、历史的学者，把它作为重要的参考书目之一。日本人很重视将鲁迅的作品介绍到日本，鲁迅刚刚逝世，日本的《改造》杂志社通过内山完造与茅盾、胡风 and 许广平联系，商量出版《大鲁迅全集》的事情。由内山完造和佐藤春夫担任执行编辑顾问，在东京和上海共同完成这部著作。曾经留日的胡风为日译《大鲁迅全集》负责选定篇目、进行口译、校正释文。《大鲁迅全集》是第一部用日文比较全面介绍鲁迅的作品，其中包括小说、散文、杂文、书简和日记等内容。在1941—1949年的九年里，鲁迅作品的日译本或是被翻译出版，或是被再版，在所有被翻译的各国文字中，始终居于一个很重要的位置。

这样，鲁迅作品被译成各种文字，在世界上传播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影响也就愈加深远，使鲁迅的作品得以让世界更多的读者了解。

除了鲁迅的作品被介绍到国外之外，鲁迅和其他留学生们通过外国友人的帮助，将中国的近代文学作品介绍到国外去，其中左翼青年的作品居多。最为最典型的就是在留学生们协助斯诺编译《活的中国》和伊罗生的《草鞋脚》。以鲁迅为首的一批留学生，承担了《活的中国》的选稿，润色，翻译等诸多事宜。茅盾（1928年留日）、林语堂（1919年留学美国）、郑振铎（1927年留学英国）、萧乾（后来留学英国）、顾颉刚、姚克（留美生）、杨刚（大公报女记者）等人，或是提供文章，或是协助翻译。另外，通过萧乾，还得到了沈从文和巴金的协助。该书除了鲁迅的八篇作品外，该书中所选作品多以“左联”作家为主，如柔石的《为奴隶的母亲》，茅盾《自杀》和《泥泞》，丁玲的《消息》和《水》，田军的《大连丸上》和《第三枝枪》，巴金的《狗》，沈从文的《柏子》，孙席珍的《阿娥》，林语堂的《忆狗肉将军》，萧乾的《皈依》，张天翼的《移行》，郁达夫的《葛萝行》，沙汀的《法律外的航线》，杨刚的《日记拾遗》，郭沫若的《十字架》等十七篇小说，这本书1936年由伦敦的乔治·哈拉普出版公司出版，这是英国出现的最早的介绍中国现代文学作品的书，使外国人了解到“中国知识分子真正是怎样看自己，他们用中文是怎样谈和怎样写的。当代的上层和下层的中国人，彼此之间真正是怎样工作、行动、恋爱、玩耍并说明他们在现状中的地位”^①。为了“说明并介绍中国文学革命的发展状况”，向“西方读者介绍一批在蒋介石国民党政权残酷政压下的作家的作品”^②，鲁迅等人又帮助美国记者伊罗生编了一本小说集，“集中地向国外的读者介绍中国的进步作家及其作品……尤其是左联成立以后涌现出来的一批有才华的青年作家，国外尚无人知晓”^③。鲁迅和茅

^① 埃德加·斯诺编，文洁若译，陈琼芝辑录：《活的中国—现代中国短篇小说选》，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页。

^② 伊罗生：《草鞋脚》（序言）转引自鲁迅，茅盾编著：《草鞋脚》，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90页。

^③ 茅盾：《关于〈草鞋脚〉》，引自鲁迅，茅盾编著：《草鞋脚》，第4页。

盾不仅为之编选的小说集提出书目,供其选择,还为之写介绍材料。鲁迅为这本书写了一篇序,茅盾写了一篇介绍中国左翼期刊的文章。书中除了鲁迅的五篇小说外,还收有郭沫若的《卓文君》(三幕剧,节本),殷夫的《血字》(诗),郁达夫的《春风沉醉的晚上》,茅盾的《喜剧》、《春蚕》和《秋收》,叶圣陶的《潘先生在难中》和《多收了三五斗》,胡也频的《同居》,楼适夷的《死》和《盐场》,何谷天《雪地》,丁九的《三宝塔》,蒋光慈的《黑森》和《野祭》,丁玲的《某夜》和《沙菲女士的日记》,共十六位作家的二十五篇作品。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该书直到1974年才由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印行。

除了这两本合集,其他中国留学生也曾翻译过一些左翼作家的作品。敬隐渔是第一个将茅盾的作品介绍到法国的留学生,他曾翻译过茅盾的短篇《芸》。留法学生汪德耀将谢冰莹的《从军日记》译出后,由罗曼·罗兰推荐,1930年在巴黎出版。中国著名诗人戴望舒在巴黎期间,结识了法国文学青年艾田蒲,他们多次合作,“将中国左翼文学家茅盾、丁玲、张天翼、施蛰存等人的作品翻译成法文”^①,刊登在法国的《公社》等杂志上。1935年,萧三编选的俄文版中国短篇小说集《中国》,由苏联哈尔科夫出版社出版,其中收有张天翼的作品。虽然相对于中国译介的苏联文学作品而言,中国介绍到苏联去的作品显得十分单薄,然而,将鲁迅、茅盾、丁玲和若干东北作家的作品翻译成俄文,让苏联人民了解中国的现代文学作品,还是很有意义的。在20世纪30年代,王际真将茅盾的“农村三部曲”中的《春蚕》译成英文发表在《当代杂志》上,接着《秋收》、《船上》、《小巫》、《赵先生想知道》、《林家铺子》等也被陆续介绍给英美读者。^②20世纪40年代初,叶君健把茅盾的《春蚕》、《秋收》、《残冬》及其他反映我国抗战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译成英文和世界语,在英国出版。他还曾与香港的Brown合作,将姚雪垠的《差半车麦秸》、野蕪的《新垦地》、张天翼的《华威先生》译成英文,在英国的《新作品》上发表。同时,日本《改造》杂志社新开辟一个专栏——《中国杰出小说》,也得到了鲁迅的支持。他亲自写了《中国杰作小说小引》、《萧军简介》,翻译了萧军的小说《羊》等几篇作品。由于鲁迅病重,这项工作主要由胡风负责,胡风选译了彭柏山的《崖边》、周文的《父子之间》、欧阳山的《明镜》、艾芜的《山峡中》和沙汀的《老人》,同时还承担了最后的审定和校译的工作。1946年由白英和袁家骅(1937年庚款留英)、杨周翰等人共同翻译的《当代中国短篇小说选》,在伦敦出版。这本书也是以左联成员的作品为主,其中收有鲁迅的《风波》,沈从文的《灯》、《夜幕下》,老舍的《最后一列火车》,卞之琳的《红裤子》,张天翼的《脊背与奶子》以及杨振声、施蛰存、端木蕻良、姚雪垠等人的作品。另外,还介绍了郭沫若、茅盾、郁达夫、冰心、落花生、张

^① 陈丙莹著:《戴望舒评传》,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66页。

^② 马担毅,任荣珍著:《汉籍外译史》,湖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392页。

资平、丁玲和萧军等作家的创作活动。萧乾还不是留学生的時候，就熱心于傳播中國文學，他與美國人威廉·阿蘭合作，共同出版《中國簡報》。這是一份旨在關心中國文學、社會、藝術動向的報紙，它向英語世界的讀者們“介紹現代中國文藝界之情勢以及社會大眾之趨向與其背景”。其中左翼作家的作品居多，現存的《中國簡報》一至八期中，刊載了魯迅的《聰明人、傻子和奴才》、《野草》，郭沫若的《落葉》、《王昭君》，茅盾的《野薔薇》、《從牯嶺到東京》，郁達夫的《日記九種》、《創作之回顧》，田漢的《湖上的悲劇》。其他的作家還有沈從文的《阿麗絲中國遊記》、《一個傻子的日記》，徐志摩的《自剖》、《灰色的人生》（詩），聞一多的《洗衣歌》（詩），章衣萍的《從你走後》以及巴金、柔石、冰心、丁玲等名家及其作品，蕭乾對這些名作一一作了粗淺的評介，這是他第一次向海外介紹中國近代文學。由於經費不足，《中國簡報》停刊了，但是，在當時旅居北平的西方讀者當中，這份英文文藝周刊還是產生了一定的影響。^①後來斯諾正是看到蕭乾編的《中國簡報》，知道蕭乾熱衷於傳播中國文學，因而邀請他參加《活的中国》的編選、翻譯工作。左聯作家自己也積極宣傳中國現代的文學作品，尤其是很多作家都曾有過留日的經歷，他們在日本創辦各種雜誌，並和日本雜誌互相關交流，留日學生辦的《詩歌》與日本的《詩精神》就是如此。其中，中國的吳坤煌曾經將林林的詩《鹽》，翻譯成日文，發表在《詩歌》上，並被轉載在《詩精神》第二卷九月號上。留日詩人雷石榆雖然身居異地，但是仍然利用可能獲得的資料，向日本人民介紹中國的文學狀況。他在《詩精神》上發表《中國詩壇的近狀》，就詳細地介紹了中國現代文學的各種流派，代表作家及作品。在1935年《文學內案》的十月號上發表的《中國文壇現狀論》，讓日本文壇對中國近代文壇狀況獲得了初步的了解，一些日本研究者和專家認為他是“最早把中國現代詩壇狀況介紹給日本”的人，稱得上是中日近代文學的交流的先驅者。^②雷石榆還在日本雜誌上翻譯中國作家的作品，如翻譯了王一心的《鬻兒謠》，浦風的《小莉西》。

總之，在魯迅、茅盾等左聯成員人的積極努力下，中國現代文學作品被翻譯成各種文字介紹到了國外，擴大了中國現代文學作品在海外的影響力。

老舍作品的第一次世界性熱潮出現在二戰後的美國，隨後又在歐洲和日本傳播開來，這一熱潮一直持續到50年代。老舍最早被翻譯成外文的小說是《駱駝祥子》，1936年由程濟賢翻譯成法文在巴黎出版。二戰後，應美國國務院的邀請，老舍和曹禺訪問美國。美國人伊文·金翻譯的《洋車夫》（即老舍的《駱駝祥子》）在美國出版後，不僅成為美國的“每日一書”俱樂部的代表作，並且成為當年的

^① 見文潔若：《蕭乾創辦〈中國簡報〉的一段往事》。

<http://www.booker.com.cn/gb/paper23/5/class002300001/hwz35991.htm>

^② 張麗敏著：《雷石榆人生之路》，河北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31頁。

畅销书。因此此次访美，老舍很想将自己的其他作品介绍到美国。鉴于《骆驼祥子》被篡改的先例，对于伊文·金翻译的《离婚》一书，老舍十分慎重，坚持要看看初稿。伊文·金对《离婚》一书采取大肆渲染的手法，突出介绍一些异域风情的东西，使老舍很不满意。经过多次交涉，伊文·金的译本被限定在自己的书店出售，而老舍则与郭镜秋合作翻译《离婚》，这个译本由老舍逐字看过，完全忠实于原著。然而令人意外的是，这个译本的销售量却没有伊文·金的好。可见，中国文学作品在翻译成其他种文字的过程中，不仅要面对如何忠实于原著的问题，还要考虑到外国读者的接受心理，否则，只是将作品翻译出去，却无人问津，是无法达到文化交流的目的。当然，随着人们欣赏水平的提高，对译作质量的要求也必然会有所提高。

结束在美国的讲学之后，老舍留在美国继续写作。《鼓书艺人》刚刚杀青，他就再度与郭镜秋合作，将之译成英文出版。与此同时，他还与美国人普鲁伊特合作，翻译《四世同堂》，这一译本虽然是节译本，但是包括了完整的情节。1951年，《四世同堂》在美国出版，很快成为当年的畅销书，并受到书评界的普遍关注。《纽约先驱论坛报书评》、《基督论坛报》、《旧金山新闻》、《纽约时报》等报刊，纷纷发表评论，《四世同堂》成为“五四”以来在美国获得最多好评的中国小说。^①老舍此次赴美讲学，不仅了解了世界文学的发展潮流，也向世界展示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成就。

（2）留学生用外文创作的文学作品

除了翻译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以外，许多留学生凭借娴熟的外语，直接用外文写作，并在国外发表，不仅给他们自己带来了声誉，也使外国人从不同方面接触到了中国的文化。

作为革命家的萧三，同时还是一位文学家和诗人。1920年赴法勤工俭学，后转往苏联学习。1930年，萧三在莫斯科东方大学任文学教授，除了教学，他还参加苏联的文学研究活动，接触到一些苏联作家和旅苏的外国作家。同年秋，“国际革命作家代表大会”在苏联的哈尔科夫举行，萧三应邀参加，鲁迅等左联领导人难于前往苏联开会，因此委托萧三作为“左联”代表，代表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发言。萧三不负委托，在会上介绍了“左联”和其他革命文艺团体及鲁迅、茅盾等中国革命作家的情况，并对苏联和出席大会的各国代表，提出了建议和希望：“今后应注重宣传中国的文学艺术及介绍中国革命作家。”^②从此，萧三成为“左联”常驻莫斯科的代表。会后，萧三除了向“左联”汇报了大会的盛况外，还向国内索稿，在没有回音的情况下，萧三开始了文学创作生涯。1931年，

^① 马祖毅，任荣珍著：《汉籍外译史》，湖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400页。

^② 王政明著：《萧三传》，四川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245页。

萧三的《命该如此》一诗，由苏联著名翻译家兼诗人的罗姆译成俄文，发表在《国际文学》第四期上。从此，萧三把写诗当作“革命斗争的武器”，他用“诗来宣扬中国的土地革命，工农红军，宣传左翼文学”^①。看了萧三的诗，苏联著名作家法捷耶夫称赞萧三“是个了不起的诗人”，苏联著名评论家 T·穆期塔弗多夫称赞萧三的诗“总是那样激动人心”。从那时起，萧三走上了探索民族化、大众化新诗歌的征程。继第一首《命该如此》发表后，他的《纪念广州公社》一诗，发表在《真理报》上。不久，他的第一个俄文诗集《几首诗——纪念死难的同志们》，由莫斯科《星火》杂志出版社出版。此外，他还写了许多反映国内工农革命斗争运动和歌颂中国工农红军的战斗篇章，如《南京路上》、《棉花》、《血书》、《瓦西庆乐》、《敬礼了，兄弟们！》、《蒋介石行军歌》、《张五嫂打定主意了》、《献给高尔基》、《三个(上海的)摇篮歌》等等。其中，《在南京路上》、《棉花》、《三个(上海的)摇篮歌》等诗，被苏联教育部编入教科书中。这些作品先后被译成英、德、法、西班牙等多种文字，在国际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萧三的小说《蜀道》，是根据苏区被围剿时的一个真实故事写成的，也被译成法、英、德、西班牙等文字，在《国际文学》上发表。30年代，萧三的诗还被翻译成苏联少数民族的语言，广为流传。萧三的俄文版诗集《诗歌》(1932年)、《为了苏维埃中国》(1934年)、《湖南长笛》(1940年)也相继在苏联出版。在苏联和东欧等国家里，“上至诗坛名将，下至中小学生和普通工人，都知道‘埃米·萧’(萧三在苏联使用的名字)这个名字”^②。“埃米·萧”的名字驰名国际诗坛，被誉为“中国革命诗人”和“世界无产阶级伟大诗人之一”。

与萧三一样，另一位姓萧的留学生，以他出色的文笔，也为中国现代文学在海外的传播做出了贡献，他就是萧乾。萧乾旅居英国七年，身兼数任，既是伦敦大学东方学院的讲师，也是剑桥大学的研究生，还是活跃在西方战场上的中国记者。在英国援华会安排的聚会上，他不遗余力地向英国学生及听众介绍中国新文艺运动发展的历程，并将这些成果在英国发表。多重的身份，使他在向海外读者介绍中国文化方面，取得了辉煌的成绩。在英国讲学的时候，萧乾还利用业余时间，写了几本关于中国文化的书。他在伦敦大学担负现代中国文学的课程，得益于他在国内帮助斯诺编辑《活的中国》的经验和他自己在《大公报》编辑《小公园》时的经历，使他对中国新文学运动的历史、现状和发展，有一个清晰的了解，讲授中国现代文学时，可以信手拈来。1942年，萧乾将讲稿加以整理，题为《苦难时代的蚀刻》，由英国伦敦的 Allen and Unwin 出版社出版。该书系统地介绍了自1919年至1939年的30年间里，中国新文艺运动发展的曲折经历，概括了中国新文学运动以来的二十五年间(1917—1942)小说、诗歌、戏剧、散文、文

^① 萧三：《萧三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第2页。

^② 王政明著：《萧三传》，四川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250页。

学翻译五个领域的成就，对现代文学的主流和特点都有精辟的分析。著述不仅介绍了当代中国的一流作家，还涉及一大批三十年代的后起之秀，对各种门类文学的代表作家、不同文学流派，都有专题的论述，对西方人只重视研究中国古典文学而忽视现代文学的汉学家提出了轻微的抗议。史料丰富，论述全面，蔚为大观。这本书出版后，在英国引起了热烈的反响，《泰晤士报文艺副刊》、《新政治家与民族》、《观察家》，《论坛》、《听众》等刊物都载文推荐，称道该书包罗宏富，立论谨严，文风明晰简洁，使对中国现代文学朦胧无知的读者大开眼界，深受教益。

《观察家》载文说：“凡是有志于研究东西方关系的人，都应该仔细读一读萧乾这本文笔精炼而优美的论著。”^①这本书对海外关心中国新文艺运动的读者和研究者来说，也很有吸引力。因此出版不久，很快就在瑞士出现了德文译本。此外，萧乾还写了其他一些介绍当代中国风貌、中国文学作品的英文著作。1941年，《中国而非华夏》由伦敦向导出版社出版，这是一本介绍中国历史、地理和抗日战争各条战线情况的通俗读物。1944年，《千弦琴》由伦敦向导出版社出版，这是一部诗文选集，除了选录英国学者、作家笔下的中国形象和他们研究中国文化艺术的一些看法，还选入了中国作家的作品。《蚕》是萧乾本人的短篇选集，收入小说十篇，散文两篇，从一个作家的侧面反映了当代中国的创作状况，1947年由英国伦敦的 Allen and Unwin 出版社出版。《龙须与蓝图》（1944年出版）的副题是《战后文化的思考》，以“龙须”象征中国古老的封建文化，“蓝图”则代表近代西方的工业机械、科学技术，作者意图阐明战后中国必须打破抱残守缺的局面，走现代化道路，才能在当今世界站稳脚跟。除了著述，萧乾对中国文化的介绍是相当广泛的，他利用一切机会宣传中国的情况。伦敦大学东方学院在1940年的年终报告中，就详细记录了萧乾的主要英文演讲：《战时中国报纸》、《上海，中国的布卢姆茨伯里》、《中国的文艺复兴》、《敌后的文学》、《中国现代小说》、《论中国现代文学》。另外他还有一些英文评论，如发表在《观察家》上的《鲁迅的短篇小说》，发表在《泰晤士报》文学副刊上的《中国现代文化》，载于《妇女杂志》上的《中国妇女》。^②应英国著名评论家奥维尔的邀请，萧乾在英国广播公司做过《中国的文学革命》的演讲，在战时的英国，利用广播作为宣传中国的媒介，关注的人多，影响力也更大。解放前，萧乾编辑的《中国文摘》和《人民中国》两个英文刊物，虽然主要是从事对外宣传工作，但是在《人民中国》上，萧乾用英文写的关于土改的大型特写，用艺术的笔调向海外介绍中国巨变的实例。同时，他的《土地回老家》也被翻译成十一种文字出版。不论是在国内还是在海外，萧乾都不遗余力地传播中国文化，其目的就在于希望世界了解中国，打破中国与世界隔绝的畛域。

^① 见王嘉良等：《萧乾评传》，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0年版，第274页。

^② 傅光明著：《人生采访者——萧乾》，山东画报出版社1999年版，第85页。

盛成是第一个用法文写小说的中国留学生,1919年留学法国,1928年在巴黎大学主讲中国科学课程。在这段时间里,盛成在领悟到东西方思想的相通之处后,独具慧眼地提出自己的见解:“天下殊途而同归”。从此,这成了盛成为之奋斗终生的最高理想,他的自传体小说《我的母亲》也应运而生。这是一本文风质朴、感情浓挚,同时又充满着浓郁的民族特色和地方风情的传记文学,作者叙述了自鸦片战争以来,半个多世纪里中国的社会画卷,从一个大家庭中,看到一个浓缩了的中国社会。1928年,《我的母亲》(法文版)由巴黎亚丁阶出版社出版。当时执法国文坛牛耳、惜字如金的大文豪瓦雷里为之写下万言长序,盛赞这部作品“是将地方和民族的特色与世界意识融合在一起”的佳作,为那些不了解中国的西方人打开了一扇窗户,“使他们认识中国社会的人情风俗、伦理道德的价值,以及中国母性的慈爱伟大,从而改变了他们过去视中国人为愚昧落后的化外民族的成见”^①,“它可以使我们对中国家庭的整个机体一目了然,向我们展现出她的风俗、美德、高尚、悲哀以及严密的组织结构和无穷的生命力”^②。这本书轰动欧亚文坛,先后被译成英、德、西、荷、希伯莱等十五种文字,风行二十余国。法国的《巴黎通讯报》称赞该书展现的“中国色彩,不修不饰,无恨无怨”^③。

《巴黎民声报》称该书让“我们知道一家中国家庭,以及中国家庭的生活,以及中国妇人的心性,这幅画像,是由孝子盛成用细笔画成功的”^④。《巴黎清行文艺周报》刊载日内瓦大学教授第玻岱的评论:“这本书比法国人所写的中国书,或是法文译的中国书都好,他的作者,介乎两种文化之间,或者可以将我们引到中国的实际上去的。”^⑤至于其他的报纸,如《东方报》、《巴黎公言报》、《和平报》、《巴黎文学新闻报》、《世界报》、《新世界日报》、《巴黎时报》、《欧洲杂志》、《纽约时报》、《欧洲文化与东方》、美国的《活世纪月刊》等等,几十个国家的报纸,“以二十多种文字报道、评介此书”^⑥。《我的母亲》还得到著名作家纪德、罗曼·罗兰、萧伯纳、海明威、罗素、巴比塞、梅特林,“埃及诗王”朗基等世界文学大师,以及居里夫人等人的评价都很高,认为“这本书沟通了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为实现人类大家庭‘内在的归一’作出了贡献”。^⑦盛成因此成为世界名人,被誉为“法国文坛的一个明星”。很快,在西方掀起了以《我的母亲》为中心的中国热,这本书的成功,促使盛成很快又写下了第二本书——《我的母亲与我》(法文),也由巴黎亚丁阶出版社1929年出版。西方的一些研究者甚至组成“盛成文

^① 李坚,方舟:《欧亚文坛骑士盛成及其文集》,来自<http://culturefr.free.fr/mingren/shengcheng/pinglun3.htm>

^② (法)保尔·瓦雷里:《〈我的母亲〉序言》,胥弋译,来自<http://culturefr.free.fr/mingren/shengcheng/etude3.htm>。

^③ 盛成著:《我的母亲》,安徽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162页。

^④ 盛成著:《我的母亲》,安徽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162页。

^⑤ 盛成著:《我的母亲》,安徽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166页。

^⑥ 盛成著:《我的母亲》(新版前言),安徽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1页。

^⑦ 陈平原,黄子平,钱理群:《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二:世界眼光》,转引自《读书》80期。

友会”，这一组织在盛成回国后，仍在活动。在西方，以中国作家命名的社团，能够每周开展研究活动，是十分罕见的，可见盛成这一文学作品带给外国读者和研究者的影响是深远的。1985年，法国驻华大使马乐代表法国总统密特朗，将法兰西共和国荣誉军团骑士证书和勋章授予盛成，以表彰他对中法文化交流做出的特殊贡献。

“两脚踏中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是留美学生林语堂对自己的评价，他以《中国人》（又称《吾国吾民》）一书而闻名于世，在国外的名声远远高于国内，因而产生的国际影响力也更大。在民国时期，他创作的文学作品以《京华烟云》最为著名。1939年，《京华烟云》在美国出版，被称为东方的《乱世佳人》，它描述了从义和团运动到抗日战争四十年来的中国故事，诠释了中国道家文化的精髓。该书被美国“每月读书会”选为特别推荐书，林语堂还因此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1941年，林语堂的另一部小说《风声鹤唳》出版。林语堂通过自己的小说，不仅塑造了一群近代，也在作品中向世界宣传了中国的抗日战争，利用他在国外的影响力，不仅传播了中国的近代文化作品，同时，他的最重要的目的是宣传中国的抗日战争。

像萧三、萧乾、盛成这样在国外发表作品的留学生还有很多，虽然他们在国外所获得的影响未能与上述人相提并论，但是，他们通过自己的作品向外国读者介绍了中国文学。1920年，留美学生关文清在美国出版了名为《珠塔》的诗集；德龄公主早年随父亲裕庚公使出国，在国外打下了良好的外语基础，一度曾担任慈禧太后的女官。1928年出版的《御苑兰馨记》、1933年出版的《御香飘渺录》和1935年出版的《瀛台泣血记》等书，是用英文向西方读者介绍清宫内幕的小说。留学美国的蒋希曾在美国出版了他的小说《中国红》，1937年又出版了《“出番”记》。著名诗人戴望舒在旅法其间，曾将自己的一些诗作译成法文，在《欧洲》杂志上发表。1939年6月，法国的《南方文钞》上刊登了他的短诗《游子》、《夜行者》、《深闭的院子》、《过时》、《妾薄命》和《三顶礼》。叶君健，笔名马耳，著名翻译家、作家，1933年刚刚从武汉大学外语系毕业的他，就到日本东京教授英文和世界语，“七·七事变”后，叶君健被逐回国。1937年，他用世界语出版了短篇小说集《被遗忘的人们》和中国抗战小说集《新任务》，用英文翻译了一本中国近代小说集《三季》，这些译作对帮助世界人民了解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有不可低估的作用。抗战后，他前往英国剑桥大学皇家学院，研究欧洲文学。1947年，他的英文小说《山村》，在英国伦敦出版，很快被英国书会评为“最佳作品”，并被转译成其他文字，流传的范围迅速扩大。留学意大利的周尧，用意大利文写过一些文学作品，如小诗《流浪，流浪……》、《献》和小品文《短剑》。而被称为“中国的大众诗人”的陶行知，在美国宣传中国抗战的时候，经

常在公开的宣讲大会上朗诵自己创作的诗歌,如《再到近山》、《万里大路》、《飞到日本去》、《帮胜不帮败》等。

著名诗人、左联成员雷石榆,在日本《日化集团》第二卷第八号上发表了她的另一首日语诗《非上帝的娘》。1934年11月,他的诗歌《细雨》发表在《文学评论》上,1935年刊在《文艺》第三卷第八期的诗《别离祖国》,作为当年的佳作,被选入1936年由前奏社出版的《1935年诗集》中。1935年创刊的日文杂志《诗导标》的创刊号上,发表了雷石榆的诗《友啊,勿悲伤》。1936年创刊的日本杂志《诗人》,收录了雷石榆的八首日文诗,有《讴歌普希金》、《电贺万里长城》、《中国的拜伦卿——诗人王独清》,这些诗歌都是结合现实斗争的作品。雷石榆的代表作《沙漠之歌》,是一本日语诗集,1935年由东京的前奏社出版,收入了作者1934年8月到1935年2月之间创作的25首日文诗,诗的内容有揭露日本黑暗的社会现实的作品,如《非上帝的女儿》、《咖啡店》,有控诉日本对中国侵略的诗篇,如《给姐姐》、《良民》等。该书出版后,立即引起了日本文学界的注意,以至于在20世纪70年代乃至90年代的日本,仍然被文学专家们高度重视。日本诗评论家远地辉武高度评价了这一作品,认为“诗的内容已经使我感到欢快,……所驱使的尚未十分熟练的日语,反过来却给日语以新的现实内容,给与我们日本诗人以许多用语上的启示”^①。新井彻认为雷石榆的诗体现了“豪迈的大陆人独有的放歌方式中,荡漾着钝角的、柔韧性强的——令人不能不微笑的情绪。……《沙漠之歌》确实是面对不安的现代,使大家振奋起来,高昂地迈开步伐前进的进行曲”^②。当年,日本诗界同仁们还专门为《沙漠之歌》开了一个纪念会,这不仅仅是一次简单的纪念会,更是一次超越国界的诗人聚会,表现了中日两国诗人崇高的国际主义友谊。

另外,还有一些中国留学生们学有所成后,在国外讲授中国文学,这也是向外国人宣传中国文学的机会。1927年,曹靖华再次赴苏,在苏联的列宁格勒大学主讲中国革命和中国革命文学,他改变了原来中国语言文学系的汉语教学方式,将教学的重点放在现代汉语教学上,并将中国左翼作家的作品介绍给苏联的学生,在教材上选用了鲁迅的作品,如《孔乙己》、《阿Q正传》和《祥林嫂》等。这一改革获得了成功,为苏联培养了一批有名的汉学家,如刘斌、斯萍青、阿赫提金娜、莫罗佐娃和波兹涅耶娃等,这些人后来都为中苏文化交流做出了贡献。除了紧张的教学工作,曹靖华还帮助苏联的汉学家瓦·阿列克谢耶夫校订《聊斋志异》和《陋室铭》、《归去来辞》和《春夜昼桃李园序》三篇文章的遣词造句、词组搭配、句法分析等。1919年,留法的萧三转往俄国后,在莫斯科东方学院担任教授的时候,一边教俄国人中文,一边给研究生班开设中国文学课,以“郑

^① 张丽敏著:《雷石榆人生之路》,第37页。

^② 张丽敏著:《雷石榆人生之路》,第38页。

振铎写的书作课本，每天讲授二三小时”^①。在他的班上，就有后来成为著名汉学家的费德林和艾德林，前者曾担任过苏联驻中国大使馆的文化参赞，后者是研究陶渊明的专家，曾经翻译过白居易的诗。此外，一些著名学者还利用各种演讲宣传中国的文学，1921年6月2日，蔡元培在美国新闻家文艺学会的招待会上，演讲《中国文学的沿革》。在英国，老舍开设过“唐代爱情小说”的讲座，概括了唐代短篇小说的写作情况、分类情况、相关的研究唐代小说的书籍以及它对元、明两代文学作品的影响，对英国学生进行了一次古典文学的熏陶。

与古代文学作品在国外传播不同，现代文学作品在对外传播过程中，中国留学生们担当了汉籍外译的主力，出现了直接用外文写作的文学作品，这些作品让外国人了解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情况、揭示了中国的社会生活，尤其像《四世同堂》、《京华烟云》等文学作品，将中国的抗日战争写进书中，借助文学的社会功能，宣传中国的抗战。他们在创作文学作品的时候，有意识地将中国现代的社会状况展示在外国人面前，有助于外国人对现代中国社会有一个准确的认识，这也是留学生将中国文化传播到国外去的根本目的。

^① 高陶著：《天涯萍踪 记萧三》，中国青年出版社1991年版，第159页。

四、留学生与中国戏剧的传播

1. 留学生与中国戏剧在日本的演出

中国戏剧起源较早,在元代时有了完备的文学剧本、严格的表演形式和完整而丰富的内容。乾隆末年,四大徽班进京,他们在徽戏和汉戏的基础上,吸收了昆曲、秦腔等一些戏曲剧种的优点和特长,逐渐演变而形成京剧。清末民初,作为“国粹”的京剧艺术已经发展得日臻成熟。辛亥革命后,京剧出现了空前的繁荣景象,如:修建新剧场;改革演出制度;加强舞台美术效果;编写新题材的剧本等等,“不仅提高了舞台艺术,更突出的是使现实主义表演艺术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①。“五四运动”,使京剧艺术冲破了封建桎梏,京剧艺人也获得了更多的自由,不仅流派异彩纷呈,名角也是灿若群星,出现了著名的四大花旦、四小花旦、四大须生等等。但是,由于文化背景和欣赏习惯的不同,一些西方人却不愿意走进中国的戏院观看京剧,他们认为京剧的音乐是一种噪音,而京剧的唱腔对他们来说更是一种难以忍受的刺耳的尖叫,“为了顾及体面,我们强忍着自己的激情,可掩饰的很差。……音乐伴奏让我们这些欧洲人实在没法适应,迫使我们不得不离开”^②。他们不能理解为什么中国人十分喜欢这种娱乐,所以,他们对京剧存在的误解也就越来越深。因此,让中国的京剧获得更多外国观众的接受和认可,改变他们对中国京剧艺术的看法,其意义就显得十分重要。

著名旦角演员梅兰芳赴日演出迈出了中国京剧走向世界的重要一步。1916年,日本的大仓喜八郎男爵在东京创办了帝国剧场,他和梅兰芳的挚友,早年留学日本的冯耿光联系,希望梅兰芳能够去日本演出。由于中国国内政局不定,此事遂被搁置。后来,在先后出任驻日公使章宗祥、陆宗舆(二人均曾留学日本)二人从中斡旋下,梅兰芳的顾问齐如山也“以为中国戏或可到外国去演演”^③,促使梅兰芳下决心到日本演出。1919年4月,由在日本留过学的许伯明、舒石义二人的陪同下,梅剧团第一次赴日演出,作为这次访日演出的主要筹备者,齐如山也随剧团同行。齐如山,早年留学德国,是京剧的忠实戏迷和批评者,早年因京剧而结识梅兰芳,从此二人在一起共事达十几年之久,尤其是在后来梅剧团的访美和访苏演出中,齐如山出力不少。在齐如山看来,这次访日演出不仅仅是将京剧传播到日本,同时也是传播中国文化的过程,因而主张剧目应以旧剧为主,

^① 刘静沅:《京剧艺术发展史简编》,1984年版,第131页。转引自超星数字图书馆。

^② (俄)叶·科瓦列夫斯基著,阎国栋等译:《窥视紫禁城》,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版,第173页。

^③ 齐如山著:《齐如山回忆录》,第127页,来自超星数字图书馆。

“规定以《御碑亭》为主要戏，《游园惊梦》等昆腔戏也要一二出”^①。

梅剧团先后在东京、大阪、神户等地，共演出十七天，上演了十九个剧目，其中《天女散花》这出以歌舞为主的戏，最受日本观众的欢迎。由于国内爆发了“五四运动”，一些留日学生纷纷给梅兰芳写信，劝说他结束演出，于是，第一次访日演出仓促终止了。在留学生牵线搭桥下，梅兰芳访日演出获得了成功，将中国的京剧传播到日本，这本身就是一种贡献，对于宣传中国的传统文化，让日本观众了解了京剧，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日本戏剧评论界对京剧的误解，改善近代中国的国际形象，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以至于当时的《春柳》杂志在评价梅兰芳此次演出的作用时，称：“甲午战后，日本人心目中未尝知有中国文明，每每发为言论，亦多轻侮之词，至于中国之美术，则更无所闻见，除老年人外，多不知中国之历史。学校中所讲授者，甲午之战也，台湾满洲之现状也，中国政府之腐败也，中国人之缠足，赌博，吸鸦片也。今番兰芳等前去，以演剧而为指导，现身说法，俾知中国文明于万一。”^②

除了京剧的访日演出之外，中国的昆曲也曾前往日本演出。应日本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的邀请，1928年，中国的昆曲剧团赴日演出。这次在日本的演出，“是日本满洲铁道株式会社通过中国留日学生黄子明联系的，所以演出过程中，很多参观和应酬和联欢活动等，都由黄负责安排”^③。赴日演出的昆曲演员有韩世昌、周斌秋、马祥麟等旦角演员，还有武生张文生，小生耿斌福，演出的曲目有《思凡》，《琴挑》，《刺虎》，《闹学》，《佳期》，《拷红》和《游园惊梦》等。在东京的三场演出后，帝国大学的文学部又通过黄子明，举行了一次昆曲演出招待会，日本著名的戏剧家青木正儿、内藤虎次郎、铃木正雄等人均出席，他们都对昆曲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由于日本的演出严格地规定了时间和场次，以至于许多剧目无法完整地表演完一场，也就难以完整地展现出昆曲的全部特色。但是，有胜于无，正是在黄子明的积极联络下，昆曲得以赴日演出。将中国这一古老的剧种传到日本，表现了留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认可的态度，显示出他们愿意将中国文化推向世界的美好愿望。

2. 留学生与中国京剧在美国的传播

（一）留学生表演的京剧

早在1921年，中国的戏剧就已经出现在美国的舞台上。当时在美国留学的

^① 齐如山著：《齐如山回忆录》，第127页，来自超星数字图书馆。

^② 《春柳》，1919年第五期。

^③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编》，北京出版社1993年版，第四十六辑，第122页。

洪深,得知华北水灾的消息后,和赴美讲学的张彭春合作,排演了中国戏《木兰从军》,为中国人民募捐。剧本主要由张彭春负责,洪深既是该戏的男主角,又担任导演一职,其他演员由哥伦比亚大学的中国留学生们充任。该戏采取中国戏曲艺术的程式化动作为表演范式,没有唱腔,完全英语对白。1921年5月,《木兰从军》在美国纽约上演,剧中演员“古雅斑斓的东方服饰,中国京剧优美的舞蹈动作以及女英雄女扮男装,替父从军的传奇故事,都让美国观众大开眼界。随后该剧又在纽约、华盛顿等地连续上演八场,受到了美国民众的普遍欢迎,因此为中国难民募捐了一大笔捐款,也是第一次向美国人民展示了中国京剧的艺术魅力,这为“后来梅兰芳君底不用英文的中国旧戏的表演,才由被美国人欢迎的可能”^①。

2月24日、25日这两天,在纽约百老汇的克尔特戏院上演。在舞台设计和服装上,他们完全采用中国样式。对白完全用英语,没有唱词,虽然并不能够称为完整意义上的京剧,但是,外国人还是可以从他们的表演中,对京剧获得了一些感性的认识。该剧演出获得了成功,很多报章给予了好评。后来,为了赈济在华北水灾中受灾的难民,《木兰》又在波士顿等地上演,演出所得收入,全部用来救济难民。留美学生对表演京剧颇为热心,留美剧作家洪深多次将中国故事改变为戏剧在美国上演,他在美国排演过《牛郎织女》后,又将余上沅写的《杨贵妃》搬上纽约的舞台。闻一多负责舞台美术、服装和布景工作等工作,他亲手绘制的大屏风,其中碧海、红日、白鹤的图案,显示出典型的中国情调,而他亲手绘制的几十套演出用的古装,在灯光的映射下,美轮美奂。在美国上演京剧的成功经验,增加了留学生排演京剧的热情,1925年3月28日,中国留美同学会的成员们将中国古典名剧《琵琶记》加以改编,在波士顿美术剧院公演。顾毓琇编导,余上沅编剧,梁实秋将台词翻译成英文。梁实秋饰演剧中男主角蔡中郎,顾一樵演宰相,冰心演宰相的女儿,谢文秋饰赵五娘,沈宗濂饰疯子,余上沅、赵太侔、王国秀、沈宗濂、曾昭抡、高长庚等人也在剧中扮演角色。中国现代戏剧以其独特的形式和缠绵感人的内容在美国亮相,开阔了美国人的眼界,博得当地舆论界的一致好评。^②不久,英文的《琵琶记》在纽约由美国人演出,饰赵五娘的女演员,就是后来成为美国总统夫人的南希·里根。^③1932年,熊式一(留学英国)到英国后,把京剧《红鬃烈马》编译成英文,起名为《宝贝的河流夫人》,于1934年6月由伦敦的Methuen书局出版。同年,当该剧在伦敦国民小剧场上演到时候,迅速风靡英伦三岛。不久迁往莎佛埃大剧院演出,前后演出了六场,场场客满,共在英国上演了900多场。这次演出成功的消息传到美国后,美国纽

^① 洪深:《匆匆十年》,参阅陈美英,宋宝珍《洪深传》,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年版,第64页。

^② 闻黎明,侯菊坤编,闻立雕审订:《闻一多年谱长编》,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62页。

^③ 万国维:《老校长顾毓琇的创作生涯》,来自

http://www.nju.edu.cn/cps/site/NJU/nju100/people_stories/reviews/note/laoxiaozhang_gyxdczsy.htm

约百老汇的布斯剧院慕名邀之前往，他们又请梅兰芳代制全剧演员的服装，由北京寄到美国，为演出增色不少。结束在美国的演出后，该剧开始在爱尔兰、瑞士、荷兰、比利时等国巡回上演，所到之处无不轰动。后来，这个英译本的《宝钗夫人》在中国也曾上演过。1935 年秋，假座上海卡尔登戏院，中国演员们用英语演出了这个剧本。王允的扮演者是方伯沅（《文汇报》在沪创刊之初的董事之一）、薛平贵的扮演者是凌宪扬（曾任沪江大学校长，国共和谈时国民党代表之一）、而王宝钏的扮演者是唐瑛（上海名媛），这是国内用英语演出京剧的第一遭，所以也引起一些观众的极大兴趣。^①

（二）留学生推动下的梅兰芳访美演出

留美同学会是留美中国学生创办的民间组织，它不仅是团结留学生的渠道，也是中外文化交流的纽带。在留美同学会宴请美国公使芮恩施的宴会上，梅兰芳应邀表演了一场《嫦娥奔月》的后半出戏，这给芮恩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第二天，他亲自到梅兰芳家中拜访，美国公使的这一举动，在北京的外国人中间引起了不小的震动，无形中起到了宣传中国京剧的作用，促使很多外国人纷纷想观看梅兰芳的表演。每当有梅兰芳参加的喜庆堂会时，许多外国人就会以祝贺为由前往观赏。在总统徐世昌为芮恩施举行的饯行会上，芮恩施再一次提到了梅兰芳，他希望梅兰芳能够去美国演出，他认为“若要中、美国民感情益加亲善，最好是请梅兰芳往美国去一次，并且表演他的艺术，让美国人看看，必得良好的结果”，“我深信用毫无国际思想的艺术来沟通两国的友谊，是最容易的”^②。时任外交总长的叶恭绰向梅兰芳转达了芮恩施的话，于是，梅兰芳有了访美的打算。

决定赴美演出之后，梅兰芳等人就开始了紧张的筹备工作，这一筹备就是六七年。曾经留学德国的齐如山，是梅兰芳访美的关键人物之一，他负责这次访美演出的具体筹备事宜。如：

①编辑宣传材料。为了让美国人更多地了解梅兰芳和中国的京剧，齐如山特意编辑了几本介绍京剧和梅兰芳的书，作为必需的宣传材料，并翻译成英文。一本是《中国剧之组织》，全书共八章，六万字，并附有十几幅插图，以配合文字说明。另一本是《梅兰芳》，该书共有七章，主要介绍梅兰芳的生平，创作，所扮旦角的由来及其在国剧中的地位，梅兰芳的国际交往以及国际人士眼中的梅兰芳等内容，使外国人能够更容易明白京剧的奥妙。还有一本是《梅兰芳歌曲谱》，齐如山请琴师徐兰沅、马宝明等人记下工尺谱，再由刘天华翻译成五线谱。这样，外国人通过曲谱，对京剧的音乐能够一目了然。最后又编了一本《戏剧说明书》，将每出戏的全部情节做一个大概介绍，然后对所要演出的那一段戏做详细的说

^① 参见江上行著：《六十年京剧见闻》，学林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217—219 页。

^② 齐如山著：《梅兰芳游美记》，岳麓书社 1985 年版，第 2 页。

明、讲解该戏的情节在全剧中的地位以及该戏中各种角色的动作所表现的含义等等,尽量使观众容易理解剧情。同时,还准备了一百多篇临时送往各报馆的宣传性文章,以备梅兰芳沿途接待记者时使用。可以说,齐如山在宣传方面考虑得很周全,也很细致。除了这些宣传性的书籍文章以外,他还将京剧中的剧场、行头、脸谱、冠巾、舞谱、音乐、切末等方面,绘制成图画,共十五类,二百多幅,这些图完全是依照实物画出来的。齐如山认为用图片这种比较直观的形式,能够增强感性上的认识,使外国人易于理解。此外,他还请名家撰写文章来介绍中国的戏剧和梅兰芳,胡适为此次演出专门写了一篇文章——《梅兰芳和中国戏剧》(MeiLanfang and The Chinese Drama),介绍中国的京剧。梁社乾、周景福、陈福田、孙子明、贺渭南等人,将这些宣传材料译成英文。齐如山还向美国新闻界写稿,寄剧照,积极宣传京剧,他利用一些在华美国上层人士,给美国的戏院、剧场寄送照片,扩大梅兰芳的影响。

②向来华的外宾介绍中国的京剧,加深外国人对京剧的认识。对于那些来华的国际友人,齐如山他们尽量托本国使馆或本国绅商加以引介,由梅府专门招待。接待外宾的招待室完全是中国方式的布置,古色古香的木质桌椅,壁上挂着笔墨山水画,其中还有梅兰芳自己画的写意花卉。在齐如山看来,中国的绘画和京剧存在着相似之处,“绘画不大讲象真,专注意用笔”,而中国的京剧也是如此,“一切举止动作,言谈表示,都是由象真演进为美术化”^①。尤其是近几年来,欧美人比较主意中国的绘画,所以,借此来讲解中国的京剧,外国人也很容易明白。同时,招待外宾的点心也是中国的精美食品,使整个招待气氛完全笼罩在一片浓郁的中国古典氛围之中。另一方面,齐如山还积极和从美国回来的留学生联系,期望更多的了解一下“美国方面的情形,彼邦人士的心理,及他们对中国戏的意见”^②。

③选择演出剧本。在剧本的选择上,齐如山和张彭春二人在这点上达到了共识。他们都主张以旧戏为主,尤其是“《刺虎》这出戏,非演不可,因为他不但是演朝代的兴亡,并且,贞娥脸上的神气,变化极多,就是不懂话的人看了,也极容易明了”^③。同时,张彭春还建议将梅兰芳京剧中的一些舞蹈抽出来单独表演,这样既可以吸引观众的注意力,又使演出富于变化,避免让观众感到枯燥,有利于活跃演出气氛。

④准备出国的行头和礼品。此次剧团的演出行头全部重新制作,中国特色十分明显,在无形中起到了宣传中国文化的作用。至于礼品,包括中国的刺绣,瓷器,笔墨,国画、扇子等。可以说,访美的梅剧团不仅是将中国的京剧带到了国

^① 齐如山著:《梅兰芳游美记》,岳麓书社 1985 年版,第 8 页。

^② 齐如山著:《梅兰芳游美记》,岳麓书社 1985 年版,第 3 页。

^③ 齐如山著:《梅兰芳游美记》,岳麓书社 1985 年版,第 29—30 页。

外,也是中国文化的一次海外旅行,梅剧团走到哪,中国文化就随之传播到哪里。

⑤筹措赴美演出费用。当一切准备就绪,即将开始访美之行的时候,忽然收到了司徒雷登从美国打来的电报,告知美国遭遇历史上最严重的经济危机的打击,希望梅剧团暂缓赴美。虽然梅兰芳访美的决心很坚定,但是无形中访美演出费用的增加,使梅兰芳难以独自承担这一巨款,访美之行面临搁浅的危险。这时,齐如山忽然想到了李石曾这个世交,请求李石曾能够为这次演出经费出些力。在了解到此次演出是为了宣传京剧的目的,李石曾十分热心,宴请了许多银行界的人士,为梅兰芳访美筹款。同时,齐如山还积极争取北平、上海等银行界的朋友们的支持,如留日学生、银行家冯耿光,吴震修等人,利用他们在银行界的影响,为梅兰芳争取到了部分贷款。这次访美之行,还得到了梨园界同行和戏剧学校的支持,从而使访美演出具备了基本的经济条件,以至于“梅兰芳总是对人讲‘赴美演出的胜利,多亏了好友齐如山’”^①。

而由留学生创办的“华美协进社”,成为梅兰芳访美之行的直接促成者。“华美协进社”,是一个非盈利性的社会团体,在美国联邦政府教育部门和基金会资助下,1926年由胡适、张伯苓、梅贻琦等留美学人和杜威等美国人士联合倡导成立。“华美协进社”成立之后的首件大事就是邀请梅兰芳访美,期望通过演出一台既有中国艺术魅力,又有教育意义的中国京剧,改变美国人对中国文化的偏见。而时任社长的孟治博士,代表“华美协进社”亲自到北京向梅兰芳发出邀请,于是,抱着宣传中国戏剧,沟通中外文化的目的梅剧团,从上海启程赴美。

中国驻美公使伍朝枢(留美学生)得知梅剧团到了美国的消息后,特意在华盛顿为梅剧团举行了一场招待会,“专在介绍畹华于政界当局及各界闻人”^②,由于总统胡佛忙于公务,不在首都,最终错过了演出,一直“深以为憾”。这次梅兰芳在美国的第一场演出,当时在美讲学的张彭春应邀出席。对张彭春,梅兰芳并不陌生,此次在国外相见,梅兰芳极力邀请他加入梅剧团,以协助剧团在美国的演出。为了宣传中国的京剧艺术,张彭春答应了梅兰芳的请求。

为了扩大梅剧团在美国的影响力,同时也是为了适应美国的演出方式,张彭春建议剧团在纽约正式演出前,应当在报纸上作广泛的宣传。由于张彭春和美国著名的戏剧评论家斯塔克·杨早就熟悉,而斯塔克·杨也想研究中国的戏剧,因此,值此梅兰芳在美国演出的机会,张彭春就将《梅兰芳》、《中国戏的组织》、《梅兰芳艺术一斑》等宣传品送给斯塔克·杨,并邀请他观看梅剧团的内部彩排,使他对中国的京剧有了初步的了解。因而,斯塔克·杨在演出前能够比较准确地写出介绍梅兰芳和京剧的文章;演出后,他又写了很多剧评,如《梅兰芳和他的剧团的节目》、《梅兰芳》和《艺术使节》,用大量的篇幅介绍梅兰芳的艺术成就

^① 《文汇报》,2001年11月9日。

^② 《申报》,1930年3月29日。

和中国的京剧，起到了良好的宣传作用。此外，张彭春建议聘请一位熟悉美国演艺界的专业人员，由这位人士来安排演出的日程。同时，张彭春还在不少聚会和俱乐部多次做有关中国文化和戏剧的演讲，扩大宣传梅剧团的力度。

为了便于让外国观众了解中国的京剧，张彭春还对京剧进行大胆的革新，如废除京剧演出中的一些陈规陋习，取消检场制度，净化舞台秩序；反对为开打而开打，减少纯交代性的重复场次；演出力求集中、精练，删改剧本，使之趋于合理，如在《贵妃醉酒》一剧中，张彭春提出将原来进酒三次、表演卧鱼势三次都减为一次，使该剧的内容变得更为紧凑，原来要45分钟演完的戏，改编后只需要25分钟即可，不仅缩短了演出时间，也吸引了观众的注意力。

2月16日，梅兰芳表演的京剧在纽约百老汇剧院正式上演。选择在百老汇演出，是因为张彭春知道，只有在百老汇赢得了观众，赢得这里的新闻评论家和剧评人的肯定，梅剧团在美国的演出才会走得更远一些，事实也确实如此。每次演出前的幕前“说明”，都是由张彭春和齐如山两人共同拟定的，齐如山将包括所演剧目的情节、表演动作、唱词大意等内容写成中文，再由报幕的杨秀翻译成英文，最后由张彭春审定。所以，即使不懂京剧的外国人，也能通过这些“说明”，对京剧有一个初步的了解。梅兰芳在美国上演的均是其拿手好戏，如《贵妃醉酒》、《霸王别姬》等剧目，然而，由于语言上的隔阂，美国观众听不懂戏词，一时很难接受中国的京剧，中途退场的现象时有发生。虽然这是正常现象，但是，张彭春担心这一现象会影响梅兰芳和剧团的情绪，以至最终影响到演出效果。针对这种情况，张彭春在介绍剧情的同时，特别强调“中国京剧是古典戏剧的精华，只有最聪明而有修养者才能欣赏。愚蠢者听不懂，他们是难以久坐的”^①。这一激将法果然有效，许多想要中途退场的观众碍于面子，只好牢牢地坐在座位上看完演出，即使在演出后征询他们的意见时，也多是赞扬溢美之词。

第二天，纽约各大报纸上的赞美之词就铺天盖地地涌来，盛赞梅兰芳变化多端的表演方式和炉火纯青的表演艺术。中国的京剧不仅获得了美国观众的认可，也赢得了戏剧专家的一致认同。可见，张彭春和齐如山所做的宣传是有卓有成效的，这些评论成为梅剧团最好的宣传单，为梅兰芳继续访美之行铺平了道路。虽然美国当时正处于经济危机的打击中，但是排队买票的人十分踊跃，以至于三天中就将两个星期的票销售一空，票价也被抬高。此后，梅剧团所到之处，鲜花掌声如潮。

梅剧团在美国的巡回演出，足迹遍布西雅图、纽约、华盛顿、芝加哥、旧金山、洛杉矶、檀香山等地，历时半年之久，演出达七十多场，与美国各地文化界、艺术界进行了广泛的交流。除了演出，梅兰芳还要参加许多社会活动，进行演讲，

^① 黄殿祺编：《话剧在北方奠基人之一——张彭春》，中国戏剧出版社1995年版，第128页。

张彭春都会全程陪同,担任翻译,直到梅剧团到达檀香山,演出完毕,才结束了总导演的职务。梅兰芳和张彭春,齐如山等人不遗余力的传播中国文化的精神,深深感动了斯塔克·杨,看到“他和他的两位朋友(指张彭春和齐如山)回国之前,疲劳的脸色苍白,但我只有一次听到他们暗示累了。我只想指明梅先生和他的剧团成员一直把他们自己视为中国文化的使节,并指出他们为此而付出的巨大劳动程度”^①。

在齐如山和张彭春等一批留学生的努力下,梅剧团出国演出取得了成功,京剧真正开始走向世界,不仅使西方人欣赏到了中国的戏剧文化,也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外国人对中国京剧存在的偏见和误解,扩大了京剧在世界的影响力。这次演出在美国各界中产生了强烈的反响,他们“都不把他当一个普通的戏剧角色看待,都把他看作一个沟通两国文化的艺术家,联络两国感情的国民大使,所以都用外宾礼貌相待”^②。美国的戏剧评论家们,则以内行的眼光品评着中国的京剧和梅兰芳的表演,他们从京剧中看到了许多可以借鉴的地方。如著名戏剧家尤金·奥尼尔,通过多次观摩京剧,发现他原来在戏剧中所采用的“旁白”手法,曾在美国引起不小的轰动,但是,在京剧中早已存在。而另一位戏剧评论家斯塔克·杨,很感兴趣中国京剧中的象征手法,“京剧中有马鞭代替一匹马,四个龙套表明千军万马,舞台上任意确定的位置表明不同的场所等等”^③。两年以后,这位戏剧评论家再次发表文章,盛赞梅兰芳的同时,他还指出,梅兰芳“同张彭春博士和齐如山教授洞察到外国的东西,除非根据中国的传统和思想来加以创新,否则就没有什么能够对中国有用,不会取得进展,也就一无所获”^④。甚至有的戏剧家将中国的京剧和西方古典戏剧相比较,通过比较,让他们在佩服中国戏剧优秀的同时,更增加了对中国艺术的认同感,他们从比较的视野下发现了京剧的优点,无形中提高了中国京剧的地位,最终成为京剧走向世界的关键一步。至于美国的电影界,更是从中国京剧中吸取了养料,在电影中,“有些地方很像中国戏,有话白,有表情,到相当的时候,就起歌唱,这种情形与中国戏实在没有什么分别,并且这种表演令观众欢迎”^⑤,对美国有声电影开始走向繁荣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可以说,梅兰芳赴美演出的成功,梅剧团能够载誉而归,这些都与齐如山和张彭春在国内所做的充分的思想准备、物质准备和舆论准备分不开。这次访美演出,使齐如山和张彭春等人深深意识到,中国戏剧要想走向世界,必须既要保持中国特色,又要适应外国人的欣赏习惯,而世界戏剧也同样需要在

^① 黄殿琪:《话剧在北方奠基人之一——张彭春》,中国戏剧出版社1995年版,第276页。

^② 齐如山著:《梅兰芳游美记》,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104页。

^③ (美)斯塔克·杨著:《梅兰芳》,转引自梅绍武著:《我的父亲梅兰芳》,百花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第279页。

^④ 梅绍武著:《我的父亲梅兰芳》,百花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第74页。

^⑤ 齐如山著:《齐如山回忆录》,中国戏剧出版社1998年版,第144页。

中国京剧中吸收营养，从而体现出文化交流的意义。

这次访美演出的成功，树立了中国人对京剧的自信心，为中国京剧在美国的进一步传播创造了有利条件。继梅兰芳演出之后不久，中国的其它剧团也开始出现在美国的舞台上，使得京剧在美国的影响力进一步扩大。

3. 留学生与梅剧团的苏联之行

访美归来，梅兰芳等人就开始与驻英、法、德等国的外交官们联系赴欧演出的事宜。苏联对外文化协会得知这一消息后，即请求中央社特派驻苏记者戈公振与梅兰芳联系，促成了梅兰芳的访苏之行。而且，当时正值中苏两国因为“中东路事件”，外交关系颇为紧张，于是，邀请梅兰芳访苏又有了更深层次的原因，为这次访苏之行蒙上了一层政治色彩。

有了访美演出的成功经验，这次演出的准备工作仍是由齐如山负责，张彭春担任剧团的总导演，这种分工使得他们在筹划访苏演出时能够游刃有余，各项准备工作有条不紊的进行。舞台上所有的行头、布景、道具等，由齐如山在北平就近督制，其中一部分绣品，专门到苏州定制的，梅剧团演出使用的帐幔，是由黄绸制成，上面绣有梅花和兰花，光彩照人。舞台上的地毯、宫灯，都“处处要显露出东方的色彩和我国特有的美术价值”^①。这次访苏的宣传品，也有几本英文的小册子。一本是《梅兰芳与中国戏剧》，书中收有“张彭春先生写的《中国戏剧艺术之特色》及美国大戏剧家史托克扬（即斯塔克·杨的另一种翻译）所写的《梅兰芳艺评》等文。最后一篇是齐如山先生所写，专论中国戏剧表演时的姿势、歌唱、台词以及舞台上所用的象征道具、服装、乐器及脸谱等，里面还附有服装、道具、乐器及脸谱等彩色的插图多帧，印刷颇为精美”^②。一本是《梅兰芳在苏联所表演之六种舞之说明》，该书使用中式装订，封面由黄绫制作，显得古朴雅观。书的内容分为前后两个部分，前部介绍正剧，后部介绍舞剧。还有一本是《梅兰芳在美国所得之评论集》，这本书将梅兰芳在美国演出时报纸和杂志中所载的关于中国戏剧的评论，择要集印而成。除了这些宣传的小册子，还印制了许多剧照的照片，寄到苏联，以备宣传之用。除了使用原来访美演出用的宣传品外，张彭春还将梅兰芳访美演出时美国文艺评论家所写的对梅兰芳演出及中国京剧的评论，编成《梅兰芳在美国：报告及评论》一书，而他写的《中国舞台艺术纵横谈》一文，被收入在苏联出版的英文宣传品的《梅兰芳与中国戏剧》一书中。

在总导演的人选上，张彭春成为梅兰芳和他“缀玉轩”的朋友们众望所归的最佳人选。在获得了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准假两个月的允诺之后，张彭春和梅剧

^① 许姬传：《梅兰芳游俄记》，转引自《文史资料选编》，第二十七辑，第114页。

^② 许姬传：《梅兰芳游俄记》，转引自《文史资料选编》，第二十七辑，第115页。

团踏上了访苏之旅。由于张彭春的假期有限,不能和梅兰芳继续欧洲的考察参观任务,所以,在胡适的联系下,留美戏剧家余上沅成了梅剧团的副导演,全称陪在梅兰芳的身边。在访苏演出剧目的选择上,梅兰芳、张彭春、余上沅等人又专门邀请了曾经留过学的著名学者谢寿康、欧阳予倩、徐悲鸿、田汉等人商量,推选适合在国外演出的剧目,最后大家一致决定,将这次演出剧目分为正剧和副剧两种,正剧有《打渔杀家》、《虹霓关》、《汾河湾》、《汾河湾》、《刺虎》、《宇宙锋》、《贵妃醉酒》;副剧多是舞剧,姿态剧等,有《红线盗盒》(剑舞)、《西施》(羽舞)、《麻姑献寿》(杯盘舞)、《思凡》(拂尘舞)、《木兰从军》(戟舞)、《抗金兵》(戎装舞)、《盗丹》(武术剧)、《盗草》(武术剧)、《夜奔》(姿态剧)等等。

1935年2月21日,在驻苏大使颜惠庆(早期留美学生)的陪同下,梅兰芳登上了特意来迎接的苏联邮轮“北方号”,与之同行者还有明星公司经理周剑云和影星胡蝶,以及戈公振的侄子,《大公报》记者戈宝权等人。在苏联媒体的积极宣传下,梅兰芳的大名在莫斯科已经家喻户晓了。在苏联的首场演出选在莫斯科的“高尔基大音乐厅”举行,舞台的布置依然体现着中国特色,幕布是由黄缎为材料,上面绣有梅花、兰花的图案和梅兰芳的名字。演出前,中国驻苏大使颜惠庆在演出前专门为大家解释了中国“忠孝节义”的含义,他将中国京剧的剧情特色归纳为“忠孝节义”四个字,认为只有真正理解了这一中国传统要义,才能真正理解中国京剧的剧情。张彭春代梅兰芳致谢词之后,演出正式开始。当晚演出共上演了五场,有梅兰芳的《青石山》和《刺虎》。随后,梅剧团又移师列宁格勒,又折回莫斯科,在莫斯科大剧院演出,这一剧院只上演歌剧和芭蕾舞剧,梅兰芳能够在此演出,表示了苏联对中国京剧艺术的认可,至少在他们看来,中国的京剧是一样可以和歌剧及芭蕾舞一样能够登上大雅之台的艺术。这次演出,苏联的许多知名人士观看了演出,斯大林也前往观看,不过比较隐蔽。1934年3月20日,张彭春又陪梅兰芳到莫斯科艺术俱乐部演讲,梅兰芳演讲的题目是《中国戏剧艺术的演讲》,并现场示范,张彭春为之担任翻译。在访问中,张彭春还在苏联会见了著名戏剧家梅耶荷德和丹钱柯,彼此交流了戏剧表演艺术经验。

这次苏联之行,齐如山和张彭春仍然全力支持,他们积极的准备工作是访苏演出得以成功的重要前提,将中国的京剧介绍到苏联,是留学生们时常挂在心中的一个梦想,和梅兰芳的合作,不仅实现了他们心中的梦想,让更多的外国人欣赏到京剧,同时也向世界证明了中国文化的魅力,而国外的许多戏剧家、电影家们从中国的京剧中获得了启发,从而促进了世界文化的进步。

4. 留学生与中国戏剧作品的翻译

表演戏剧,离不开剧本,作为文学作品的剧本很早就由传教士介绍到了西方。但是,很多剧本被窜改得面目全非,因而并不能称为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文化,这就需要既熟悉中国文化,又懂外语的人来更正这些错误,而中国的留学生显然比传教士更能胜任这一角色。由他们翻译的中国戏剧作品,能够最大限度地纠正这些错误,让外国人看到完整的中国戏剧作品。

以元杂剧为代表的中国戏剧文学,是留学生汉籍外译所关注的一部分,尤其是《西厢记》这部经典爱情故事,作为元曲的“压卷”之作,不仅在于其表现了年轻人反对封建礼教和封建婚姻制度的进步思想,还在于它在戏剧冲突、结构安排、人物塑造等方面,所取得的艺术成就。因此,在相当长的历史年代中,《西厢记》深深地影响了后代的文学进步乃至人们的生活观念,所以,留学生翻译的外文版本也比较多。1922年,留法学生曾仲鸣编译的《中国诗文选》中,收有王实甫的《西厢记》中的一折。1933年,徐仲年的《中国诗文选》一书中,收有他翻译的《西厢记》第四本第三折“长亭送别”的译文。1934年,法国里昂博斯克·弗雷公司出版了陈宝吉(里昂中法学院文学博士)翻译的《西厢记》一书,全书共分六章,第四章为《西厢记》二十折的全部译文。在“导言”和“结束语”中,陈宝吉还介绍了中国戏剧的发展,《西厢记》的渊源、演变及评价,《西厢记》对明、清喜剧的影响,《西厢记》被金圣叹列为六才子书以及将王实甫与庄子、屈原、司马迁、杜甫、施耐庵相提并论的情况。1935年,上海出版社将熊式一翻译的《西厢记》中的《莺莺传》一段英文,发表在《人民论坛报》第五号第二十一期上。同年,熊式一翻译的《西厢记》,由伦敦的梅林因出版社出版,该书封面上“西厢记”三个汉字是由熊式一题写的,扉页中有剧中女主人公崔莺莺的画像,“画像上款题‘唐崔莺莺真’,下款题‘宋画院待诏陈居中写’”(这是最早见之于刊本的莺莺像)。戈尔登·博顿利为该书撰写了《序言》,博顿利在序言中将中国戏曲与希腊戏剧以及英国戏剧加以比较研究:“莺莺的文雅丰姿有时接近于朱丽叶,而焦虑的张珙在某个时候蒙受的痛苦却很像焦虑的特雷斯登。”美国著名汉学家海陶玮高度评价了这个译本,认为它是基本达到了忠实于原作的译本,但海陶玮认为,从韵文的角度看,这个译本仅表达出原作内容的四分之三。可见,文学作品在翻译的过程中,要想完全达到原作的境界是不可能的,毕竟由于文字的变化,无法产生中国文字特有的韵律美。除了《西厢记》,留学生还翻译了其他戏剧作品,如在徐仲年的《中国诗文选》中,还收有马致远的《汉宫秋》的第四折,《窦娥冤》的片断,《牡丹亭》中的“腐叹”,洪升的《长生殿》中的“闻铃”,孔尚任的《桃花扇》中的“守楼”一出戏。而徐仲年的《中国诗文选》中收有《凤仙》一剧。1933年,吴益泰的《中国小说》中有《黄英》、《马

介甫》两篇译文。

留学生们除了向外国介绍中国的古典戏剧以外,也没有忽略现代戏剧作品的传播。1931年10月,留日学生陶晶孙(左联成员)与尾崎秀实合作,编选了一本戏剧集《蜂起》,作为国际无产阶级文学选集之一,由日本四六书院出版。书中收有叶沉的《蜂起》、陶晶孙的《勘太与熊治》、冯乃超的《阿珍》、郑伯奇的《轨道》、田汉的《火之跳舞》等几部剧作。曹禺的戏剧《雷雨》,由姚克(留学英国)翻译成英文,发表在1936年的《天下》(英文)月刊上。1937年,美国剧作家迪安访华之际,曹禺担任翻译,并将自己的《雷雨》(英文版)一书赠给他。《雷雨》的日译本是留日学生刑振铎翻译的,1936年由汽笛社出版,日本著名的戏剧家秋田雨雀和郭沫若为之作序。萧乾主持的《中国简报》上刊有郭沫若的《王昭君》、田汉的《湖上的悲剧》、熊佛西的《艺术家》。此外,田汉的短剧《南归》被留学意大利的周尧译成意大利文,发表在当地的报刊上。相对于中国古典戏剧文学作品而言,被留学生介绍到国外去的中国现代戏剧文学作品十分有限,作品也相对较少,尤其是对现代名家名剧的介绍力度远远不够。

留学生向国外传播中国的戏剧文学,除了翻译戏剧作品以外,还有许多种途径。王国维曾在罗振玉的资助下,1901年赴日本留学,辛亥革命时东渡日本避难,日本的铃木虎雄曾经多次向他请教中国戏剧方面的问题,“不止词曲,有关典籍,清朝掌故,社会风俗,日常琐事等事项,我得湘生启蒙之利,不遑枚举”^①。许多日本戏剧学家们在中国留学的时候,都从王国维那里受到教益,名师出高徒,他们中的很多人后来成为研究中国戏剧的专家,这对中国戏剧在日本的传播,贡献巨大。1921年,洪深和张彭春经常在美国的一些文艺团体中发表演讲,“次数非常之多,”洪深只讲“皮簧”,张彭春则是“从元曲讲起”,可见,留学生们已经开始有意识地宣扬中国的戏曲艺术。1931年2月,张彭春在伦敦大学做了题为《中国传统戏剧和技巧》的演讲,听众达500人之多,演讲过程中听众数次鼓掌或踢地板(表示欢迎)……演讲结束后,掌声足足有十几分钟。5月,在黄佐临(留学英国,专攻戏剧)的安排下,张彭春应圣丹尼之邀,在伦敦戏剧学馆和老维克剧院做学术报告,题目为《京剧艺术及技巧》,报告形象生动,又具有很强的理论性,再加上熊式一翻译的《王宝钏》在英国上演,由此在英国引发了一场京剧热。

在留学生的积极推动下,中国戏剧实现了走向世界的目标,中国的“国粹”渐渐被外国人认可和接受。但是,在中国古典戏剧的翻译上,留学生做得相对欠缺,剧本主要集中在古典戏剧方面,现代戏剧介绍的比较少。在作品的选择上,过于集中在某一作品上,《西厢记》这一以讲述男女爱情的剧本,成为留学生译

^① 马祖毅,任荣珍著:《汉籍外译史》,湖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543页。

介的首选目标，其他剧目显得相形见绌了。

五、留学生与中国绘画的传播

1. 留学生组织的“中国现代画展”

在外国人看来,近代以降,中国是没有艺术的,中国的国画早已成为一门历史艺术,现代艺术似乎还没有产生。但是,以刘海粟、徐悲鸿、张大千等留学生为代表的中国现代画家们,兼学中西,既坚持了中国绘画的艺术风格,又吸取了西方艺术的养料,改进国画,使之具备现代的内涵,为中国画重新走进世界艺术的殿堂,做出了他们的贡献。也正是这些留学生们,促成了几次在国外举办的大规模中国画展,扩大了中国艺术的影响力,在国际艺术舞台上为中国绘画争得了一席之地。

1933年1月,为了提高中国绘画的国际地位,应法国国立外国美术馆邀请,徐悲鸿前往巴黎筹备中国画展。此次欧洲之行,徐悲鸿携带了数百幅中国近代绘画,其中有他自己的作品及收藏,有当代著名画家的作品,有购自画家本人的,也有从私家收藏中借来的。为筹备这次画展,徐悲鸿积极奔走于许多画家之间,广泛收集作品,最后集中了任伯年、吴昌硕、齐白石、高奇峰、张大千、陈树人、张书旗、郑曼青等人和他本人的三百余件名作。这次美展中的一部分中国古画来自伯希和从敦煌运来的书画,一部分来自中国古董商卢芹斋的个人收藏,以及欧洲收藏家的藏品,共计六七十幅,加上中国当时画家的作品二百多幅,“可谓洋洋大观,欧洲未有之创举”。这些画代表了中国绘画的各个流派,比较全面地展示了中国绘画艺术的成就。1933年5月10日,由徐悲鸿主持的中国现代绘画展在巴黎市中心的公各尔广场的国立外国美术馆正式开幕,法国著名大诗人瓦雷里抱病为画展写了序言。参加开幕式的中方人员有徐悲鸿、顾维钧夫妇、萧参赞、赵颂南、刘大悲、张凤举及中国各界留法学生多人。法国方面有教育部长特蒙齐等政界名流、各博物院院长、美术观察员、著作家、学者、贵族及美术家等,与会者达三千多人,场面极为壮观。徐悲鸿以《九方皋》、《古都回忆》、《颠预》、《枇杷》、《雄鸡》、《湖畔》、《鸭》、《六朝人诗意》、《水牛》、《庐山五老峰》、《马》、《狮》、《群鹅》、《南京一多》、《猫》,共十五幅作品参展。《古都回忆》一画尤其受到法国报纸的好评,其《柏树》被称为“堪与巴比松画派大师卢梭的橡树相媲美”。张大千也以《金荷》一画轰动欧洲,被巴黎博物馆购藏,他的另一幅《江南景色》被莫斯科博物馆购藏。

这是中国现代绘画首次大规模介绍给法国人民,在巴黎引起了不小的轰动,深受法国人民的欢迎。因此,展期又延长半个月,在一共四十五天的展览中,参

观人数达三万余人,展览目录在几天内连印了三版。法国许多报章杂志均以大号标题,对这次画展热烈的气氛和空前未有的盛况进行了报导。《巴黎时报》评论认为,这次画展展示了中国世代保存下来的固有的民族精神。《巴黎周报》认为:“中国现处困难之秋,虽不能运其古代名画来法,然观其生气勃勃,令人注意之近代画展,已大可为我们赏叹不置之开端,盖中国画之各种作风,及其各种趋势,均于此有极高价值之代表作也。”^①著名美术评论家米勒·莫克雷更是连发三篇评论文章,对中国绘画艺术的成就表示惊叹。巴黎的《法国驿使杂志》高度评价了齐白石的画,称其集画家、诗家和雕刻家于一身,“为中国美术家之最强干而最奇特者,亦为绘禽兽花木草虫之最能摄取真理者”^②。法国的《世界画报》评论说:“盖每一阅中国美术各种特有而为欧化之秘密。中国美术所保存之真确之特性,即在其有飘渺之灵性,及逸乐之思想也。”^③《巴黎黎明报》更是将中日美术加以比较,认为“日本美术是轻的,架空的,有诗及新鲜之印象的;中国美术则具壮丽之气象,所重在精神,而不在物质,又是抽象的,恰与此巍然不动之佛,蹲踞脚跟,张其大眼,俯视之人朝拜者相契合”^④。《巴黎日报》盛赞中国古代绘画高超的艺术成就,对现代画家保留国粹的精神予以肯定。《前途日报》认为,虽然画展中现代画较多,但是基本沿用古代绘画方法,部分吸收了西方美术的成果,表现的却是现代的内容,他们认为中国现代美术的特点在于“着笔灵巧”和“诗意之表示”,对很多画家的绘画风格也有所评价,认为方药雨的画有实力,又有空间性,黄宾虹、吕凤子的画则装饰有节,经亨颐之灵敏而易感觉,齐白石之奇,人所注目,每一个画家虽然看似相似,实则风格迥异。^⑤

展出结束后,法国政府购买了徐悲鸿《古柏》、齐白石的《棕树》、高奇峰的《帆船》、陈树人的《芭蕉》、汪亚尘的《消夏》、经亨颐的《兰行》、张聿光的《翠鸟》、张书旗的《桃花》、方药雨的《小鸟》、郑曼青的《墨葵》等十二幅中国画,收入该馆开辟的“中国近代绘画展览室”,永久陈列这些中国近代绘画。随后,画展开始在布鲁塞尔、法兰克福、米兰、巴黎等地展出。在米兰,画展还被拍成电影,在意大利等地放映,这次画展在意大利展出,被称为继马可·波罗之后最重要的中意文化交流。通过这次画展,中国绘画开始为欧洲人民和美术界所重视,“据不完全统计,当时欧洲一些国家的报章杂志为介绍画展和中国绘画艺术,发表充满赞美之词的各种评论文章达三百几十篇之多。这在世界美术史上是罕见的”^⑥。不久,徐悲鸿几乎同时接到了英国和苏联邀请他前去展览的电报,由于

^① 《时事新报》,1933年10月13日。

^② 王震编著:《徐悲鸿艺术随笔》,第91页。

^③ 王震编著:《徐悲鸿艺术随笔》,第92—93页。

^④ 王震编著:《徐悲鸿艺术随笔》,第93页。

^⑤ 王震编著:《徐悲鸿艺术随笔》,第96页。

^⑥ 郑理著:《笔下千骑——绘画大师徐悲鸿》,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41—142页。

徐悲鸿对社会主义的苏联向往已久,而且“苏联毫无侵略他国迹象,又是首先对中国取消不平等条约之国家,大革命后厉行建设,久欲访问其邦不得……”^①,所以,他便欣然决定前往苏联举办画展。1933年,由徐悲鸿主持的画展在莫斯科红场的国立历史博物馆展出,苏联著名雕刻家梅尔科洛夫、莫斯科大剧院的卡恰洛夫、卡美尔尼剧院主持人泰伊格夫、著名演员梅宁、戏剧家梅耶荷德等均出席了开幕式。在展览开幕式上,徐悲鸿应邀为观众现场表演,他画的马,栩栩如生,奔跑的姿势跃然纸上,以至于苏联的元帅布琼尼看了之后,激动得请求徐悲鸿:“徐先生,就将这匹马送给我吧,否则我会发疯的!”^②被布琼尼的诚恳而感动,徐悲鸿欣然应允了他的请求,将“这匹马”送给了他。在莫斯科的展览,因为观众的踊跃参观而一再延期,共开放一个多月,有些人甚至参观五、六次之多。后来,画展又在列宁格勒的隐居博物馆展出,也受到了苏联观众的热烈欢迎。画展期间,徐悲鸿还应苏联美术协会、美术院校邀请,做有关中国绘画的演讲,与苏联的画家商讨交换作品的事情。苏联隐居博物馆选定了画展中的十二幅中国画收藏,莫斯科的人民教育委员会赠送给中国十三幅十九世纪以来及现代画家的名画,徐悲鸿于是也将中国画家齐白石、张大千、陈树人、王一亭等人的十五幅作品赠给莫斯科美术馆。莫斯科的这次展览,双方互相交换绘画作品,这在中外艺术史上具有深远的意义。

此次在法国、比利时、德国、意大利、俄国五国举办的中国画展,一共七场,在各国的大学或博物馆中成立了四处“中国近代美术展览室”,世界各大博物馆内能够开辟专室陈列中国画,在中国绘画史上是第一次。各国报纸称赞中国文化的报章杂志数以万计,无论是法西斯国家意大利,还是社会主义国家苏联,都真诚欢迎“此无烟无声,有主张有力量之利器”。这次画展的另一个重要意义在于打破了日本人散播中国绘画的谎言,当时日本也正在欧洲举办画展,他们极力鼓吹日本绘画的出色,贬低中国的艺术,以至于使得外国人只知有日本绘画,而不知中国近代的艺术,通过这次展览,他不仅向各国人民展示了自己的作品,而且,作为中国的文化使者,带去了中华民族灿烂的艺术成就,在中外文化艺术交流史上写下了绚丽的一页。

当徐悲鸿主持的画展在欧洲掀起了中国画热潮的同时,刘海粟主持的中国现代画展也在欧洲亮相。1929年,刘海粟被中央大学派往欧洲考察美术的时候,正赶上日本在法国举办画展,日本政府的积极宣传,不仅使这次画展取得了成功,而且让巴黎的艺术界认为日本的艺术达到了国际顶峰,而中国政府由于缺乏对中国近代艺术的宣传,使得外国人觉得中国现代没有什么艺术成就。刘海粟参观画展后,感触颇深,成为促使他后来答应举办中国现代画展的一个诱因。同年4

^① 朱伯雄,陈瑞林编著:《中国西画五十年(1898—1949)》,人民美术出版社1989年版,第175页。

^② 陈辛仁主编:《现代中外文化交流史略》,中国书籍出版社1997年出版,第261页。

月14日,以“发扬中国艺术,介绍欧洲艺术,联络留法同志感情”为宗旨的“中华留法艺术协会”在法国巴黎成立。5月10日,“中国留法艺术协会”举行会议,推举高鲁、刘海粟、汪亚尘、方君璧、张弦、范年、李凤白、杨秀涛、司徒乔等十二人为筹备委员,负责筹备在巴黎举行中国美术展览会的事宜。该会成员通过参加国外的画展,让西方人看到了中国人在艺术上所取得的成就,在向西方人介绍中国绘画方面起到了良好的宣传作用。1930年,刘海粟在德国法兰克福中国学院讲学的情况被柏林各大报纸予以报导后,引起了德国有关部门的注意,德国学术界的耆宿们经过研究之后,决定与刘海粟商谈将中国现代艺术介绍到柏林一事。经中国驻德公使蒋作宾联系,双方在中国公使馆举行了会谈,决定举办一次中国现代画展,由双方共同负担经费,虽然此事需要中国政府的批准,但是,碰到这个宣传中国艺术的千载难逢的机会,刘海粟岂能放过,于是他决定将这个展览承诺下来。结束在欧洲的考察讲学后,刘海粟启程回国。回国后,刘海粟将举办画展的情况告诉了蔡元培,获得了这位爱国教育家的支持,于是他“决心全力办好这件事,传播华夏文明”^①。1932年,中国柏林美术展览会筹备委员会委员由中央研究院院长,教育部部长,驻德公使,以及刘海粟、徐悲鸿、陈树人、叶恭绰、高奇峰等人组成,蔡元培任筹委会主席,1933年2月13日,在第二次筹委会会议上,增选狄平子、张善子为常委,齐白石、王一亭、林风眠、林文铮为委员,负责评选作品。入选作品的范围限于近现代名作,还有各种笔、墨、纸、砚、色、绢、绫等,附带展出,以供外国观众研究。腾固(留法学生)负责撰写《中国画史论》,列于展览目录之首,由吴湖帆负责选购中国画具,以备展览陈列之用。为了保证作品的质量,筹委会向一百六十多位知名画家发出信函,征集作品。最后经过慎重挑选,评审出现代作品四百余件,近代作品二百余件,这些作品被大家公认为在质量上可以代表中国艺术的实际水平。

1933年11月,刘海粟前往柏林主持中国现代画展,留德学生张佳云、曾瑞祺将德国展览专家李丹田推荐给刘海粟担任秘书,以协助刘海粟筹备画展。1934年1月20日,中国现代画展在柏林市巴黎广场普鲁士美术馆正式开幕。沙尔武博士致开幕词,并由衷地称赞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与现代艺术。刘海粟介绍了当代中国画的派别和渊源,“并希望通过文化交流增进不同民族之间的理解和友谊”^②。在柏林举办画展的一个月期间,参观人数达五万人次,柏林每天都有观众手拿当天的报纸,排成长队守候在美术馆门前,等候刘海粟为他们签名。很快,中国现代画展成为报刊、学校、咖啡馆里人们议论的中心。画展在德国文艺评论家中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德国前途报》载文评论中国现代美展,参观中国画展后,“觉得徜徉迷离于一浓梦之中,宇宙里竟还有这样更高尚而优美的世界,较之我

^① 柯文辉著:《艺术大师刘海粟传》,山东美术出版社1986年版,第197页。

^② 《艺术大师刘海粟传》,第210页。

们更为高尚与静洁”^①，称赞中国是“超脱高尚的民族”，认为中国画的“情调在文人画派的传统内充满着诗意。一鸟一兽也多静寂而无关地嵌入这轻微的和諧音调之中，就是一个人物也竟不是画中的主角，他不过是一个微弱而无足轻重的东西，在此而使其环境音调发生诗意。因为题材的新奇与色彩之惊异，非中国人所称尚，故一切全视表情创作之妙。……以最简单的笔墨，达到最深刻的效果，便是中国画的特点”^②。可见，评论家们对中国画还是有着很深的研究，其评价也切中肯綮。画展结束后，柏林美术学院特别开辟“中国现代画厅”，希望留下十七幅作品及部分纸笔，长期陈列，以供学者研究。在征求原作者的同意后，各地展出结束后，刘海粟向柏林美术学院赠送了一部分中国绘画和画具。作品如下：任伯年的《渔翁》，吴昌硕的《紫藤》，黄宾虹的《峨眉山》、《大渡河》，王一亭的《柳鸦》，高奇峰的《花桥烟雨》，张大千的《墨荷》，陈树人的《紫云》，溥儒的《严寒积雪》，梁公约的《瓶菊》，潘天寿的《朱荷》，王个簃的《菱角》，高剑父的《松风水月》，孙孟绿(女)的《荷塘》，刘海粟的《松鹰》、《葫芦》、《赤壁图》。4月1日，德国教育部部长主持了中国名画厅开幕式，刘海粟、刘崇杰出席。3月25日至4月8日，画展又在汉堡举行，“据当时统计，观众达五万六千余人。报刊载消息及评论二百八十多篇”^③。这次在汉堡的展览，一样获得了成功，《汉堡侨民报》评论刘海粟的画时，认为他“捕捉印象的能力很惊人，画家精神状态升华到出人意表的明彻之境……他继承着可贵的古老传统，同时却负担着现代人对大自然的情感”^④。从此，中国画开始在杜塞尔多夫、阿姆斯特丹、海牙、日内瓦、伯尔尼、布拉格等地巡回展出，影响很大。

1935年2月20日，应英国政府邀请，伦敦百灵敦画院举行了中国现代绘画展览会。在英国办画展的手续繁杂，需要通过一些权威人士审查，于是，刘海粟等人在大使馆举办茶话会，招待英国文艺界人士。当时正在英国留学的钱钟韩和朱国洗利用课余时间主动来帮助刘海粟布置房间，整理展品。此次招待会陈列的作品有吴昌硕、齐白石、黄宾虹、潘天寿、陈树人和刘海粟自己的画，将近四十余幅，同时陈列的还有刘海粟的四幅油画。当天，与会者有大英博物馆馆长罗兰士·泌宁，美术批评家罗基·法兰等三十余人，他们都是对中国文化研究有素的权威人士，此外，前任香港总督和英国驻华大使等人也一同前来，当时留英的熊式一和蒋彝也出席了招待会。英国的专家们在会场仔细观看每一幅画，罗基·法兰认为刘海粟的油画既有高更、凡·高的作风，又有东方书法的线条和民族情趣。可见，即使是西方的油画，中国人也并不是一味模仿，而是将中西文化结合起来，

^① 袁志煌，陈祖恩编著：《刘海粟年谱》，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24页。

^② 《艺术大师刘海粟传》，第213页。

^③ 《艺术大师刘海粟传》，第214页。

^④ 《艺术大师刘海粟传》，第214页。

创造了有中国特色的艺术形式，这也成为外国人欣赏中国画的一个重要因素。招待会结束后，双方决定于1935年在英国的新百灵敦画院举办中国现代绘画展，宣传方面由英美烟草公司负责。为了提高画展的知名度，而钱钟韩和朱国洗又代刘海粟起草了一封给罗兰士·泌宁的信，请求其为画展作序，由刘海粟签字寄出。罗兰士·泌宁不仅为画展做了序言，而且，在他的序言中，再一次高度评价了中国画的艺术特色，认为中国画是“艺术家内心之表识也，是以一点一画之间，精神贯注，仿佛可想见其人之胸怀情绪，虽其勾折顿挫，分毫出入，多非西人所得知，然玩索既久，亦自能悟其妙处。故阅中国画者，当观其生动之笔法，不宁惟是，中国画布局精妙，其不落笔处，较西画着意。又中国画大都纯用水墨，不加彩色，良以点染渲晕之中，可以臻错综和谐之境，而显露色之感觉也。中国之烟墨，洵系奇物，上自浓墨，下至浅淡如轻烟，随笔所至，无不相宜”^①。专家的评论，不仅对中国绘画做出了恰当的评价，对于西方人认识中国的画也有一定的启发作用，更容易抬高中国绘画的国际地位。刘海粟自己也写了篇文章，介绍中国画的南宗和北宗，由英国学者温可味史翻译后发表。

1935年2月20日，中国现代画展正式在英国博物馆开幕，与会者达三千人之多。这次画展持续一个月之久，英国四十多家报纸纷纷对这次画展予以报导，《伦敦快报》刊登了麦·唐纳爵士对这次画展的评价，他不仅看到了中国现代艺术所取得的成就，而且还看到了中国现代艺术艰难成长的历程，如“吴昌硕、任伯年、蒲作英、齐白石等人承继古代的精神，作奔放的绘画，又有高奇峰、高剑父、陈树人、贺天健、叶少秉作极写实的绘画”^②。英国的《泰晤士报》第一次登载有关中国文化方面的情况，该报的社论更是对中国艺术大加推崇。

从这些评论中可以看出，中国画展在欧洲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促使西方人开始关注中国的绘画，并给予正确的评价，提高了中国画的国际地位，改变了西方人对近代中国没有艺术的偏见，表明中国画在世界艺术舞台上的魅力是不容忽视的。也使留学生们认识到，只有加大宣传力度，扩大国画影响范围，中国的艺术才会真正的走向世界。在这方面，中国的留学生无疑充当了文化交流的“急先锋”，正是他们的积极主动，才使中国艺术为世界所熟悉。欧洲画展的成功举办，对国内各界人士也有所触动，他们看到此次画展对欧洲人了解中国画的作用，在欧洲两年时间的展览中，十余次的巡回展出，“震动全欧，使欧人明了吾国艺术尚在不断地前进，一变欧人以前之误会。因其他国家对各国宣传艺术，以东方艺术代表自居，吾国以前则未及注意”^③。此次画展，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欧洲人的看法，这是刘海粟个人积极宣传中国艺术的成果，也是全国艺术家们努力争取来的

^① 《艺术大师刘海粟传》，第221页。

^② 《艺术大师刘海粟传》，第223页。

^③ 《艺术大师刘海粟传》，第232—233页。

荣誉。

这次中国现代绘画成果得以在国外展出,不仅让西方人见识了中国现代绘画的艺术成就,也再次验证了中国国画的艺术魅力。此次画展也受到了国人的肯定,认为“这次中国艺术打出去,开了有利的一炮,在国际艺坛上破除了西方人轻视中国文化艺术的偏见,在世界艺坛上为祖国文化树立了威信”^①。这是中国现代美术在海外的第一次大规模的展出,是中国现代美术走向世界的第一步,不仅破除了西方人对现代中国没有艺术的偏见,也是向西方宣传中国艺术的有利时机,使中国艺术在国际画坛上获得了一席之地,在世界艺坛上树立了中国艺术的崭新形象。这次画展更加坚定了这批留学生画家们将中国艺术传播到海外的信心,因此,中国绘画多次在欧洲亮相,促进了中国绘画在海外的传播。

2. 留学生在国外举办个人画展

举办大规模的画展,需要花费巨大的人力、物力,而近代中国内忧外患,难以筹备这种大规模的画展,所以举办这种画展不是宣传中国文化的最好途径。许多中国留学生独立在国外举办的各种形式的画展,如个人画展、募捐画展等等,规模虽小,但是由于操作简单,根据画家本人意愿选择画作,节省时间,反而成为宣传中国绘画的另一个重要途径。尤其是许多在国际上有影响力的画家,如刘海粟、徐悲鸿、林风眠、张善子、张大千等人,多次在海外举办画展,他们用自己的艺术作为宣传中国文化的手段。

1922年4月,为了宣扬东方艺术的精华,应日本画家荒木十亩和渡边晨宙的邀请,刘海粟、陈衡恪、李超士以及日本人石野宏哲等人,在上野举办第一届中日联合美术展览会。刘海粟,1896年生于浙江常熟,1919年赴日考察美术,1929年由大学院派往欧洲考察美术,并在欧洲各国举办画展,作有关中国绘画的演讲。虽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留学生,但是他在国外游历的经验,也是一次学习和交流的过程,陈衡恪,江西义宁人,1903年留学日本,在诗文书画方面,造诣很深。李超士先是留学英国,后考入法国巴黎国立美术学院学习。这次展览,陈衡恪携带他和齐白石等人的作品参展,不仅他的画被抢购一空,齐白石的画《杏花》,也首次为海外艺术家所赏识,从此,齐白石在日本名声大震,画价亦水涨船高。这是中国现代绘画在国外的第一次展出,画展的举办,对于宣传中国现代绘画艺术,提高中国的国际形象,具有积极意义。在法国,很多学习绘画的留学生,积极宣传中国的绘画艺术。1924年春,吴大羽、林风眠、李金发、刘既漂、王代之、曾一樵、唐隼、林文铮等一批中国留学生,在巴黎发起组织了旨在“为

^① 李永超著:《张大千全传》(上册),花城出版社1998年版,第107页。

国人世人创造有生命的艺术作品之信念”为宗旨的“霍普斯学会”（希腊文 Phoebus 的译音，即阿拉伯文 Apollo，次年该会改名为“海外艺术运动社”），该社以为宗旨，该学会的成员多数是热心传播中国绘画的留学生们组成。2月，“霍普斯学会”联合另一个旅法艺术团体——美术工学社，发起成立了“中国古代和现代艺术展览会筹备委员会”，决定在法国的斯特拉斯堡举办一次中国美术展览会，当时正旅居斯特拉斯堡的蔡元培，被特邀为名誉会长。5月21日，中国美术展览会正式开幕，“巴黎各大报，几无不登载其事”。1925年，在巴黎举办的万国工艺美术博览会上，留法画家林文铮任“中国馆”秘书长，负责主编展品目录，并用法文撰写论文《中国美术的精神》，达一万字，在巴黎发表，引起国际人士对中国画的注意。

1927年，因为上海美专学潮，刘海粟以“学阀”的罪名遭通缉，被迫出走日本。当时，他已是崭露头角、闻名于世的著名画家了。因此，东京“朝日新闻社”在新厦为他主办了个人画展，观众十分踊跃，以至于原定十天的展览，又延期三天，参观者达万人，所有杰作被购藏一空。他的《泰山飞瀑》、《月落乌啼霜满林》两幅国画被日本天皇购藏，其他的如《峦树草堂》、《彤云素羽》等国画作品，亦被日本朝野所购藏。旅日期间，他与日本的画界权威藤岛武二、满国谷四郎、石井柏亭等交游，还和日本画家桥本关雪、小室翠云等人即席合作水墨画，因其画风上的豪放恣肆，因而博得了“东方艺坛的狮子”的美誉。在举行画展的同时，他还举行了多场学术演讲，如《石涛与后期印象派》。这篇报告和《石涛的艺术及其艺术论》一文，被译成日文，在小室翠云主编的《新南画》和《书道画道》杂志上发表。刘海粟在日本开办画展的举动，也促使张大千要在日本举行画展，宣传中国的绘画。1931年4月，曾经留日的张善子与张大千、郑曼青等人被推举为中国古代绘画展的代表，赴日本筹备展览，同时还负责鉴定此次在日本展出的中国唐、宋、元、明、清时期展品的真伪，这次画展展出的展品还包括古代的绘画和近代画家的作品。

1930年6月，应比利时独立150周年纪念展览会邀请，刘海粟担任国际美术展览会评审委员，并将其画作《九溪十八涧》送与参展，获得了国际荣誉奖。1931年3月，德国法兰克福中国学院特地派丁文渊（丁文江之弟，留学德国，时任中国学院的副院长）教授和康特克小姐来到巴黎中国驻法公使馆邀请刘海粟前去中国学院讲学。讲题为：述评南齐美术理论家谢赫的《六法论》。刘海粟认为这是宣传中国文化的有利时机，因而接受了这一邀请。为了使西方学生能够对刘海粟的作品有一个了解，丁文渊提议将刘海粟的作品带回学院一些，“辟专室展出，使学生对海兄作品有个良好的印象”^①，这一建议得到了刘海粟的支持。

^① 柯文辉著：《艺术大师刘海粟传》，山东美术出版社1986版，第187页。

《六法论》分四个单元讲解：一、《六法论》诞生的条件；二、以气韵的生动为纲；三、《六法论》对中国绘画创作的巨大推动力。论证古代人如何追求气韵生动；四、后世对《六法论》的评论及今天研究谢赫名著的现实意义。他系统地阐述了中国历代有关绘画上六法的理论，条分缕析，为中国绘画美学思想发展的线索理清了脉络，对于“气韵生动”这个众说纷纭的中心问题，刘海粟根据自己的绘画实践和对古画收藏鉴赏的经验体会，反复加以阐明，使西方人士对中国美术理论和艺术特色有所理解。丁文渊娴熟的德语翻译，保证了讲学的成功。后来，这一讲稿由丁文渊翻译整理，摘要登在该院学报上，柏林的报界也报导了刘海粟讲学情况，这就扩大了他在德国的影响。1931年6月1日，应巴黎美术学院院长亚尔培·裴那的邀请，刘海粟在巴黎克莱蒙画堂举行“刘海粟欧游画展”，展览为期半个月。法国的教育部代表、美术司长、卢浮宫美术馆馆长、雨果纪念馆馆长旭里埃，亦特巴姆美术馆馆长台若罗亚、国家美术研究院委员雕刻家朗特司基、中国驻法公使高鲁、秘书谢维麟和傅雷、梁宗岱、何如、张弦、司徒乔、张荔英等数百人出席了开幕式。巴黎大学教授、汉学家路易·赖·鲁阿为画展写了序文，并推崇刘海粟为“中国文艺复兴的大师”，肯定了刘海粟在绘画上所做的努力，并称这种“沟通与融和的工作，使欧亚二洲同受其惠”，他看到了中国画需要长年的潜心观察研究，将所画景物融于心中，使之具有了气韵。“所谓气韵生动者，意即在草木、山川、江河之中，都有与人类相同之心灵。气韵是主要的音调，万物之通灵，有如诗歌之互相和答”^①。这种看法，基本上看到了中国画的一些特点，肯定了中国画的价值。法国的亦特巴姆美术馆高价购藏了刘海粟的《卢森堡之雪》，这虽然是一幅油画，但是，作者在画中所展现出的中国书法的线条，显示了中国画家的特有的气质。这次画展的成功，使西方开始注意刘海粟。1934年6月，刘海粟又在巴黎特吕厄画院举行个人画展，其中油画四十五幅，国画八十幅，马蒂斯、凡·东根等出席了开幕式。他的国画《三千年之蟠桃》以及油画《西湖之秋》被法国国家美术馆购藏，而《清潭水牛》为苏联驻法大使购藏。

在中国画展在各国展览期间，刘海粟还多次向欧洲的文艺团体和大学演讲有关中国美术史论各方面的问题，演讲内容如下：^②

报告人	报告时间	地点	报告内容
	1934年1月28日	普鲁士美术院	《中国画之变迁》
	2月10日	柏林大学东方语言系	《何谓气韵》
	3月26日	汉堡市美术院	《中国画家之思想与生活》

^① 《艺术大师刘海粟传》，第179页。

^② 据袁志煌，陈祖恩编著：《刘海粟年谱》第122—131页整理而成，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刘 海 粟	4月8日	杜塞尔多夫美术学院	《中国画与诗书》
	5月3日	阿姆斯特丹	《中国画之精神要素》
	8月27日	伯尔尼的瑞京美术大厦	《中国绘画上的六法论》
	1935年2月26日	伦敦	《中国近代美术趋势》
	1935年3月12日	伦敦中华协会	《中国画与六法》

同时，刘海粟还与各国艺术家、教授、学者进行学术交流，宣传中国的文化艺术，在引起人们研究中国绘画的兴趣的同时，也改变了欧洲汉学家和美术史家普遍认为“元明以后，中国绘画一蹶不振”以及“现代东方艺术唯有日本足为代表”的偏见。

当刘海粟的画展在欧洲引起注意的同时，中国另一位著名的画家徐悲鸿也在欧洲举办他的个人画展。1930年，徐悲鸿送选的九幅作品全部入选法国国家美展，他的画以精湛的技巧和独特的东方韵味，获得巨大成功，享誉法国画坛。1931年，为了介绍我国现代美术的风貌，出使比利时的谢寿康，特地带了四十几幅徐悲鸿的作品，在布鲁塞尔举办徐悲鸿画展。谢寿康先将徐悲鸿的四十一幅画的题目译成法文，编印成目录，又将他的美术理论印成册，并配上精美的插图，制成铜版出版。《布鲁塞尔晚报》在副刊“图画周刊”上抢先发表了这些作品，引起各方人士的极大关注。5月19日，举行了徐悲鸿绘画预展典礼，所到来宾均为比利时政府要人及著名画家，共200多人出席。16日，画展正式举行，比利时教育部长前往参观，“从开幕至本月底为止，来人踊跃，新闻界和美术界都作了详细的评论、报道，给予了高度的评价”^①。虽然当时欧洲处于经济危机中，但是，徐悲鸿的画作仍然被高价“捧走”。当年夏天，刘大悲又在里昂大学举行了一次徐悲鸿作品展，在法国引起不小的震动。人们怀着极大的兴趣前来参观，对画展热情很高。这几次画展，不仅宣传了中国的现代艺术，提高了我国艺术的国际威望，也使徐悲鸿认识到在国外举办画展对个人，对国家的重要意义。正是这种决心，才促成了1933年在法国举办的中国现代画展。1934年，应德国柏林美术会邀请，徐悲鸿又在柏林和法兰克福举行了个人画展，五十多家报纸杂志发表了赞誉文章，《柏林日报》在副刊上特设专栏，用整版篇幅介绍徐悲鸿的《九方皋》、《懒猫》、《惊艳》、《鸡》、《六朝人诗意》等作品，并以《中国来的动物》为题，刊载长篇评论，高度赞扬了徐悲鸿在动物画上所取得的辉煌成就。

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在全国人民同仇敌忾、一致抗日的热情鼓舞下，许多著名画家以画笔作武器，在国外举办画展，为抗日募捐经费。他们不仅宣传了中国的文化，也支援了中国的抗日战争，刘海粟、徐悲鸿、张善子、张大千、晏济元等，均在国内外举行过筹赈画展。1938年6月，

^① 王震著：《徐悲鸿》，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57页。

应印度文坛“泰斗”泰戈尔、中印学会以及印度国际大学中国学院院长谭云山教授的邀请，徐悲鸿前往印度讲学。同时，作为中印学会监察委员会委员，他也想借此机会，在印度举办画展，来增进中印两国文化艺术的交流，并把所得款项用来支援抗战。1939年，在前往印度途中，为了赈济国内的灾民，由星华筹赈会主办，徐悲鸿在新加坡举行了个人画展。当时正在《星洲日报》任职的郁达夫，在该报副刊上发表了《与悲鸿的再遇》，回忆了与徐悲鸿的交往，称赞徐悲鸿《田横五百士》、《从此》、《徯我后》等作品气势宏大，是画中精品。当日的副刊上还刊载了黄曼士写的《徐悲鸿先生略历》、史记的《田横五百士故事》、银芬的《谈悲鸿先生的写实主义》等文，都为徐悲鸿的画展作了事实上的宣传。3月14日，徐悲鸿画展正式在新加坡的大钟楼开幕，中国驻新加坡总领事高凌百主持了画展，参加画展的还有英国驻新加坡总督，中国驻新加坡的副领事，以及各界华侨华人，外国友人等一百多人参加展览。由于场地狭小，仅挂出中西画一百九十二幅，分为中国画、水粉画、素描及油画四类；题材以人物画居多，静物、风景极少，最引人注目的当数《田横五百士》、《九方皋》、《广西三杰》等大画幅。所展人物画中，以蒋碧微的画像居多，如《远闻》、《箫声》等，还有他自己的一些自画像，最值得一提的是，徐悲鸿还将自己历年所藏中外古今名家作品也在此次画展中一起展出，其中有任伯年、齐白石、黄宾虹、张大千的画以及吴昌硕、周湘、蒋石渠、王梦白、方药雨、汪亚尘、谢公展、吴湖帆、郑曼青、张善子、溥雪斋、胡佩衡、李苦禅、居巢、居廉、高剑父、赵少昂、欧阳默仙、黄君璧等人的画作，甚至徐悲鸿的父亲徐达章，徐悲鸿的弟子吴作人、黄养辉、顾了然、孙多慈、杨建侯等人也有作品参展。1940年2月20日，应印度诗人泰戈尔之邀，在印度圣地尼克坦国际大学院，徐悲鸿举办了第一次个人画展。大学院的新老学生以及社会各界人士达千人之多，泰戈尔主持了开幕典礼。展品种类极其丰富，包括国画、水粉画、素描和油画，大小共计百余幅，“国画中有马、猫、鸡、牛、小雀、人物等，也有不多的风景、花、树等；其余的如素描、油画等则多系人物”^①。徐悲鸿崇尚写实的艺术，反对因袭模仿，虽然以西画方法独创新格，但每幅画又独具特色。画展期间，印度最有权威的英文杂志《现代评论》和一些本地语报纸都刊载了徐悲鸿的画和评论文章，《国际大学季刊》更是破天荒登载了他的杰作。这次画展，为印度沉寂的画坛注入了一针“兴奋剂”。2月中旬，徐悲鸿在加尔各答的印度东方美术学社举行第二次个人画展，这次展出画作大小200余幅，泰戈尔国际大学美术学院院长鲍斯先生也为之作序，在序言中盛赞徐悲鸿的画“在有韵律的线条和色彩中，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在记忆中已消失的远古景象，而无损于他自己经验里所具有的地方色彩和独特风格”^②。这次画展之后，徐悲鸿被印

^① 王震著：《徐悲鸿》，第76页。

^② 王震著：《徐悲鸿》，第77页。

度的文化界和美术界公认为“艺术大师”。结束加尔各答的画展，徐悲鸿又回到国际大学，开始了在印度的创作和讲学生涯。1941年，徐悲鸿再度回到南洋，在槟榔屿、怡保、吉隆坡等地举行筹赈画展，宣传中国的抗战，所得画款也全部捐献给国内难民。

1938年，国内掀起抗日的烽火。为了宣传中国的抗战，并募集抗日捐款，在周恩来、林森、许世英等人的赞助下，张善子携带他和张大千两人的绘画以及合作的画，共一百八十余幅，取道越南，赴欧美举办画展。1938年1月，张善子在法国巴黎的贡格尔德堡国立外国艺术馆举行了“张善子、张大千兄弟画展”，展览盛况空前，观众也十分踊跃，甚至法国的总统也前来参观，并称张善子为“近代东方艺术的杰出代表”。4月，张善子前往美国，先后在纽约、芝加哥、费城、旧金山、波士顿等地巡回展出。他甚至不顾旅途的劳累，深入到美国的各地大学和群众团体中进行演讲，在展览会或演讲会上，张善子还常常当众挥毫泼墨，现场作画，让外国人亲眼看到中国画的创作过程。在美国，张善子担当起中国文化大使的形象，他以自己高超的绘画技艺征服了美国人，尤其是他画的老虎，栩栩如生，以至于他在美国获得了“绘虎大师”的美誉，并受到了罗斯福总统夫妇的接见。他在美国各州宣讲中国的抗战的时候，罗斯福夫人亦陪同前往，当身在美国的张善子得知罗斯福总统废除了《美日商务通航条约》后，喜悦之情化诸笔端，他精心绘制了数幅巨虎图，分别赠送给罗斯福总统与美国国务卿赫尔等人，罗斯福将这张虎图挂在了白宫林肯像的一边。^①当张善子得知中国航空委员会顾问、昆明航校总教官陈纳德回美国筹组空军志愿队援华抗日的消息后，十分高兴，特意绘制《飞虎图》赠送给陈纳德。为此，陈纳德将空军援华志愿队命名为“飞虎队”，并将此图制成旗帜与徽章，分发部下，从此，“飞虎队”闻名于中国战场。陈纳德对《飞虎图》原图十分珍惜，视同拱璧，该图现藏于美国国家博物馆。张善子还以工笔精心绘制了两幅高一丈一尺，宽五尺的《耶稣圣像》，赠给美国的纽约佛亨大学。6月12日，该校举行盛大仪式，向他颁发名誉法学家博士学位。“美国各大学艺术家素钦张氏之名，复仰慕我国画法，多躬往参加盛典”，在此前后，华盛顿黑人大学、芝加哥艺术学院、哥伦比亚艺术学院、纽约女子实用美术学校等也先后聘请张善子为其名誉教授或函授教授。在国外举办画展的约两年时间里，张善子共举办100多次画展，募得捐款20余万美元，这笔巨款全部用来支援国内抗战。张善子自己却是节衣缩食，终因积劳成疾，回国后不久即抱病身亡。他为宣传中国文化所做的努力，早已写在中外文化交流的史册上。

1935年，英国伦敦皇家艺术学院举办大型的国外中国艺术展览会，中国政府积极参与，将故宫中珍藏的800多件艺术品运往英国，参加展览。加上欧、美、

^① 转引自《张大千全传》，第174页。

亚其他诸国的藏品，此次展览会共展出 3000 余件艺术品，可谓盛况空前，蔚为壮观。东方的艺术文化在西方大规模展出，让西方人大饱眼福。为了配合这次画展，英国的麦勋书局通过留英学者熊式一推荐，请蒋彝写一本介绍中国文化的书。蒋彝，1933 年前往英国伦敦大学经济学院学习，翌年在东方学院兼职教授中文。接受这一任务后，经过几个月的奋斗，蒋彝的第一本英语著作——《中国眼光》(Chinese Eye)，在展览会开幕之前出版。此书上市后，销路很好，不到一年，即被再版，蒋彝也因此而小有名气。通过蒋彝的介绍，“中国绘画变得生动活泼，富有生活情趣。作者笔调轻松幽默，间以逸事趣闻，娓娓叙述，引人入胜”^①。在书中，他还探讨了中国画与哲学和文学的关系，将复杂深奥的道理讲得清晰易懂，雅俗共赏。

3. 留学生与中国版画、木刻在国外的传播

中国是版画的故乡，也是世界上最早出现木刻的国家。中国的笺纸是木刻艺术中的一朵小花，它是古代文人雅士、画家、刻家和印工共同合作的艺术结晶，许多文人用这种颜色浅淡、图饰精美的信纸抄写诗作和书信，也是文人雅士案头清玩之物。将这些精美的笺纸分类汇总，集结成册，即称之为笺谱，明代著名的《十竹斋笺谱》，称得上笺谱的典范。鲁迅很早就对中国古代版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小的时候曾经将透明的纸蒙在绣像小说上影印图画。从日本留学回来，鲁迅在北京的教育部任职的时候，经常光顾北京古文化市场——琉璃厂，最初搜求碑帖，后来他对精美的笺纸产生了兴趣，文化街上最大的南纸店荣宝斋，更是鲁迅经常光顾的地方。郑振铎（1927 年游学欧洲）也十分倾心于这种木刻艺术，在 20 世纪 20 年代，郑振铎在上海的时候，就开始留意中国古代的版画。随着收藏的增加，以及一些爱好收藏版画的朋友的影响，他眼界大开，对版画逐渐有了完整的认识，以至于逐步产生了出版版画集的想法，这成为后来他与鲁迅合作出版笺谱的重要契机。清末民初，为了适用于西方的钢笔书写，中国的笺纸在印刷上采用“舶来之薄而透明的洋纸”或者是上矾的纸制笺，破坏了笺纸原有的丰韵，即使是沿用古法制笺，质量也大大下降。这种情况引起了热爱笺纸艺术的鲁迅和郑振铎的担忧，以至于郑振铎惊呼：“刻笺之业将随古城的荒芜而销歇乎！”为了挽救古老的笺纸艺术，鲁迅、郑振铎二人以敏锐的洞察力和高度的历史使命感，担当起抢救这一文化遗产的重任，二人决定将那些珍贵、有特色的笺纸搜集起来，集书出版，两位志同道合的文人，开始了愉快的合作。由于鲁迅在上海，无法亲自搜集笺纸，于是，留居北京的郑振铎主动承担了这一任务。1933 年开

^① 郑达：《中国文化的国际使者——记旅美华裔游记作家、画家、诗人蒋彝》，转引自《美国研究》2003 年第 1 期。

始，郑振铎不辞辛劳，跑遍了北平二三十家南纸店，搜集到了光绪以来的笺样五百多张，他寻访到一批笺样后，立即寄往上海，由鲁迅选择。鲁迅收到笺样，经常连夜审阅，决定取舍，再迅速寄回北平。这样，笺谱的所有出版事宜，都是靠鲁迅与郑振铎频繁的书信往来，以及郑振铎在京沪间奔走完成的。鲁迅在郑振铎提供的580多种笺谱中选取了332幅作品，编成六册，内收人物、山水、花鸟笺等。1933年12月，分别委托荣宝斋、淳菁阁、静文阁、清秘阁等十家南纸店刻印。《北平笺谱》完全采用木版彩色水印，第一卷是仿古笺48幅，第二卷是59幅，第三卷61幅，第四卷50幅，第五卷55幅，第六卷59幅。300多幅笺纸，“大胆细致的笔致、各种各样的色调——单色、复色、暖色、冷色、醒目的色调——生动有力的展现了自然美，是百看不厌的信笺”^①。在第一版的一百部《北平笺谱》的版权页上，均有鲁迅和郑振铎的亲笔签名。第一版出版后，立即被抢购一空，又再版一百部。鲁迅看到这种情况，曾在信中欣喜地写道：“《北平笺谱》如此迅速成为‘新董’，真为始料所不及。”

笺谱出版后，鲁迅分别将之寄给了纽约、上野、巴黎等地的图书馆，将这一古老的中国艺术展示给外国人。鲁迅还寄赠给苏联画家和雕刻家协会《北平笺谱》各一部，馈赠给日本友人山本初枝、坪井芳治、佐藤春夫、增田涉等人以及美国朋友斯诺各一部。当鲁迅得到内山嘉吉寄送的东京和光学园学生的木刻习作后，向这些学生们回赠了一些笺纸，表现了鲁迅希望日本儿童了解中国的木刻艺术的美好心愿，表达了鲁迅对《笺谱》这种民族艺术的热爱和自豪的心情。翌年，鲁迅和郑振铎又委托荣宝斋翻刻明代的《十竹斋笺谱》，这两部书的出版和翻刻，凝聚了鲁迅和郑振铎巨大的精力和心血。鲁迅还主动将中国的版画作品寄赠给外国艺术家，1934年1月11日鲁迅将一些《晚笑堂画传》之类的寄给俄国木刻家，1月9日寄苏联木刻家的信中，随赠了顾恺之所画、清阮氏刻本《烈女传》四册，《清在堂梅谱》一册，《晚笑堂画传》四册，石印的《历代名人画谱》四册，《耕织图》二册，《圆明园图咏》二册，共有六种十七册。

除了收藏中国古代版画，鲁迅还十分关注中国新兴木刻的发展。在他的扶植下，中国新兴木刻运动开始兴起，还多次举办现代木刻展。1932年，法国女记者谭丽达通过斯诺和姚克，约鲁迅收集中国左翼作家的绘画作品，以便带往巴黎展出。1934年，鲁迅将收集的五十八幅作品寄到巴黎，目录《木刻记录》由姚克译成英文。其中木刻作品有钟步清的《三农夫》、《二个难民》，李雾城的《某女工》、《投宿》、《天灾》、《受伤者的呐喊》、何白涛的《街头》、《小艇》、《私斗》，野夫的《灾民》、《都会的早晨》、《回家》，罗清桢（1935年留日）的《挤兑》、《起卸工人》、《等爸爸回来》、《码头》、《扫叶工人》、《看病》，刘岷（1934年留日）

^①（日）内山嘉吉，奈良和夫著，韩宗琦译：《鲁迅与木刻》，人民美术出版社1985年版，第172页。

的《列宁》、《两个劳动者》、《音乐家》，陈耀唐的《等着爸爸》、《殉难者》、《家庭》、《白色恐怖》、《世界语展览会》等。3月14日，“革命的中国之新艺术展览会”在巴黎皮利埃美术馆开幕，共展出绘画、木刻作品78件，“其中绘画十四件，素描六件，木刻五十八件。这些美术作品，从各方面反映了我国工人、农民、青年学生不畏国民党当局的血腥镇压，所进行的英勇的反抗斗争”^①。展览于3月29日结束，这次展出表达了以鲁迅为首的中国留学生将中国木刻介绍到国外去的良好愿望，他们期望中国的文化成果能够让西方人了解和熟悉。这次展览还得到了法国革命文艺家协会的支持，由皮利埃美术馆馆长沃尔姆具体组织的，比利时著名木刻家麦绥莱勒也大力协助，最终促成了中国木刻在国外的成功展出。法国革命文艺家协会在《给中国同志们完全的支持》一文中，赞扬中国木刻家作品“表现出为自由中国而战的千千万万中国劳动者所进行的斗争，笔法坚强有力，感人肺腑”。安德列·维奥利在《苦难而战斗的中国》一文说：“以前，我们只知道令人失望的中国，被政客、外交官、军阀们割据着。更确切地说，我们不了解中国。多亏这些无名的画家的画，从今以后我们看到四亿劳动者巨大的集体心灵呈现出来，跳动着。也正是这些劳动者构成苦难而战斗的中国——未来的中国。”^②法国组织者为展览会印有《革命的中国之新艺术》说明书一份，收有四幅木刻作品及展览目录，1958年法国的沃尔姆访华之际，曾将这份说明书赠送给了北京的鲁迅博物馆。

1936年，由留日学生刘仑、李桦与木刻青年赖少麒合作编辑出版了《南中国乡土玩具集》，由日本东京的黑白社出版。《南中国乡土玩具集》是以木刻的形式刻制出两广、福建一带的玩具，出版后与日本的黑白社进行交流。

1947年2月，中国旅日华侨在日本神户举办中国木刻版画展，大量展品都是从内山嘉吉那里借来的，留日版画家李平凡主持这一画展。六天之内观众达两万^③人。2月19日至25日，以东京中日文化研究所为中心，华侨新集体版画协会与朝日新闻社合作，在东京银座三越画廊举办“中国木刻展”，作品多是前一年在上海办的“抗战八年木刻展”中的一部分。虽然战后的日本处处呈现着萧条的景象，但是在中国木刻展览会上，还是排起了长队，这次展览扩大了中国木刻的社会影响，引起了日本艺术界的广泛注目。中国木刻展随后在大阪、东京、茨城、京都等地巡回展出，李平凡抱病坚持举办展览，并从展览作品中选出12幅，加上《编序》（李平凡）、《中国木版画运动史略》（陈烟桥）、《鲁迅与中国木刻年表》（李平凡编，高山三郎译）等内容，结为《中国初期木刻集》出版（二百部限定版），作为日本华侨社集体版画协会的一项工作。这几次展览的成功举办，

^① 李光经、马蹄疾编著：《鲁迅木刻活动年谱》，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6年出版，第100页。

^② 李光经、马蹄疾编著：《鲁迅木刻活动年谱》，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6年出版，第100页。

^③ 李平凡著：《版画沧桑 李平凡版画60年回忆录》，北京出版社1997年版，第29页。

促进了中国木刻在日本的传播,加强了中日版画的交流。1947年10月,李平凡应邀出席了“全日本新木刻运动会议”,与日本版画家进行交流。1948年,在中华全国木刻协会理事会的授权下,李平凡负责在日本创办该协会的日本联络站,以促进中日版画的交流,向日本宣传中国的木刻。联络站成立之后,李平凡首要的工作就是在日本举办中国木刻流动展,在国内木刻协会的支持下,搜集到了110幅木刻作品,1949年3月在日本正式展出。到李平凡1950年回国之际,举办木刻复制品的展览次数已达82次,100余幅木刻原作在神户、大阪、冈山、京都、东京、福冈、广岛、九州等十余个城市展出,展览次数达23次。其中最成功的要数在神户的大博览会世界馆举办的展览,据博览会统计,参观世界馆中国现代版画展的人数超过200万次,中国木刻的画片也被数次再版,一时盛况空前。^①联络站的成立,做了许多切实有效地宣传中国木刻的事情,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成为中日版画交流的桥梁。

李平凡等人组织的“在日华侨新集体版画协会”除了积极开展中国木刻展览外,还致力于出版介绍中国木刻的书籍,如《华侨儿童木刻散辑》(1946年)、《中国初期木刻集》(1947年)、《中国现代木刻》(1949年)、《中华人民版画集》(1949年三一书房出版)。^②其中《中国新兴木刻集》是为了纪念新兴木刻导师鲁迅先生而出版的,该画集由罗清桢、陈烟桥、陈铁耕、郑野夫四人的作品组成,代表了中国初期木刻的成果。日本华侨新集体版画协会还出版机关刊物《版画文化》,李平凡担任中文版的主编,佐佐木敬担任日文版主编,周燕丽兼任编辑部的秘书。

《版画文化》每期出3000份,在日本很受欢迎,以至于日本版画家川西英颇有感慨地说:“日本版画史上从未出版过版画的专门报纸,何况又是两种文版。有了《版画文化》报,沟通版画动态,促进版画交流,发表研究成果,对人对事对艺术都有利。”

^① 李平凡著《版画沧桑 李平凡版画60年回忆录》,北京出版社1997年版,第47页。

^② 转引自(日)内山嘉吉,奈良和夫著,韩宗琦译:《鲁迅与木刻》,人民美术出版社1985年版,第154页。

六、留学生与中国音乐的传播

1. 留学生向世界介绍中国音乐理论

近代以来,“中国音乐”不仅是指古代传承下来的音乐,还包括中国人借鉴西方音乐理论创作和改编的,具有中国音乐风格和内涵的音乐作品。而中国传统音乐是指那些具有中华民族风格,采用中国乐器演奏的具有民族风格的音乐作品,其中既包括在历史上产生、世代相传至今的古代作品,也包括当代中国人用这种民族固有形式创作的、具有民族固有形态特征的音乐作品。但近代以降,一些中国人更多的是引进西方的文化,忽略了对中国传统音乐的继承和发扬,同时,由于中外音乐使用的乐器自成体系,采用不同的记谱法,使中外音乐文化的交流受到限制。虽然一些对中国音乐感兴趣的西方人,将中国音乐介绍到国外,扩大了西方人了解中国音乐的途径。尤其是个别中国人在国外向外国人表演中国音乐,进一步加深了外国人对中国音乐的认识,1884年在伦敦举行的希尔兹国际博览会上,有中国艺人演奏中国乐器,演唱中国歌曲。驻外大使曾纪泽在音乐方面也十分擅长,他不仅经常和外国朋友在一起演奏中国的乐器,而且还与西方的学者们共同探讨切磋,这些都成为早期中国音乐在西方传播的有力证据。但这些“证据”传播的范围又是十分有限的,对于大多数西方人来说,还是难以一窥中国音乐的全貌。而中国留学生成为近代音乐交流的一道亮丽的风景,他们凭借自己的专业知识和深厚的文化素养,在宣传中国的音乐方面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其中,王光祈、赵元任、任光等人,成为传播中国传统音乐最具有代表性的留学生。

王光祈是“少年中国学会”的发起者之一,受当时国内勤工俭学思潮的影响,到德国求学。他在德国留学时,德国正沉浸在战败的阴影中,战争的创伤使人们对西方文明产生了怀疑,他们迫切希望寻找一种新的文化来治愈西方文明的创伤,而辜鸿铭对西方文明的尖刻批评以及对中国文化的宣扬,吸引了德国人的注意力。他的书在德国十分流行,形成一股研究“辜鸿铭”的热潮,一些德国教授们甚至将辜鸿铭的书作为哲学课的必读书目,德国人将辜鸿铭看作知音,对来自东方的中国人也有一种特殊的好感,这种好感使得近代以来一直受西方歧视的中国人找回了一点自尊心,民族自豪感日益膨胀,许多留学国外的学子们开始反思中国的传统文化,王光祈恰恰在这种氛围中开始注意到中国文化。为了追求“登昆仑之巅,吹黄钟之律,使中国人固有之音乐血液重新沸腾,吾将使吾日夜梦想

之“少年中国”灿然涌现于吾人之前”^①，王光祈毅然选择学习音乐，向西方人介绍中国的音乐作为他宣传中国文化的支点。

王光祈认为，“要抬高现在中国民族的人格，最好是自己能够创造新文化，以贡献于世界，否则至少亦应将中国古代学术介绍一点到欧洲来，一则使东西文明有携手机会，可以产出第三文明，二则亦可减少欧洲人轻视中国民族的心理”^②。中国文化不仅“要专心从事输入，还须注意输出”。因而，王光祈很重视音乐文化的交流，不仅仅将西方的音乐知识传入中国，而且也将中国的音乐介绍到西方，成为沟通中西音乐文化的一座桥梁。他是第一个在国外研究中国音乐史的留学生，用德语写了许多介绍中国音乐的文章，如他1925年写的《中国的音律体系》，1926年刊于德国《德累斯顿导报》上的《音乐在中国的意义》，1927年刊于德国法兰克福的《（中国学院）科学导报》上的《论中国音乐》，以及1929年刊于《（中国学院）科学导报》上的《论中国记谱法》等文章，从不同的角度，多方面地展示中国的音乐文化。1929年，他还曾为《大英百科全书》和《意大利百科全书》撰写“中国音乐”这一词条。1935年，他写的《中国的道白戏剧和音乐戏剧》一文，发表于德国柏林精神出版社的刊物上。同年，王光祈的另一篇文章《千百年间中国与西方音乐交流》一文，收在了德国波恩发表的《卡莱教授纪念专刊》上，后来，这篇文章由他亲自签名，送给了他的导师席德迈尔教授，该文介绍了几千年来中国和西方音乐交流的历史渊源，阐释了中国音乐和西方音乐的各自特色及相互影响的过程。

他在介绍中国音乐方面最重要的著作当数他的博士论文——《论中国古典戏剧》，这篇论文答辩获得通过后，即“由德国科学、艺术和国民教育部部长亲自批准”，在当年的日内瓦《东方和西方》杂志上发表。后来，这一论文又在1934年由瑞士日内瓦的中国国际出版社出版。在王光祈的博士论文里，他将中国戏曲的发展划分为三个历史阶段，即先古典时期，从1250年至1530年；古典戏曲时期，从1530年至1869年；以及现代戏曲时期，从1860年到王光祈写书的时候。论文共分十二章，第一章介绍了中国戏曲的发展历史，认为中国戏曲最早的记载出现于公元前四世纪的《国语》一书中，而真正意义上的戏曲则出现在十三世纪中叶，这种戏曲有直接的道白形式，用口语写成有固定的套数，每本戏四折，每折中有多种曲调，而且这些曲调又必须为同一宫调，一折戏的全部曲词只能由一名主角演唱，而其他角色只有道白。从这些方面，王光祈将戏曲与散乐区分开来。他认为，戏曲在元代继续发展，结构变得更加自由，不同的角色也有各自的演唱机会，戏曲有南曲和北曲之分，后来南方的昆曲逐渐成为中国戏曲舞台上的主要形式，达三百年之久。昆曲是一种声韵音乐，音乐是建立在唱词的声韵基础之上，

^① 王光祈：《东西乐制之研究》自序，（上海）中华书局1926年版。

^② 王光祈：《旅欧杂感》，《少年中国》第2卷第8期，1921年2月15日。

作曲者按照乐曲的速度和节奏来组织旋律,还承担“各种旋律形式之间的联系,节奏的安排和旋律的装饰”,剧作者负责解决音程和宫调的事宜,为曲词指定相应的宫调来表达唱词的内容。王光祈认为,近代以后才出现了二黄和梆子这两种戏曲形式。(在这一点上,他的看法显然并不准确,或许是由于缺乏材料造成的)同古典的戏曲相比,现代戏曲采用乐器伴奏,其音乐也更为流畅。第二章介绍了戏曲的题材,这些题材多取自于历史、小说和传说。内容多是讴歌伟大的人物、忠烈的事迹等方面。他尤其提到了中国音乐的教化作用,而且其舞蹈艺术的重点也被置于伦理的象征意义之中,如招手表示孝心的意思。第三章介绍曲词。曲词是由一些诗人作曲家创作的,大约有一千种,称之为曲牌。常用的曲牌有五百多种,曲牌也有南曲牌和北曲牌之分,一出戏中可以使用不同的曲牌。第四章介绍了乐律。中国的乐律主要有四种,即笛子上的五度相生律和四度相生律,弦上的纯五度律和纯四度律,笛子的十二平均律和中性三度。第五章介绍了音乐的调和移调,即调式。王光祈用五线谱的方式将这些乐调标记出来,采取统一的形式,打通了中西文化交流中由于语言而产生的隔阂,有利于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便于西方人了解中国音乐。第六章介绍乐谱。中国的乐谱是由汉字组成,如上、尺、工、凡、合等,是中国的乐谱表示方法之一。第七章介绍戏曲的音乐。他将中国戏曲音乐分为三类,即有固定的音程和节拍的;有固定的音程没有固定的节拍又称散板;没有固定的音程有固定的节拍,又称干念,干念这种音乐形式多用于丑角或净角出场之时。第八章介绍乐队。主要是中国戏曲中使用的各种乐器,并附有插图,形象生动,便于理解,同时还介绍了各种乐器的演奏程序。第九章介绍戏曲的舞台、行头和脸谱。脸谱附上图片加以说明,特意强调中国戏曲中脸谱的不同颜色代表不同性格的人物,具有典型的象征意义。第十章介绍了演员的分类及其动作。十一章则从音乐美学的角度来探讨中国音乐的特点。指出中国的伦理观念在音乐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自古以来,中国的音乐即要求尽善尽美,解释了中国戏曲音乐中虽然有明显的节奏和速度的变化,但又缺少和声和力度的原因。十二章列举了《琵琶记》、《一捧雪》、《风筝误》、《长生殿》等例子来说明中国戏曲中的音乐特点。书后还附录了三十本中国著名的古典戏曲剧情介绍,这可以算得上是文学作品了。让西方人在了解中国音乐的同时,也接受了中国的戏曲文学作品。

他将昆曲作为他的研究对象,是由于这一戏剧形式在中国存在时间长,所保留的曲谱也相对较多,有利于研究。虽然论文中有某些观点并不恰当,但是,全文反映了作者留学德国时所受音乐教育的影响,运用比较音乐学的方法,从音乐美学的角度来研究中国的古典音乐。他从更高的角度和视野探索中国音乐与哲学和美学的关系,甚至提出音乐具有社会功能这一命题,他利用近代音乐学的术语

或标记方法来表述中国的古典音乐,这种做法在当时是很有创见的。这就是王光祈论文的独特之处,连他的德国教授对此也深以为是。然而王光祈的英年早逝,使这种专门的音乐交流被中断了,但是,他在中外音乐交流上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当时国内的学人也承认“他在音乐上的贡献是两方面,一方面介绍西洋音乐于中国,如欧洲的音乐进化论……,一方面又努力于国乐史之整理并将中国的古乐介绍于西方”^①。

赵元任不仅是著名的语言学家,而且在音乐方面也十分专业。在美国留学的时候,他参加了法威尔教授指挥的合唱团,并将中国的民歌《湘江浪》谱上和声,转交给法威尔,赵元任主动地表现出了将中国音乐文化介绍给外国人的意向。后来在国外讲学,他或者作有关中国音乐的演讲,或者给外国学生们开设中国音乐方面的课程,如1932年7月,在波士顿的东方学术讨论会上,作《中国音乐的某些方面》的报告。12月9日,在康奈尔大学讲《中国音乐》。1932年,赵元任在康奈尔大学讲中国音乐的时候,提出了自己对中西音乐的看法,即中国音乐与西方音乐的分水岭在于其形式和风格,并非时间先后的差异。1933年,在夏威夷大学讲中国文艺。1938年,赵元任在夏威夷大学地方研究所任教,曾经开过中国音乐史的课程。1939年1月,在芝加哥大学讲授中国哲学和中国文艺,在芝加哥大学艺术学院也开设了中国文艺的课程。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后,赵元任一家除了参加募捐活动外,还积极介绍中国的文化,进行关于中国音乐方面的演讲,并由女儿们现场示范演唱,用最直接的办法让美国人了解中国的音乐文化。

2. 留学生与“中国之音”的表演

留学生传播中国音乐的方式和途径是多种多样的。除了王光祈、赵元任以外,还有许多留学生在海外讲学之际,通过和外国学者、使节之间的交往,请他们听中国音乐,或是亲自表演,很好地宣传了中国音乐。

尤其是中国近代的著名国乐团体——大同乐会——为保存中国传统音乐文化作出了重要贡献。大同乐会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活跃在上海的颇有影响的一个国乐社团,由著名古琴家郑觐文创办,并聘请著名琴师汪昱庭、苏少卿、陈道安、程午加、柳尧章等担任乐会为教师,向会员传授中西音乐的知识和技艺。该会由32人组成的民族乐队,乐会在致力于保留传统音乐文化和仿照西洋管弦乐队模式创办中国的民族管弦乐队方面,成就显著。其中乐会将中国著名的琵琶曲《浔阳夜月》改编成了民族管弦乐《春江花月夜》,成为中国民乐改良的一次

^① 左舜生等著:《王光祈纪念册》,(台北)文海出版社1968年影印版,第74页。

有益的尝试。中国的留学生们也很欣赏这些传统音乐，他们多次在各种涉外招待场合邀请“大同乐会”表演中国传统音乐，利用这一机会，将中国的古典音乐展示在西方人面前，使西方人得以重新审视中国的音乐文化。1930年10月，世界社中法大学在福开森路欢迎来华的比利时司法大臣樊迪文，蔡元培、胡若愚、王晓籁等人作陪，比利时驻华公使也应邀出席。大同乐会应邀演奏“国民大乐”来助兴，优美的旋律，引得在座的比利时客人不由自主的击节赞赏。1932年，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罗格访华考察教育之际，蔡元培、高鲁、王景歧等人宴请他的时候，也请大同乐会前来演奏古乐。法国驻华公使韦尔登回国述职之际，中法联谊会假座法国总商会欢送，会上不可缺少的节目之一就是由大同乐会演奏古乐，向外国客人展示中国古乐的风采。在欢迎国际劳工局长莫列德的宴会上，刘湛恩、褚民谊、林语堂、李登辉、蔡元培、法国公使、荷兰公使等100余人出席，大同乐会演奏古乐助兴仍是宴会上的看点。在李石曾宴请法国驻华大使那其亚的时候，大同乐会仍是留学生在款待外国人的“秘密武器”。邀请外国人欣赏中国的古典音乐的行为，表现了留学生对中国古典音乐的认同。

另外，在海外的留学生也充分利用一切机会向外国人展示中国的音乐文化。1920年“双十节”的时候，留法勤工俭学的学生和留法华工们一起举办各种形式的纪念活动，庆祝节日，他们或是演唱国歌，或是组队游行，游行队伍十分壮观。有十个人组成的高跷队，装扮成各种花脸，走在游行队伍的前面。在花车队伍上，有由二弦、三弦和笛子合奏的中国音乐表演，勤工俭学的学生们组成了一队，手执国旗。还有中国传统的舞龙表演，主要由华工担任，他们一边游行，一边表演“渔翁戏蚌”的故事，引得法国男女老少争相驻足观看，甚至很多人还一路追随队伍看热闹。在法国的圣丰、克鲁邹、木兰、孔福朗等地，留学生们通过表演各种文艺节目来欢庆国庆，许多中国传统节目纷纷登场，让外国人一次大饱眼福，是一次传播中国文化的最佳良机。1920年，在法国枫丹白露举办的游艺会上，留学生范濂等人表演器乐节目，潘鼎新、徐炳元“以中国乐器奏梅花三弄”，“徐炳元君之古乐独奏，如琵琶、箫、笛、胡琴、月琴、洋琴等，皆一人依次吹弹。还有人在一旁说明乐器的来历、构造及曲调的用意”^①，让法国人对中国音乐多了一些了解，以至于“称誉之声，四座不绝”。曹强、吕其昌二人表演的法语双簧，“法人士之掌声，已如春雷之动”^②，留法女学生向警予、蔡畅、范新顺、范新琼、李白新、熊淑彬、熊季夫、萧敏、舒之锐等人，她们自己排演的中国舞蹈“春铎”，“按合节奏，轻歌曼舞”，深为法国人赞赏。

在国外为中国抗日积极奔走宣传的陶行知，多才多艺，在旧金山等地作抗日

^① 《时事新报》，1920年5月19日。

^② 清华大学中共党史教研组编：《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史料》，第二册（上），北京出版社1980年版，第240页。

宣传时，他和来自清华大学的陆瑾一起演唱《义勇军进行曲》和《锄头舞歌》，让那些对中国抗日表示同情的美国人听到振奋人心的中国歌曲，展现的是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在加拿大贾纳城中国俱乐部的时候，教学生们演唱中国歌曲《凤阳花鼓》、《苏武牧羊》、《小白菜》、《真神赞》以及《大哉孔子》等。在美国的赵元任一家十分活跃，1943年，在美国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中一些爱好唱歌的中国人组织了一个“蛤蟆歌咏团”（将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简称为哈麻，被大家风趣的称为“蛤蟆”，这个歌咏团的名字由此而来），经常演唱中国歌曲，赵如兰担任合唱团的指挥。至今波士顿地区还保留着中国人组织的合唱团，在赵元任百年诞辰时，在赵如兰的指挥下，演唱了赵元任的二十多首歌曲。中国留学生在外国因兴趣而组织的合唱团，将中国音乐介绍给外国人，对中国音乐的传播做出了贡献。而留学美国的科学家钱学森，建立新家之后，许多在美国的朋友纷纷前来祝贺，在为朋友们举办的家庭“派对”上，钱学森的夫人蒋英（著名女高音歌唱家）应朋友之约，为大家演唱了家乡的苏杭小调，“甜美的歌声，把客人带进了小桥流水的人间天堂”，歌唱家优美的歌声，赢得了客人们热烈的掌声。留学日本的田汉，交际广泛，朋友众多，他的一些朋友在上海举办的一次“文艺消寒会”上，热情邀请一些日本友人谷崎润一郎、塚本助太郎以及菅原氏参加，聚会时有许多文艺表演。参加“文艺消寒会”聚会的名人更是济济一堂，有郭沫若、欧阳予倩、欧阳的夫人刘韵秋、诗人王独清、画家陈抱一、小提琴家关良、电影导演任矜萍，女演员张织云、飞行家唐震球，剑术大师米剑华以及一些女眷，出席宴会的很多人都有过留学的经历。屋子中有人表演胡琴，伴着胡琴的乐调唱歌，唐越石唱起了歌曲，谷崎润一郎以外行的眼光觉得“听起来是很优美的，声调的抑扬顿挫也是很巧妙的”^①。一曲之后，田汉也主动唱了一首小调。还有大同乐会会长郑觐文表演的琴艺，北京艺人张少崖在三弦琴伴奏下为大家演唱通俗小曲，然后是金小香的大鼓，这种表演是一边唱一边挥动鼓槌做各种姿势。整个晚会的气氛是热烈、真诚的，日本人也尽兴而归。

著名音乐家任光，是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中的一员。抗日战争时期，他再度前往法国学习音乐的时候，将巴黎的华侨组织起来，成立了“巴黎华侨歌唱团”，教他们演唱抗日歌曲，利用音乐宣传中国的抗战，多次举办演出，为祖国的难民募捐。任光还在由42个国家代表参加的反法西斯侵略大会上，指挥华侨高唱《义勇军进行曲》。随后他又前往新加坡辅导那里的“铜锣合唱团”，推动南洋华侨的爱国歌咏运动。而留美学生刘良模在美国组织了“华侨青年歌唱队”，他们不仅演唱中国歌曲，还和“美国黑人歌唱家保尔·罗伯逊合作录制了一张名为‘起来’的唱片，包括六首抗战歌曲和中国民歌”^②，罗伯逊甚至分别用中英文演唱了《义

^① 刘平，小谷一郎编，伊藤虎丸监修：《田汉在日本》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56页。

^② 梁贸春著：《音乐史话》，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74页。

勇军进行曲》。以至于二战即将结束的时候，美国国务院更是将中国的《义勇军进行曲》和德国贝多芬的《欢乐颂》、法国的《马赛曲》等歌曲，作为向全世界广播的庆祝胜利的节目之一。可见，用音乐作为宣传抗日的手段，起到了一举两得的效果，既让外国人欣赏到中国的音乐，也争取了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的支持。

中国的音乐在海外传播是无处不在的。在和友人的交往中，在出席各种朋友聚会中，大家都会情不自禁表演一些文艺节目来助兴，或是邀请一些文艺团体来表演。中国古典音乐的高雅，现代音乐中显示出来的浓郁的民族风格，都深深吸引了外国人。受到材料的限制，留学生在国外传播中国音乐的状况，难以一窥全貌，但是，展现在我们眼前的事实，已经说明了留学生们为传播中国音乐所做的努力和成就，他们将中国的音乐文化展现在世界面前，使中国的音乐融入到世界艺术的舞台之中。

七、留学生与中国其他文化的传播

1. 留学生与中国饮食文化的传播

中国传统文化因历史的久远成就了博大与精深、丰富而多彩，除文学、绘画、音乐、戏剧等精神文化被留学生介绍到西方外，中国菜谱、丝绸刺绣文化、瓷器等物质文化，也被留学生介绍到国外，扩大了中国文化在海外的影响，尤其是让外国人更直接的体会到了中国文化的魅力，加深了对中国文化的认同感，部分地改变了近代以来外国人对中国文化的误解，对中国文化的内涵做了完美的诠释。

(1) 杨步伟的《中国菜谱》

说到中国菜，外国人自然会想到唐人街的中国菜馆，但是，开办菜馆的中国人却难以将中国菜的名称准确翻译出来，以至于说到中国菜，外国人即以杂碎统称之，对于一个泱泱文明古国来说，素来以饮食文化著称的国度，“杂碎”二字不足以尽显中华美食的特色。另一方面，赵元任一家移居美国的时候，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食品开始实行供应制，很多美国人对一些本可以“吃的食物”，因为不知道如何制作而白白扔掉，当时在美国的杨步伟（曾经留学日本，赵元任的夫人）看到这一现象，深为可惜，很想改变他们这种浪费东西的习惯，她的朋友们建议她可以写一本菜谱，来介绍这些食物的做法，赵元任的师母霍金夫人也很支持她的想法，杨步伟写菜谱的想法还得到了赛珍珠夫妇的认可和支支持，他们的出版社负责出版这本书，胡适和林语堂都答应为之作序，这样，写作的条件成熟了。

开始动手写作的时候，杨步伟面对的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使菜谱中的每道菜精确化。中国人做菜多依靠品尝和个人喜好决定佐料的多少，但是，教外国人做中国菜，这种办法显然行不通。因此，杨步伟的菜谱边实践边写，并将做菜所需各种材料都用量器称好，详细标明重量，力求精确。这样下来，一道菜往往需要试验两三次才能最后定下来，许多中国留学生十分支持她的这一举动，他们有的人来帮忙洗菜、切菜，有的人主动充当杨步伟试验的品尝者，留学生梁治明为她写菜单名字上的中国字，杨步伟的女儿赵新那帮助她把菜谱翻译成英文。全书写好后，清华大学的外文教授陈福田审阅了初稿，最后，赵元任又亲自审了一遍稿子，甚至重心大发，写了一道菜：如何炒鸡蛋。

1945年，这本名为《How to Cook and Eat in China》的菜谱在美国刚刚出版，立刻引起了轰动效应，十几家也报纸纷纷登出书评，好评如潮。波士顿的

赈济中国联合会预定了 500 本,在售书现场,每本书都由杨步伟用毛笔亲笔签名,很快就签了 300 多本。这本菜谱又被翻译成各种文字,畅销世界各地,以至于美国的电视台也找上门来,要求杨步伟能够来个现身说法,亲自为美国观众示范如何做中国菜。这不仅仅是一本菜谱,书中还有关于中国各处风俗的介绍,所以,这本菜谱不仅向外国人宣传了中国的饮食文化,而且还让外国人从中了解了中国的风俗,可谓一举两得,有利于中国文化的传播。“一直到现在还风行各地,已出到第十二次版”^①,即使中国学者的书,在美国也未必能达到这种程度。虽然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是不能以数量来衡量它的影响力,但是,这本菜谱如此受欢迎,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据:要让世界了解中国文化,需要大家的共同努力,而且要扩大宣传的范围,不仅仅停留在精神文化方面,物质文化能够更直接的让西方人体体会到中华文化的魅力。

(2) 向外国人介绍中国菜

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发起者李石曾,不仅是著名的教育家,还是中国饮食文化的积极传播者。他在法国留学的时候,就对中国的大豆做过研究,“用法文编著的《大豆》一书,轰动一时,引起了西人对豆制品的兴趣”^②。在法国求学期间,李石曾发现巴黎的牛奶供不应求,而中国的豆浆中也含有丰富的营养,因此,他和同乡好友齐竺山在法国巴黎创办了“豆腐公司”,这一公司主要生产各种豆制品,如豆腐、豆浆、豆面、豆粉以及用豆面制成的各种点心,早期留法勤工俭学的学生,很多人都在豆腐公司做过工。虽然巴黎豆腐公司被时人认为是“我国在法事业之最大者”^③,但是,由于中国的豆腐“清淡无味”,豆浆又含有过多脂肪,油味过重,这些中国食品并不被法国人所认可,豆腐公司的产品在法国一时难以打开销路。于是,为了让当地人领略“无味道的豆腐”的真味,1914 年,李石曾在巴黎蒙帕纳斯大街开设了法国第一家中国餐馆,名为“中华饭店”^④。

“中华饭店”除了提供中国传统菜肴外,主要致力于推出豆腐系列佳肴:豆腐煲、麻婆豆腐、生拌豆腐菜等等,借此将中国的豆腐食品介绍给法国百姓。^⑤尤其是经过一批法国知名汉学家的宣传介绍,法国一些政界人士和文艺界人士经常光顾“中华饭店”,扩大了“中华饭店”在法国人中的影响,也使更多的外国人了解了中国饮食。留学生在外国经营商业的很少,李石曾算是成功的例子,他不仅把中国的豆制品介绍到法国,也将中国的饮食文化传播到了法国。

^① 杨步伟著:《杂记赵家》,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346 页。

^② 高远:《留学百年:中国赴法留学第一人李石曾》,来自中国新闻网华人世界, <http://www.chinanews.com.cn/2002-11-11/26/242362.html>。

^③ 清华大学中共党史教研组编:《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史料》(1),北京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221 页。

^④ 高远:《留学百年:中国赴法留学第一人李石曾》,来自中国新闻网华人世界, <http://www.chinanews.com.cn/2002-11-11/26/242362.html>。

^⑤ (法)叶星球:《中国豆腐在法国》,转引自《人民日报(海外版)》,2001 年 9 月 19 日。

除了菜谱，更多的时候杨步伟通过亲自做中国菜，让外国人了解中国菜。由于菜谱杨步伟一举成名，当时在中国联合会搞赈济活动的美国太太们，趁机建议每星期举办一次中国餐活动，所得收入也用来赈灾，而作为会员、又是中国人的杨步伟，理所当然成了这件任务的最佳人选。于是，每星期杨步伟都要承担做中国餐的任务，这项活动不仅让美国人品尝到了中国菜的美味，而且所得利润均作为赈灾费用，支援了中国的抗战，因此，这项工作十分辛苦，每星期的午餐都要作一百八十人左右的份数，但是杨步伟却乐此不疲。当他们家在德国旅行的时候，他们认识的朋友中有人虽然有这本菜谱，但还是想让杨步伟能够亲自示范。应友人之请，她不仅做了一顿中国菜，还为他们详细讲解菜的做法，让外国人亲眼目睹了中国菜的制作方法。有时候中国菜做起来也是很简易的，身在德国女牢的胡兰畦，就有机会表演了一回中国菜的做法。她利用一些简单的原料，在女牢中给狱友们做了一道中国菜，其实不过是凉拌萝卜丝。但是，她将这些食物分给狱友的时候，还是受到了大家的一致赞扬。鲁迅与内山完造的交往，已经到了亲如一家的境界了，鲁迅母亲寄来的一些食物，如酱鸭、卤爪等，鲁迅除了分给自己的弟弟外，还会分一份给内山完造家。双方之间相互往来十分频繁，这种交往，增进了鲁迅与内山家的友谊。此外，留学生们通过邀请外国友人品尝中国菜，来宣传中国的饮食文化，让外国人亲身体会到了中国美食。1923年，蔡元培在北京饭馆宴请法国人欧乐教授吃中国菜，由汪及一和一位广东同学担任翻译，欧乐对于中国使用的餐具：筷子和勺子很感兴趣。蔡元培还曾在家中以中国传统食品——水饺，款待法国友人穆岱夫妇。1932年，法国著名汉学家伯希和访问北平，北平的学术名人胡适、陈寅恪、柯劭忞、陈垣等人宴请其品尝谭家菜。谭家菜是中国最著名的官府菜之一，由清末官僚谭宗浚的家人研创，谭家菜并不对外营业，只供亲朋好友互相宴请，当谭家后人加入了由陈垣等人创办的思辨社后，该社社员聚会场所经常在谭宅的聊园。这次伯希和访华，胡适、陈寅恪等诸位学人假借聊园，以蜚声北平的谭家菜宴请这位著名汉学家。上菜的时候，还有专人介绍菜的名称、做法以及特点，酒席结束后，还为客人提供香茶。这次应中国学者之邀，伯希和得以大饱口福，在亲自领略中华美食的同时，加深了对中国饮食文化的认识。^①萧乾在国外宴请英国著名作家福斯特去中国餐馆吃了一顿很平常的中国饭，但是，福斯特却感慨颇深：“太好吃了，打从自东方归来，我还没这么贪吃过。”^②而身在美国的老舍，在临回国的时候，曾经宴请日本友人石垣绫子吃自己亲手做的中国菜，老舍亲自下厨，将从唐人街买来的鸭子、叉烧、中国蔬菜、豆腐等，做了一顿美味的佳肴，着实让客人饱餐一顿。无论是亲自做中国菜，还是赠送中国食物，亦或是宴请外国友人，都是直接传播中国饮食文化的过程。即使是一些

^① 《胡适往来书信选》（下），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509页。

^② 萧乾著：《未带地图的旅人 萧乾回忆录》，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1年出版，第170页。

简简单单的中国食物，它传递的却是中国饮食文化的信息，使外国人亲身领略了中国饮食的美味之后，对中国的饮食文化都会留下难忘的印象，在不知不觉中，中国留学生们将中国的饮食文化传播出去。

除了让外国人亲自尝试中国菜以外，留学生还利用文学作品，对中国的饮食文化进行了惟妙惟肖的描述，以此向外国人介绍了中国的饮食。在林语堂的《京华烟云》中，他描写的女主角姚木兰是个善长制作饮食的主妇，“她用酒泡枣，用蜜枣和火腿调制食品，用新法做酱油味道很厚的碎鳗鱼，做八宝饭，做焖鸡榨菜蒸笋，甲鱼汤烧鹅掌，鲍鱼煮后切片做冷食，还有蜜饯熏鱼，醉蟹，醉蛤蜊”^①。在书中，林语堂还详细描绘了“叫化鸡”的制作方法，把一个整鸡拿出去野餐，将鸡的内脏拿掉，保留羽毛，用泥在鸡上涂满一层，在火上烤，二三十分钟之后，视火的强弱和鸡的大小来决定，然后拿出来，羽毛会和泥片一齐掉下来，里面便是热气腾腾的鸡。鲜而嫩，汁液毫无损失。这时就可以把鸡翅膀，鸡腿，鸡胸撕开，蘸着酱油吃。^②林语堂评价这种吃鸡的方法时，称其味道“为生平吃过的别种的鸡所不及”，令人久久回味。看到林语堂的描述，恐怕外国人会情不自禁的动手制作“叫化鸡”来验证真假了。

中国的节日多，不同的节日有不同的庆祝方式，同时还有各种很有特色的食物，这也是大家乐于过节的缘故了。在很多留学生的作品中，对中国的各种节日都有描述，尤其是不同的节日可以吃到不同的食物，如：

(1) 端午节。中国人过节讲究的无非是一个吃字，端午节一定要吃粽子。在《京华烟云》中，曾家的“祖母从家里带来了些山东式的粽子。里面的馅是火腿，猪肉，黑糖，豆沙”^③，粽子被包成三角形或斧头形。而在老舍的《四世同堂》中，特意提到了北平正统的粽子，这种粽子在旧式满汉饽饽店铺中出售，没有馅，只是用糯米包成很小的粽子，吃的时候撒上一点白糖。这种粽子的特点就是美观，小巧。

(2) 中秋节。中秋节是一年中比较重要的大节，吃蟹赏菊是中国的老风俗。因此，这个节日的时候，螃蟹正肥，“姚先生买了两大篓子最好的螃蟹，每人面前一小盘姜醋酱油调好的佐料儿，这种热性的佐料正好和螃蟹的寒性儿互相抵消”^④。大家都落座之后，端上来一个大盘子，里面装着肥硕的螃蟹，然后自己动手吃的时候大家自给自足，吃完之后用野菊叶子泡的水洗手，全桌子都收拾得干干净净，摆上了素淡的白米稀粥，咸蛋，腌咸菜。

(3) 腊八节。过这个节时，人们会做腊八粥吃。腊八粥是“用黄粘米，白

^① 林语堂原著，张振玉译：《林语堂名著全集 第一卷 京华烟云》，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378 页。

^② 《林语堂名著全集 第一卷 京华烟云》，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378—379 页。

^③ 见《林语堂名著全集 第一卷 京华烟云》，第 285 页。

^④ 见《林语堂名著全集 第一卷 京华烟云》，第 286 页。

江米，红小枣儿，小红豆，栗子，杏仁儿，花生，榛子仁儿，松子儿，瓜子儿，跟红糖或白糖一起熬”^①，吃的时候根据个人喜好加糖。

2. 留学生与中国武术的传播

(1) 中国拳术的翻译

武术是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历史演进过程中不断创造、逐渐形成的一个运动项目，和京剧一样，也是中国的“国粹”。中国武术的历史源远流长，门派众多，而且，由于中国拳术“动作复杂，且用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拳术术语描述中国拳又及其困难”^②，因而“将中国拳译成外文在其历史上还是初试”，而擅长体育的马约翰，成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马约翰早年留学美国，1925年—1926年再度赴美国深春田学院深造的时候，他撰写了《中国拳术初探》一文，作为体育课的教材。该教材共由八章组成，第一章介绍中国武术的历史，发展过程以及其在现代文明中的地位；第二章介绍了中国武术的两大流派——南式和北式；第三章讲拳术的分类，包括形意拳、八卦拳、太极拳、弹腿拳和少林拳五种拳术；第四章着重介绍形意拳的五个基本动作和十二套合并动作；后几章主要介绍了武术的位置与技巧、练习原则、基本动作和正规的对练图示，图文并茂，有助于外国人正确学习中国武术，是中国武术第一次被翻译成外文，介绍给西方人。

(2) 表演中国武术

让外国人了解中国的武术，最简单最直接的办法就是采取“现身说法”，让他们亲眼看到中国武术是如何表演的。1920年3月10日，中国留法学生们组织的游艺会，其中就有武术部，蔡伯鸿担任总指导，曾在国内担任上海武术会总指导的梁砥中任副指导，每天下午都认真排练。3月中旬，法国国家剧院邀请这些中国留学生登台表演武术，一共六十人参加，分为两组，单打队和双打队，均由蔡伯鸿指挥。前往观看的有法国高级军官、国会议员、以及各著名学校校长、教员等，这一表演队经常被法国公私各校邀请前去演出，“几于日不暇给”。3月21日，在巴黎的枫丹白露，中国留学生们举办了一次游艺会，这次表演的节目丰富多彩，其中就有中国的武术表演。如古国铤、蔡雄、张凤等三十余人表演的徒手搏斗，蔡爵雄、梁砥中等人表演的“器械技击，所弄之枪、刀、宝剑皆异常精熟可观”。^③4月，他们又在法国的国家戏院表演武术，当蔡伯鸿表演“双鞭缠腰”和“枪与指挥刀对拆”时（蔡伯鸿执刀，苏天畴执枪），台下气氛十分热烈，掌声

^① 见《林语堂名著全集 第一卷 京华烟云》，第285页。

^② 鲁牧编：《体育界的一面旗帜：马约翰教授》，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52页。

^③ 张允侯，殷述叙，李峻臣等编：《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82页。

如潮，“有掷念花者，有赠金牌者，有登台与握手者”^①。回到学校后的蔡伯鸿，甚至受到校长夫妇和全校师生的列队欢迎，巴黎的各大报纸更是不惜笔墨，著文盛赞蔡伯鸿的表演。这不仅意味着蔡伯鸿个人的荣誉，更为中国留学生这个群体增光添色。

让世界更多的人认识中国传统武术，是在1936年德国柏林召开的第十一届奥运会上。王正廷（留学日本、美国）担任中国体育代表团的总领队，在派出的140余人的队伍中，其中11人是武术表演队的成员，他们是来自中央国术馆的成员（中央国术馆是在李烈钧、钮永建、蔡元培、于右任等留学生的协助下创建于南京）。王正廷不仅是政界的风云人物，同时对体育运动也十分关心，1912年发起组织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任名誉会长。1922年担任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终身委员。在他的积极推动下，中国曾参加了第十一届和第十四届奥运会，他率领的中国体育代表团参加第十一届奥运会的时候，在中央国术馆馆长张之江的提议下，时任代表团团长的王正廷决定选拔一支武术队出国表演。1936年7月底，中国武术队在汉堡市街头和汉堡大戏院举行了两场表演，受到当地民众的热烈欢迎。武术队的表演有太极操（团体）、傅淑云的达摩剑、傅淑云与刘玉华的徒手对拳等节目。在大会开幕式前，中国体育队绕柏林市区行走时，边走边表演，在柏林街头引起了轰动。尤其是进入体育场后，傅淑云的昆吾剑和绵拳，不仅赢得了观众的掌声，也引起了当时的德国元首希特勒的注意，希特勒亲自指示大会的摄影团将中国武术队的表演摄制下来，永久收藏。中国武术队精彩的表演，给各国的运动员和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会后，中国武术表演队的成员们又在柏林、汉堡、法兰克福、慕尼黑等地举行多场表演，受到德国人的热烈称赞。虽然中国体育代表团在体育项目上未能取得什么成绩，但是，武术队的表演，令西方人大开眼界，尤其是双人对练，深受欢迎，从而达到了向世界宣传中国武术的目的。^②这是中国武术与世界体坛的第一次亲密接触，向世界体坛展示了中国武术的风采。

留学德国的胡兰畦，在二战期间被德国法西斯关入监狱，在牢里枯燥和艰苦的生活，使她想到可以利用中国功夫来锻炼身体，她不仅自己做，还教狱友们一起练，在教她们中国的“易筋经”和“八段锦”时，大家发现了中国功夫和德国功夫的不同，中国功夫以柔克刚，做起来十分的舒缓，“大有飘然欲仙的姿态”^③。很快，这一运动不仅赢得了狱警的认可，而且也迅速在女牢的号子中传播开来，“从一间号子发出一种跃跳的声响，这声响传播到别的号子时，比无线电扩音器上体操教练的口令还有效力。转瞬之间，在第五六两层楼上，就发出了同样的声

^① 张允侯，殷述叙，李峻臣等编：《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83页。

^② 孙葆丽：《五环旗下 从睡梦中觉醒的巨人》，来自 <http://sports.people.com.cn/GB/21939/2704768.html>

^③ 胡兰畦：《在德国的女牢中》，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13页。

音，大家都操练起来了”^①。中国功夫竟然是在这种情况下被外国人认识和了解，尴尬中透着一丝苦趣。

3. 留学生与中国风俗习惯的传播

(1) 介绍中国节日风俗

盛成的《我的母亲》一书在国际上反响很大，而这本书中介绍了大量中国的节日和习俗，更是随着该书的流传，让世界上更多的人了解了中国的风俗习惯。中国人过新年是十分热闹的。在盛成的故乡仪征，家家户户通过放爆竹的形式来表达人们新年时的喜悦，小孩子们从头到脚都是新的，初一在家里给财神上香、磕头，然后跑向东方，取“紫气东来”之意。回来后要“接天地、祭家堂、拜祖宗影像、磕菩萨与孔子头”^②，供品或者是猪头三牲，盛成家不杀生，供的是一块年糕和一个桌盒，桌盒里面有桂圆、柿饼、云片糕、瓜子、冻糖、蜜枣等等物品。过年最重要的是拜神，“拜灶神、拜井神、拜土地老爷”，还要给家里的长辈、亲属拜年问好。然后陆续到亲友家拜年，谓之出行，这种出行也十分讲究，先到赵姓家去发兆，柴姓家去发财，到何府意味着和和气气，这些规矩代表着祝福的涵义：早早娶妻生子，早添儿孙，升官发财，平平安安，事事如意等等。出去拜年的孩子会得到“答好钱”，晚上要回家和家人吃团圆饭，到了初五财神日，家家户户祭财神，店铺尤为积极。在“五马日”绅士们“宴客请春卮，铺家请财神会”。新妇归宁，晚必回家，俗为正月不空房。从此以后，几乎每个月都有节日，如下：^③

节日名称	风俗	节日名称	风俗
正月初一	给财神上香、磕头，跑向东方，取“紫气东来”之意。接天地、祭家堂、拜祖宗影像、磕菩萨与孔子头，拜各种神灵，给家人问好，晚上吃团圆饭，	正月初五（财神日）	家家户户祭财神，绅士们“宴客请春卮，铺家请财神会”。新妇归宁，晚必回家，
正月十三	上灯	正月十五	正灯，吃元宵

^① 胡兰畦：《在德国的女牢中》，第115页。

^② 盛成著《我的母亲》，安徽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77页。

^③ 参见盛成著：《我的母亲》，第77—87页。

正月十八	落灯，吃面	正月十九	拜祖宗造像，洗除挂乐 ^①
二月初二（土地诞辰）	公祭土地，在土地爷前张灯，将灯送给不孕的妇女，有孕后还灯，以一偿十。	二月初三（文昌帝君的诞辰）	读书人都到梓潼墩（墩即是宋朝真州东园的扶云亭）上去拈香。
二月十二日（百花的生日）	闺中妇女，都裁红，挂于百树枝头	三月三上巳节	门上插荠菜花，举行修禊仪式
三月十五（城隍的诞辰）	县衙书役们将神抬出来供于围屏之外，桌案上摆有古玩鲜花等贡品	三月二十四（祈年大会）	举行盛大而又隆重的仪式
五月初五（端午节）	楹上贴神符，中堂挂判官，门上插菖蒲和艾”，儿童背老虎头，戴老虎兜，手腕系五彩绳。吃火腿粽子，。午时要烧午香，燃苍术，点蚊烟，进蒲酒，烤黄鱼，午后到江边看龙船表演。	五月	十三 关公诞生 十五 送瘟神
七月初七（又称七夕）	传说天上有鹊桥会，民间吃巧果儿。	七月十五	盂兰盆会，和尚念经超度鬼魂
八月初	秋祭，祭丁	八月十五（中秋节）	拜月，摘瓜回去叫摸秋，
九月初九（重阳节）	登高，饮酒	清明（寒食节）	扫墓
立春	迎春会，扎春牛，塑芒神，		

在这些节日里，最隆重的要算是祈年大会了，盛成重点描绘了这个有二百年历史的盛会：

“地保出土地神，前导，烧醋于盆中，加上辛味的药材，抬在神前走，说是打扫街道。玄坛神第二，这是钱庄的守护神，神前牌锣伞扇，执事极多。其后曰爷，如潘爷、姜爷、李爷、马爷，都是城隍神前的左右太尉，犹如仪征县的县丞

^① 挂乐是指被雕空的红纸，中间有金字，新年的时候挂在堂前招福。

及捕衙。这四位爷们，都是县城捕衙里的书役们保护者，会是由他们出的。再后为帅，有都天驾前秦、牛、高、卜四帅。高帅灵能送子，故称送子高元帅，……再后为东岳驾前朱、杨二帅，米行业出杨帅，杀猪的敬朱帅，据说朱帅是南斗，面貌赤厉主生，杨帅为北斗，面白貌美主死。还有船帮敬平浪王杨泗将军，鲜花辇轿，非常美丽，仪仗亭炉，特别的多，这帮都是从十二圩来的。再后为痧神、痘神，有小孩装戏，立人肩上，名曰站肩，花团锦簇，连肩而来。没有种过痘或发过天花的孩子们，痧痘神来时须回避。最后为三大府，灵侯城隍，英济王旻天大帝都天，齐天大帝东岳。东岳完全用黄的，黄伞黄轿，俨然是神中之帝王。腰锣前导钹、钹、钹……！花会来了，过繖有纱繖、缎繖、紬繖、呢繖，这都是圆繖；还有玻璃伞、琉璃伞、画片料丝伞，这都是六角伞，听说从前还有珠兰鲜花三伞，现在已不是从前的仪仗了。每一对仪仗，夹着一队金瓜钺斧，间之以亭一座，雕花版镂栏杆的檀香亭子，热香或置鼎其中，八人抬之。最妙还是花担子，我儿时最羡慕挑花担子的小朋友。花担不一样，或花卉，或玩器，各极其妙。挑担的小朋友，只用右肩承着，左手三指插腰，右首轻摇纸扇，头蟠三股大辫，身着小绀青衣，峭步而行，自鸣其俊逸，花担到处，我们放爆竹一挂，他就站着，肩挑花担跳舞起来，转了三匝，然后再行。又有花棚锣鼓，夹杂其间，也有笙箫管笛，细吹细打。又有十四五岁童子骑马背神救印者。神前亦有军牢夜役家丁拜香种种人物或手执高香或提铲，舆夫抬轿，轿后有数十勇字灯。还有拥大纛旗者，一大汉，骑高马上，身出檐端，纛上有神之徽号，一见即知某神到了，三大府前有銮驾，有节旄，有太监，有校尉，有皇帝所有的仪仗。”^①

在仪仗，端午节也是一个让人重视的节日。将近端午节的时候，会有僧道送符尼姑送芥菜萝卜干或佛豆，获得这些赠送的人家要回米一升。同时，人们“削艾为人，剥茧为虎，各肖生物，配之襟上”，成为端午节的一道风景。这时会有龙舟会，如果有游人攒鸭，龙船都争先来抢鸭子，如果游客扔猪肘，在龙头附近的人争着抢标，龙尾有小孩耍吊梢，双丫髻红衫绿裤站在短木上，来一个童子拜观音的姿势。到了端午节，“家中楹上贴神符，中堂挂判官，门上插菖蒲和艾”，儿童背老虎头，戴老虎兜手腕系五彩绳。人们包火腿粽子，有三角形或斧头形。午时要烧午香，燃苍术，点蚊烟，进蒲酒，烤黄鱼，家家赏午庆节。午后到江边看龙船。而林语堂所感受到的端午节，是“按老规矩在房里点艾草驱邪避虫，孩子们在胸前要戴五彩丝绸的小包，叫‘方胜儿’，里面装着香料以防夏天的疾病”。

五月十三的关公诞也是很重要的。十五的时候送瘟神，将那些菩萨从庙里抬出来，“送瘟神的大会，每神座前都有一个送瘟的亭子，抬着走。家家户户，将艾虎和垃圾全丢进亭子里去”，瘟疫从此就跟神走了。这还被称为跑会，人们抬

^① 盛成著：《我的母亲》，第79—80页。

着神拼命地跑，跑到江边一座龙王庙前，然后诸神传令。令一位尊神押解瘟气过江，这面江北送瘟，那面江南迎瘟，江南要是迎不到，就有瘟疫。八月初祭丁，举行秋祭。祭丁是一个很庄严的事情。在秋祭前七天，学宫里的董事提前买好供品：黄牛一匹，柔毛一群（由于羊肥了，毛就细而柔，称之为柔毛）、刚鬣一群（猪肥了鬃就会直而刚，因而称之为刚鬣）、都要雄性，又要博硕肥腯。买回来之后还要精心饲养，在丁祭前一日，屠夫在所宰牲所的西面，预先凿下一个坎，并摆下香案，学校的教谕担任视割牲官，他穿着朝服，旁边司仪的引赞生主持礼仪，屠夫先宰牛，然后是羊和猪，这些动物的血埋在宰牲所西面的坎里。然后用各种器皿将牲品装起来，供在案子上：

“孔子面前，设一条长案。陈列牛、羊、猪各一头。登一个，内装太羹。斲二个，内实和羹。太羹是不知道酸、甜、苦、辣、咸的肉汤；和羹，是加了盐、梅、姜、醋、糖的浑汤。簠二个，内放黍、稷。簋二个，内盛稻、粱。”孔子位前，除了五谷三牲，还有各种小吃，筵（古代祭祀和宴会时盛果品等的竹器）十个：“形盐一筵，将盐做成一只老虎。稿鱼一筵，拿草缚成鱼形。枣一筵，栗一筵，榛一筵，菱一筵，芡实一筵，鹿脯一筵，白饼一筵，黑饼一边。豆（宴会和祭祀时盛放食物的器皿，木制）十个，韭菹（咸韭菜）一豆，醯醢（醋肉酱）一豆，菁菹一豆，鹿醢一豆，芹菹一豆，兔醢一豆，笋菹一豆，鱼醢一豆，脾析一豆，豚拍一豆。好像是一荤一素，一零一整。”^①钹一个，用来装酒，铎两个，装熟菜，都摆在孔子的面前。至于东西四配：颜子、曾子、子思、孟子面前，也有祭品。祭品数量大大下降，没有牛肉，没有原汤，没有白饼、黑饼、肚杂、豚脯。而东西十哲祭品更少，许多人分一只羊、一只猪、一斲和羹、一簠小米、一簋高粱。只有四筵：形盐、枣、栗、鹿脯。四豆：菁菹、鹿醢、芹菹、兔醢。随着地位的降低，所享受的祭品就越少。

准备好祭品，就要举行祭祀仪式，上香跪拜，行九叩之礼，行出献礼，读祝文，再行亚献礼，举三献乐，行九叩首礼。然后将所有的祭品撤下去，送神，再行礼，奏乐。这样祭丁活动才算完成。

（2）婚礼仪式的描绘

中国的婚俗也是比较复杂的，同时也很壮观，尤其是大户人家的婚礼，更是不惜金钱大肆张扬。在林语堂的《京华烟云》中，就很详细地描绘了两场婚礼，向外国人展示了中国婚俗。结婚之前新郎家正式向新娘家送上龙凤帖，请求选择好日子，同时送上龙凤饼、绸缎、茶叶、水果、一对鹤、四坛子酒。新娘家回的礼是十二种蒸食，表示同意。结婚处处充满着喜气，所有的物品都使用红色，表示吉祥的意思，三尺高的红蜡烛，密密扎扎挂在墙上的红丝绸幛子，幛子上镶着

^① 盛成著：《我的母亲》，第87页。

字,有的是金的,有的是镶金边黑绒的。同时新郎家就开始紧张繁忙的准备工作,如有些人负责收礼金、礼物,有些人掌管登记礼金、礼物,有些人记帐,发发送礼的仆人赏钱,有些人去雇戏班子和唱大鼓、说书、杂耍的艺人,安排花轿,街上用的执事旗、牌、罗、伞等,租行头,安排花轿,找饭庄办筵席,从同乡会借家具等等。四个仆人专管全宅第之中的蜡烛,灯火,喜幛等悬挂的东西;四个仆人专管扫地,收拾桌子;两个仆人照顾桌子上的银餐具和象牙筷子;八个人在照顾家具的一批人协助之下,专管准备茶水,给客人倒茶。这些工作严格都有严格的分工,分为伺候前面的男客,和后面的女客,以大厅为界线。随后新娘的嫁妆开始陆续到来,新郎这边派去的八个人去迎接嫁妆,新娘那边来八个陪送嫁妆的。嫁妆分装七十二抬,一路敞开任人观看的。按先后顺序是金、银、玉、首饰、卧房用物、书房的文房四宝等物,古玩、绸缎、皮毛衣裳、衣箱、被褥。^①木兰的嫁妆十分丰厚:“一个金如意(是一种礼器,供陈设之用),四个玉如意,一对真金盘、龙镯子,一对虾须形的金丝镯子,一个金锁坠儿,一个金项圈,一对金帐钩,十个金元宝,两套银餐具,一对大银瓶,一套镶嵌银子的漆盘子,一对银蜡台,一尊小暹罗银佛,五十个银元宝;一套玉刻的动物,一套紫水晶,一套琥珀和玛瑙(木兰自己的收藏品),一副玉别针,耳环,戒指儿,一个大玉压发,两条头上戴的大玉凤,一个大玉匣子,一个小玉玛瑙匣子,一个旧棕黄色玉笔筒,一对翡翠镯子,一对镶玉镯子,两个玉坠儿,一尊纯白玉观音,有一尺高,一颗白玉印,一颗红玉印,一支玉柄手杖,一尊玉柄拂尘,两个玉嘴旱烟袋,一个大玉碗,六个玉花水晶花瓣的茶杯,两个串珠长项链,一副珍珠别针,一副珍珠簪子,珍珠耳环,珍珠戒指、珍珠镯子各一个,珍珠项饰一个。然后是若干个古表铜镜,若干个新洋镜子,福州漆化妆盒子,白铜暖手炉,白铜水烟袋,钟,卧房家具,扬州木浴盆,普通的便器。再随后而来的是文具,古玩,如檀香木的古玩架,古玩橱、凳子、古砚、古墨、古画,成化和福建白瓷器,一个汉鼎,一个汉朝铜亭顶上的铜瓦,一玻璃盒子的甲骨。再随后是一匣子的雕刻的象牙,再往后是十大盒子的绸,罗、缎,六盒子的皮衣裳,二十个红漆箱子的衣裳,十六盒子的丝绸被褥,这些一部分是新娘自用的,一部分是赠送新郎的亲属,做为新娘的礼物。^②新娘出嫁要戴凤冠,凤冠是“用小珠子做成的,凤冠下面另有珠子与细翡翠相混排成北斗七星的形状,还垂着一串一串色泽鲜艳的宝石”。还有一个玉如意,虽然是点缀,却是婚礼中重要而正式的东西,摆在桌子上给大家看,取“吉祥如意”之意。新娘的礼服也是十分华美精致,“箱子里是绣着一对荷花红绸子的褂子,是新娘穿的,另有一个绣有杂色祥云花样的披肩,还有一件海蓝色缎子百褶裙,下面绣着简单但是宽大的海水江波,灰绿与蓝色的宽条相间隔,做为

^① 《林语堂名著全集 第一卷 京华烟云》,第 373 页。

^② 《林语堂名著全集 第一卷 京华烟云》,第 374 页。

裙子的底边儿”^①。出嫁的时候，娘家到处显示着一派喜庆的景象，“红带子，丝绸彩饰，红灯笼都要悬挂，新郎的屋子要装饰。桌子，蜡签儿，脸盆、痰盂，床上的帐幔，被褥等等，件件都要换新。典礼一般在宗祠举行，主持婚礼的人被称为赞礼，赞礼戴着金叶红花的乌纱帽，高声念了四句诗，然后唱道：“新娘下轿，步步高升！请！”赞礼唱完，伴娘要去接引新娘，伴娘把新娘蒙头纱掀开一个角儿，拿着一个裹了红纸的新秤，用秤杆儿的一头儿把新娘头上纱巾挑下，用挂着秤砣的秤是为了吉祥，取万事“称心”、“称意”、“万事如意”的意思。然后才是正式举行婚礼的仪式，向祖先牌位三扣头，新郎的父母坐在大厅中间的椅子上接受新娘的跪拜礼，公婆都穿上正式官衣，戴着官帽，足穿官靴，胸前绣着正方形的彩龙花纹。新娘还要向媒人以及亲属行礼，他们也都还礼，由赞礼“又高唱喜欢，祝新婚夫妇百年偕老，多子多孙，瓜藤绵绵”^②。新娘由伴娘陪同，被引领进入洞房。按礼俗，新娘应当默然静坐，新郎也一样。新娘新郎要同饮合欢酒，是一杯酒，一碗猪心汤，汤里还有别的东西，取二人同心和好之意，这个风俗是必需的，新郎新娘两个人单独在屋里时，才联杯共饮合欢酒。

另外，在留学生与他们的外国友人的交往中，也会不知不觉地将中国文化介绍给外国人。徐志摩与罗素的关系非同一般，徐志摩对罗素不仅执弟子之礼，同时更是相知甚深的密友。当罗素的孩子约翰满月的时候，徐志摩表现了中国人特有的热情，不仅为罗素在剑桥大肆张扬，甚至还发动剑桥的中国留学生为罗素夫妇摆喜筵，按中国人的习俗吃红鸡蛋和寿面，在他给罗素的邀请信中，告知“这是中国人在这类场合中的惯例”^③。这种亲切的关怀，不仅让罗素了解了中国的习俗，也促进了双方的友谊。冰心在美国留学的时候，在和S教授聊天的时候，曾向他介绍过一些中国的节日，如新年、元宵节、“家家都点上各种各样的花灯，街上有灯市，燃灯玩盏”^④，三月三的时候“修禊”，修禊是消灾除病的意思，古人在暮春三月，邀集友人或亲属到水边嬉戏，用水洗涤，除去污垢，以消除灾难，后人沿袭下来。在春光明媚的时候，到郊外游玩野餐。后来去美国友人包贵思家作客的时候，正巧快到中国传统的节日——七夕，于是冰心向大家讲述了七夕的故事，在中国，那一天人们在庭院里摆上桌子，邀请朋友一起品尝水果，还有的女孩子“带着各色丝线，引线穿针，向善织云锦的织女学做针线活，叫做‘乞巧’。而小孩子们手里握着煮熟的蚕豆，大家互相赠送，两手交握，意味‘结缘’”^⑤。

^① 《林语堂名著全集 第一卷 京华烟云》，第166页。

^② 《林语堂名著全集 第一卷 京华烟云》，第166页。

^③ 刘介民著：《类同研究的再发现——徐志摩在中西文化之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62页。

^④ 卓如著：《冰心传》，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第230页。

^⑤ 卓如著：《冰心传》，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第257页。

4. 留学生与中国书法艺术的传播

中国文字起源较早,从最早的甲骨文到楷书,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而将文字融入了创作者的观念、思维、精神,并激发出对审美对象的审美情感,才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书法。尤其是中国文字对称、均衡的形态,使得文字不仅仅用来书写记事的功能,同时还具有了审美的功能。因而,中国的诗、书、画往往会同时出现在一幅作品中,完美的结合,达到意境的统一。但是,由于中西方所使用的书写工具不同,中国的文房四宝,即笔墨纸砚,各有一套学问,而西方的拼音文字,也有自己一套书写安排,两者套路完全大相径庭,因此,要普及中国书法,必须与推广中国文字达到一致才有可能,以至于很少有中国人将中国的书法写成著作介绍到国外。蒋彝,一位以英文写作并在西方世界传播中国文化的华裔作家(30年代辞职赴英国留学),他一生以“哑行者”为笔名,撰写并出版了20多部英文作品,其中有介绍中国绘画和书法艺术的《中国眼光》(The Chinese Eye)和《中国书法》(也称《八针指南》,Chinese Calligraphy),12本英文游记。在他的一系列游记中,也是“图文并茂,熔散文、绘画、诗与书法于一炉,别具一格,为广大读者所喜爱”^①。即使不看书中的文字和内容,光是细细品味书中丰富多彩的插图和书法作品中的韵味,也是一种享受,所以,他的作品深得国际文艺界的推崇和赞扬。1938年,他的《中国书法》一书由伦敦的Mecuen出版社出版。《中国书法》共11章,除绪论外,其他章节分别讨论了中国文字的起源和构成、书体、中国书法的抽象美、技巧、笔划、练习、结构、书法与绘画、美学原则以及书法与中国其他艺术形式的关系。中国书法是一门独特的艺术,它是中国千年文化精华的结晶,要想学会这门艺术,就不仅仅会写中国字,而且还要对中国文化有所了解,这些对西方人来说,仿佛是一座无法逾越的高山,困难重重,但是蒋彝却运用形象、譬喻、趣闻等手法,把这个深奥、陌生、抽象的题目变得生动具体,将深奥的道理变得通俗易懂。尽管如此,蒋彝的这本《中国书法》出版后,销路并不是很理想。但是,1942年底的一次意外转机,使这种情况完全改观。圣诞前夕,驻欧洲的美国军人将《中国书法》买下来,作为“圣诞礼品”寄给国内的亲友,使得这本书很快变得畅销起来,不就即告售罄,一再翻印。“直到60年后的今天,哈佛大学出版社仍在出版发行,许多大学仍旧将它作为书法课程的教科书”^②。

这本《中国书法》先冷后热的局面,其实也是很多中国文化在海外传播的一个共性,尤其是那些中国特色明显的文化,如文学、音乐等方面,由于这里面包

^① 叶君健:《〈中国书法〉中译本序》,转引自(美)蒋彝著:《中国书法》,上海书海出版社1986年版。

^② 郑达:《中国文化的国际使者——记旅美华裔游记作家、画家、诗人蒋彝》,转引自《美国研究》,2003年第一期。

含着丰富的文化底蕴，并非因为留学生将它们介绍到了海外，就会获得西方人的认可，而是需要一个过程，一个对中国文化深入了解和熟悉的过程。与物质文化的迅速传播相比，精神文化的传播任重而道远，即使是在信息如此发达的今天，西方人对中国的了解仍然十分有限，因此，东学西渐之路，套用屈原的一句话：路漫漫兮而修远。作为炎黄子孙，龙的传人，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为弘扬祖国文化尽一份我们自己的力量，留学生的努力是有成效的，但毕竟这部分人的力量又是有限的，要想让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之林中占有一席之地，就要充分利用今天有利的社会环境和国际环境，扩大宣传的力度和广度，抓住一切可能的机会宣传中国的文化，让中国文化真正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另外，大量事实表明，中外文化的交流不仅有利于各国文化资源的共享，同时，在文化交流中，思想发生碰撞，文化也会在碰撞中升华。因此，中国文化的西渐之路对世界文化的进一步发展，意义深远。

结论

20 世纪以来,如何协调东西方文化的矛盾,成为摆在现代知识分子面前的一个共同课题:一方面是强烈的世界意识,一方面是无法割舍的民族感情,逼得他们在中西文化之间徘徊,在留学生群体中,这种情况更为突出。一部分人以输入外来文化为己任,另一部分人挑起了弘扬中国文化的重担。无论引进还是输出,所走的道路不同,但是殊途同归,作为文化交流的使者,他们促进了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的沟通。传播中国文化的过程,加深了留学生对中国文化价值的再认识,所谓中国的,即是世界的,只有那些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才真正代表着中华文化的精髓,本文所要论述的关键之处即在于此。

中国的文化包括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留学生所传播的中国文化也在这个范围内,只是侧重点有所不同。他们传播的内容以精神文化为主,无论是传播中国的儒家经典、中国的文学作品,还是中国的戏剧、绘画艺术、音乐以及饮食文化等,都是为了使外国人对中国文化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如中国的古典诗词,由于语言不同,翻译的作品显然已经不可能保持原来中国诗歌的节奏和韵律,但是,很多留学生们仍然将这些优秀的诗作翻译成外国文字。他们这样做,不仅仅是传播了中国的文化,也是让全世界的人民共享这些优秀的文化成果。在戏剧方面,为了适应外国人的欣赏习惯,梅剧团在国外的演出也做了很多调整,这些调整是积极的,对中国的国粹发展影响深远。一些从事绘画的留学生们,通过在国外举办画展,宣传中国的绘画艺术,包括中国的国画和版画等,国画既有原来古人的旧作,也有现代人创作的具有新的内容的作品。留学生的这些活动,使外国人获得了了解中国文化的途径,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外国人对中国文化的某些偏见,但是,在影响力上,中国的物质文化以更加直接的方式,吸引了西方人的注意。如一些留学生邀请外国人品尝中国名菜,或者亲自动手制作中国菜,或者将一些中国特产馈赠给外国友人。

总之,在向外国人介绍中国文化的过程中,留学生不仅仅是简单的介绍,还通过他们的介绍,改变长久以来由于文化交流不畅带来的文化误解,改变外国人认为中国近代没有文化的偏见。民族自豪感和自尊心让留学生们有意识地传播着中国文化,他们愿意让外国人了解中国,认识中国,这种简单朴素的爱国心,成为他们传播中国文化的动力。他们力图超越不同文化背景和民族之间的差异,做到真正意义上的交流,在国外的亲身感受,使得他们在传播中国文化的时候,能够有的放矢,最大程度的使外国人能够了解真正的中国文化。

作为近代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批特殊的群体,他们为中国文化走向世界付

出了巨大的努力，他们所做的一切，对于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改善中国的国际形象具有积极而又深远的意义。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是在留学生的不懈努力下，在世界的各个角落生根发芽，甚至还有进一步壮大的倾向，这些可喜的成果值得在文化交流史上记载下来。在中外文化交流的旅途上，他们薪火传承的作用不容忽视，他们的名字也深深镌刻在文化交流史的丰碑上。

参考文献

基本史料与著作:

1. 宋柏年著:《中国古典文学在海外》,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1994 年版。
2. 钱林森编:《牧女与蚕娘》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0 年版。
3. 马祖毅,任荣珍著:《汉籍外译史》,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7 年版。
4. 郭沫若:《中苏文化之交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49 年版。
5. 黄兴涛著:《文化怪杰辜鸿铭》,中华书局 1997 版。
6. 辜鸿铭著,黄兴涛,宋小庆译:《中国人的精神》,海南出版社 1996 年版。
7. 林治广,刘献彪编:《鲁迅与中日文化交流》,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
8. 埃德加·斯诺编,文洁若译,陈琼芝辑录:《活的中国—现代中国短篇小说选》,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
9. 鲁迅,茅盾编著:《草鞋脚》,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
10. 陈丙莹著:《戴望舒评传》,重庆出版社 1993 年版。
11. 曹靖华:《好似春燕第一只》,《曹靖华文选》,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
12. 曹靖华编:《曹靖华抒情散文选》,作家出版社 1988 年版。
13. 张德美,冷柯编:《曹靖华纪念文集》,超星数字图书馆 1992 年版。
14. 萧三著:《萧三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5 年。
15. 王政明著:《萧三传》,四川文艺出版社 1992 年版。
16. 王嘉良等:《萧乾评传》,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1990 年版。
17. 傅光明著:《人生采访者——萧乾》,山东画报出版社 1999 年版。
18. 盛成著:《我的母亲》,安徽文艺出版社 1985 年版。
19. (法)保尔·瓦雷里:《我的母亲》序言,胥弋译,来自 <http://culturefr.free.fr/mingren/shengcheng/etude3.htm>。
20. 林语堂著《中国人》,学林出版社 1994 年版。
21. 刘静沅:《京剧艺术发展史简编》,1984 年版,超星图书馆。
22. (俄)叶·科瓦列夫斯基著,阎国栋等译:《窥视紫禁城》,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4 年版。
23. 齐如山著:《齐如山回忆录》,来自超星数字图书馆。
24. 黄殿祺编:《话剧在北方奠基人之一——张彭春》,中国戏剧出版社 1995 年版。
25. 梅绍武著:《我的父亲梅兰芳》,百花文艺出版社 1984 年版。
26. 《文史资料选编》,北京出版社 1993 年版,第四十六辑。
27. 江上行著:《六十年京剧见闻》,学林出版社 1986 年版。
28. 齐如山著:《梅兰芳游美记》,岳麓书社 1985 年版。
29. 都文伟著:《百老汇的中国题材与中国戏曲》,上海三联书店 2002 年版。
30. 张允侯,殷述叙,李峻臣等编:《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二),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
31. 胡兰畦著:《在德国的女牢中》,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
32. 刘介民著:《类同研究的再发现—徐志摩在中西文化之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 年版。
33. (美)蒋彝著:《中国书法》,上海书海出版社 1986 年版。
34. 王震编著:《徐悲鸿艺术随笔》,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9 年版。
35. 《胡适往来书信选》(下),中华书局 1980 年版。

36. 郑理著:《笔下千骑——绘画大师徐悲鸿》,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5 年版。
37. 朱伯雄,陈瑞林编著:《中国西画五十年(1898—1949)》,人民美术出版社 1989 年版。
38. 陈辛仁主编:《现代中外文化交流史略》,中国书籍出版社 1997 年出版。
39. 柯文辉著:《艺术大师刘海粟传》,山东美术出版社 1986 年版。
40. 李永翘著:《张大千全传》(上册),花城出版社 1998 年版。
41. 王震著:《徐悲鸿》,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1 年版。
42. 鲁牧编:《体育界的一面旗帜:马约翰教授》,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
43. (日)内山嘉吉,奈良和夫著,韩宗琦译:《鲁迅与木刻》,人民美术出版社 1985 年版。
44. 李光经、马蹄疾编著:《鲁迅木刻活动年谱》,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1986 年出版。
45. 王光祈著:《东西乐制之研究》自序,(上海)中华书局 1926 年版。
46. 清华大学中共党史教研组编:《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史料》(1),北京出版社 1979 年版。
47. 毕兴,苑树青编:《黄钟流韵集:纪念王光祈先生》,成都出版社 1993 年版。
48. 左舜生等著:《王光祈纪念册》,(台北)文海出版社 1968 年影印版。
49. 杨步伟著:《杂记赵家》,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8 年版。
50. 李喜所著:《近代留学生与中外文化》,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
51. 李喜所主编:《五千年中外文化交流史》,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2 年版。
52. 王丽娜编著:《中国古典小说戏曲名著在国外》,学林出版社 1998 年版。

相关论文:

1. 胡荣彬:《蒋彝的人生志向及其对中外文化交流的贡献》,《九江师专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 年第 2 期。
2. 郑达:《中华文化的国际使者——记旅美华裔游记作家、画家、诗人蒋彝》,《美国研究》,2003 年第 1 期。
3. 宋媛:《游子归乡与文人传教——辜鸿铭林语堂对外文化介绍的同与异》,《山西教育学院学报》,1999 年 6 月版。
4. 陈家洋:《林语堂“对外讲中”的透析》,《华文文学》,2004 年 4 月版。
5. 沈玲,鲍前程:《林语堂与中西文化交流》,《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 年 9 月版。
6. 宫宏宇:《王光祈初到德国》,《黄钟》(武汉音乐学院学报),2002 年第 3 期。
7. 罗天全:《论王光祈在中国音乐史上的主要成就》,《音乐探索》,2003 年第 1 期。
8. 刘炎生:《向西方宣传中国文化的一部重要著作——评林语堂的〈吾国吾民〉》,《华南师范大学学报》,1997 年第 6 期。
9. 陆耀东:《在中外文化交流桥上的徐志摩》,《外国文学研究》,1999 年 3 月版。
10. 侯杰、高冬琴:《弘扬儒家文化的留美学生陈焕章评析》,留学史会议提交论文。
11. 杜玲:《林语堂与中外文化交流》,留学史会议提交论文。

报刊杂志:

1. 《少年中国》
2. 《春柳》
3. 《申报》
4. 《大公报》
5. 《时事新报》
6. 《读书》
7. 《文汇报》
8. 《人民日报》海外版

9. 《中华读书报》

10. 《美国研究》

后记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弹指一挥间，三年的时光已在不知不觉中悄悄流逝。回首三年走过的日子，心中感慨颇多。三年前，怀着对南开的一片憧憬，我来到了令人羡慕的周总理的母校。南开园里、大中路上、图书馆、范荪楼，那些熟悉的地方，留下了多少难忘的回忆，而今，这一切都将成为过去，深深地印在我心灵的底片上，永远！永远！

除了这梦幻的校园，南开留给我的更是一笔永远无法计数的人生财富。浓厚的学术氛围使我的学业深受裨益，和蔼可亲的老师们，把我领进学术的殿堂。三年研究生的学习，除了完成学习专业课知识的学习，还参与了元老师的一部分写作任务。这些不仅为我的论文写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也使我从中掌握了很多基本的专业常识。这个过程，是乐趣也是苦趣，更让我在专业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

在论文的写作过程中，我的导师元青教授付出了很多心血。无论是论文题目的选定还是提纲的提出，甚至不厌其烦的为我多次修改论文，提出大量宝贵的意见。此外，我的论文还得到了侯杰教授的帮助，他为我论文的写作提供了相关的书籍资料。刘晓琴老师和杜玲师姐为我提供了一些相关论文的资料。我的师兄郭晓勇也对我的论文提出了一些有益的建议，我的同学王建明帮我复印了一些论文资料，我的室友徐艳秋为我纠正了英文摘要的错误。在此，向所有给予我帮助的许多老师、同学和朋友们一并表达我的感激之情，正是有了你们的帮助，才让我有勇气和信心写好这个论文。

当一切都归于平静，而我们也即将迈出校门，各奔前程的时候，我们带走的是南开精神，留下的是永远的记忆，不论我们走到哪里，我们代表的都是南开的形象，我们也都是爱南开的。

张薇

2005年5月于南开